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10

1 9 7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商品货币关系 •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今昔

..... [苏] A·H·马拉菲耶夫 (1)

- 一、列宁论苏维埃经济中的商品货币
关系 (2)
- 二、苏维埃经济的性质,货币和利润的作用,
价值规律的作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九年时
期的理论)..... (11)
- 三、战前五年计划和卫国战争年代的商
品理论..... (37)
- 四、战后时期(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商
品生产理论 (46)
- 五、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理论... (71)

• 苏联农业问题 •

苏联农业中的垄断魔爪 (88)

摩尔达维亚农业生产管理新形式的效率

..... [苏] И·鲍久尔等 (90)

协作的各种形式 [苏] В·普列什科夫等 (109)

· 历史上的投降主义 ·

吉斯林 [美] 理查德·佩特罗 (113)

法国投降与一九四〇年法德停战的历史

..... [苏] В·斯米尔诺夫 (119)

* * *

敦刻尔克的九天 [英] 戴维·迪万 (131)

外国史学家简介

波里比阿 (156)

国外书评

评《在漫长的劳动日中消磨
一生》一书

..... [美] 罗伯特·克莱本 (160)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今昔

〔苏〕A·H·马拉菲耶夫

编者按：这是一九七五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介绍苏联商品货币理论的资料性的书，本刊选译了其中的主要部分。作者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但是，还能从中看出苏联商品货币理论演变的概貌。读一点商品货币理论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反修的战斗力的，也不无益处。

文章的修正主义观点十分明显。在这里，作者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宣扬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利润的刺激作用，竭力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也是一篇绝好的反面教材。

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全面复辟。在文中我们还能看到，在苏联经济学家中，也已经有人不得不承认劳动力在苏联已成为商品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

告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本期部分内容有错误，已
读 将本书第113—118页抽去，其余文章仍可参考。本
者 书经技术处理后，定价改为0.3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1月

一、列宁论苏维埃经济中的 商品货币关系

本章内容提要：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时普遍认为，商品、货币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不相容，必须迅速地以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认为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苏维埃政权初期

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注意在国民经济中实际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所拟的《经济措施纲领草案》中写道，必须实行银行国有化，“使货币流回国库”，发行大票面额的新货币等等。^①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一九一八年三月）中，列宁着重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没有货币是根本不行的。^②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第一次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规定财政政策方面的基本任务是：财政集中、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实行义务劳动制和用新纸币代替旧纸币。^③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24页。

② 同上书，第36卷，第13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361页。

因此，一九一八年春天，在列宁领导下制订的、打算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建设计划，包含有为建成社会主义而利用诸如货币、信贷、财政等价值范畴的规定。

同时，不能把情况看得过于简单。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当时都是作为临时的措施，因为商品货币关系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不相容的，并且通常把它们与资本主义关系混为一谈。例如，就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列宁写道，资本主义的消灭和商品生产的消灭是结合在一起的过程。^①诚然，列宁当时已经考虑到调节价值关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只有粮食人民委员部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把所有商品都收归国有，规定价格，我们才真正接近了社会主义。”^②经济实践日益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新的态度处理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问题提供了材料。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但是，到了战时共产主义年代，曾试图不经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直接向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渡。要理解这种尝试，是不能离开苏维埃国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的。

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后国民经济的实物化过程在继续着。^③实物化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经济破坏、与财政体系和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50—1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页。

③ 经济的实物化过程早在1915—1916年就开始了。参见Л·库佐夫科夫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国民经济的实物化过程》，载《社会主义经济》杂志，1925年第3卷，第55和70页。

货币流通的瓦解相联系的，这基本上是一种由客观经济条件所造成的自发过程。

从一九一八年下半年起，苏维埃国家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犯和残酷的经济封锁，陷入损失巨大的国内战争。在这一时期中，由于必须保证战争的需要和以消费品供应后方工人，而苏维埃国家仅仅拥有非常有限的资源，因此开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加速和扩大了经济关系的实物化过程。

在我国现代文献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常常被解释得过于简单：只是由于战争和破坏而被迫采取的政策。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是与辩证地、在一切联系和媒介中研究现象和过程的列宁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毫无疑问，战时共产主义是被迫采取的、必要的，甚至是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共产党的巨大功劳。但是，正象列宁所写的，这并不排斥需要清醒地估计形势和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①

新经济政策实行了半年之后的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列宁就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指出，我们犯了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错误。但是，打算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在那种环境下难免的错误，因为它带有试探的、“侦察战斗”的性质。列宁党的力量表现在，它不掩饰这一错误，而善于清醒地估计它并得出结论：必须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由社会主义建设本性所决定的新经济政策。

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现过程中，特别注意货币问题。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写道，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② 他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所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50页。

写的关于取消货币税的信中认为，从货币过渡到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是不容置疑的。^①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虽然从事粮食和一切其他商品的私人贸易是被禁止的，但地下市场以及消费性的和投机的跑单帮的买卖却从未停止过。

因而，在公有化的成分中，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被限制到极低的程度，而在私有成分中，贸易却带有极大的投机性，这些都是实现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障碍。所以，列宁当时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及其范畴不相容，这是不奇怪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观点

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态度的重大变化，是跟准备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相联系的。

由列宁制订、并经一九二一年春季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确认的新经济政策，指望依据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来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走向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相应的决议中指出，农民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全部产品，可以同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相交换。交换最初只准许在地方经济周转的范围以内，但这一限制很快就取消了。

苏维埃政权初期管理经济的经验，证明了下述基本的政治、经济原理的正确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比没有货币做媒介的商品交换来得优越。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总结这一经验时说过，党和国家机关竭尽全力组织商品

^① 《列宁文集》，第34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42年版，第384页。

交换,但失败了,结果成了通常的买卖。列宁号召适应这种情况,得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需学会经商的结论。

列宁在为苏维埃政权成立四周年而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篇著名论文中提出警告:“我们决不受莫名其妙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的社会主义’或旧俄国式、半贵族式、半农民式、宗法式的情绪的支配。”^①他写道,商业正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而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②

列宁在阐明黄金作为货币材料的作用时写道,必须爱惜金子,卖金子时要卖得贵些,用金子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根据列宁的指示,我国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进行了币制的根本改革。新的货币单位——切尔文^③,与日益增长的商品流通有直接联系并以黄金作保证。

这样一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到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放弃了似乎贸易只能为资本主义服务这样一种陈腐的观念。他提出一项任务:掌握贸易和货币,利用它们来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不用说,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贸易、货币以及所有别的商品货币关系都与资本主义不同,它们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工具,被利用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包含着新的内容。

新经济政策时期国民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开始在贸易活动的基础上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正确的社会经济联系,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对国有化工业领导方法的根本变化,国营企业和托拉斯过渡到经济核算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0页。

② 同上书,第578页。

③ 切尔文是一种十卢布的纸币。——译者

制也具有不小的意义。

列宁指出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管理经济的市场方法和经济核算的直接联系。他写道：“国营企业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在最近的将来，这种形式即使不是唯一的，也必定会是主要的。”^①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提纲中，称经济核算是新经济政策的最重要方面。^②

众所周知，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根据企业的申请书，从预算中拨款，以满足企业的需要，而不管企业耗费国家资源是合理或是浪费，有没有获得利润。由此，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工业出现巨大的亏损（约一亿五千万金卢布），损耗的大部分落入私人资本手中。

在这些条件下，对经济核算、收支平衡和利润的忽视，使国民经济恶化。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指出某些经济工作者在根据市场原则管理生产方面束手无策。列宁在给当时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的Г·И·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写道：“您对我说，我们的某些托拉斯不久就会没有钱用，而断然要求我们把它们收归国有。（显然，这里所指的是得到靠预算拨款经营的保证。——作者）我想，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就应当受到审判，全体理事都应当受到长期剥夺自由（也许在相当时期后实行假释）和没收全部财产等等的惩罚。

“如果我们建立了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托拉斯和企业，但不会用精打细算的商人的方法充分地保证我们的利益，那我们便是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3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91页。

道道地地的大傻瓜。”^①

列宁把经济核算和商品货币关系及物质利益原则联系起来时，预见到它不仅对社会主义，而且对共产主义建设都是必要的。他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八日发表于《真理报》上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道：“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②

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有关的全部经济变化，可以完全有根据地称之为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由国家调节的市场关系的制度。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不是与经济发展中巩固计划原则的任务背道而驰了吗？绝对不是。恰巧相反：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加强计划化只能在国家逐步掌握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关系的基础上达到。

列宁指出国民经济计划化同新经济政策的密切联系。例如，他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写给Г·М·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③要弄清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正如К·В·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正确地写到的，^④列宁的《论合作制》一文有巨大的意义。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4页。

④ 《经济问题》杂志，1969年第1期，第5页。

在写这篇文章以前，甚至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著作中，列宁在承认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是把这种利用看作暂时的退却，起初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以后退向国家调节商业，而这种调节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停止的。^①早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就指出过，退却结束了。

在《论合作制》一文中，问题已经按另一种方式提出来了。在这篇文章里，苏维埃制度条件下的合作社首次被断定为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列宁写道：“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②列宁又写道：“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③

商品货币关系是合作社制度（包括生产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不可分离的因素。根据这一点我们有权作出结论：列宁实质上承认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因为它们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列宁《论合作制》一文中，实际上说到了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商品关系的社会主义内容。

分析列宁的著作以及他在新经济政策年代里领导苏维埃经济发展的活动证明，实践的经验使他对苏维埃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甚至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列宁还认为，货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因此，最初设想的组织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系是不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1页。

② 同上书，第684页。

③ 同上书，第687页。

用货币，而是用国营企业的产品直接交换农民的粮食。但到了一九二一年末，就不得不承认商品交换（它有时被不确切地称为产品交换）已成为买卖关系。与此同时，列宁已认为有必要和可能利用货币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因而货币被看作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也是过渡经济的范畴和工具。同时，货币也被看作为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

在列宁关于经济核算的观点中，承认了不仅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在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经济部门都存在着价值联系的必要性。

二、苏维埃经济的性质，货币和利润的作用，价值规律的作用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九年时期的理论)

本章内容提要：在第一节中，分析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把苏维埃经济看作自然经济的原因，介绍了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的商品范畴“仅具形式”、“失去了实际经济内容”的观点。第二节介绍了新经济政策时期有关商业、货币、利润、计划和市场等问题的一些争论和论述，也谈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等问题。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观点。

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观点的批判

在战时共产主义年代（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第一季度），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下述原先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变得更加牢固：似乎社会主义经济排斥商品货币联系，因此，在过渡时期应该实行限制商品货币联系并随后消灭它们的政策。

例如，由列宁制订基本原则并经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草案规定，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并实

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①把上述措施列入纲领，从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认识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据这些认识，社会主义被理解为按其本性来说是排斥货币的自然经济。例如，当时出版的《国民经济》杂志写道，社会主义是自然经济，它的发展不需要货币，而这据说是无可争辩的真理。^②当时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Л·克里茨曼认为，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的经济，存在着在革命的旋风中、如同在巨大的离心机中形成的两个部分：合法的、无产阶级的自然部分和非法的、商品的以及商品资本主义的部分。^③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什么原因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是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加强起来的呢？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年代日益加强的经济关系的实物化：以余粮收集制的方式取得农民的粮食，工人和职员劳动报酬主要以实物支付，企业转到依靠预算保证，免费向居民发放粮食、日常生活用品和燃料，公用事业不收费，国内许多地区出现了地区性的等价物，象面包、盐、印花布那样一些商品开始起等价物的作用。归根结底，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力量薄弱，在于国家生产力水平低。这样，正常的经济关系就只能被迫放弃。

苏维埃经济中货币的作用问题，是当时经济理论和经营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报章中加以讨论，在政府的、党的和其他组织中进行研究。占优势的意见是，货币关系应该日益缩小并且被消灭，如果不是立刻消灭，也应在最近的将来消灭。

在这一时期，货币没有很好地履行它在规定范围内的职能，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9—750页。

② 《国民经济》，1921年，第1—2期，第55页。

③ Л·克里茨曼：《英勇的俄国革命时期》，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24年版，第131—132页。

却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广泛用作最猖獗的投机倒把的工具。在国内战争年代，有六十个白匪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府发行纸币。地方政权、军队、银行分行、市政府、私人商行，包括饭店和咖啡馆都发行纸币。在图阿普谢市，甚至马戏院也发行供本地流通的可兑现的债券。某些纸币的支付力靠使用暴力去加强。例如，布哈拉的埃米尔^①发出命令，或是使用他发行的货币，或是挨七十下鞭笞。反革命政权发行的全部货币票面额，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发行的货币额多一点五倍到两倍以上。

于是，货币在人民中的威信扫地，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下面是一封写给列宁的信：

“如果合理地观察生活，看到全部生活都包括在食、衣和住中，此外，全是多余的，那末何必要这些恶魔般的钱币。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我看得很清楚，没有这种资产阶级的残余，没有可鄙的金币和纸币，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幸福地生活；但对资产者和投机商人来说，这将是结束他们寄生生活的最后的致命打击。‘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愿苏维埃俄罗斯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着手消灭这种巨大的罪恶——货币，用给每个劳动者定额的实物来代替它们。我想，这是可以实现的。A·苏普鲁恩”^②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底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张消灭货币。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道，对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在生产中抛弃过去私人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并最终消除货币对经济因素的一切影响。^③

① 埃米尔，此处指1920年前布哈拉（在中亚细亚境内）的统治者。——译者

② 《新世界》杂志，1968年，第4期，第180—181页。

③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集》，速记报告，莫斯科1919年版，第192页。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决定党在这方面的方针是:“依靠银行的国有化,俄国共产党将竭力实行一系列办法来扩大非现金结算的范围和准备取消货币:一定要把货币存入人民的银行;实行使用预算簿,以支票及短期购货证代替货币,等等。”^①

依据俄共(布)的党纲作出了实际结论。例如,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一月)拟订了消灭货币措施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规定将工资进一步实物化,扩大同农村的产品交换,以及同外国进行实物结算等等。^②

非常清楚,货币在商品经济中执行了许多经济职能。消灭货币的远景对国民经济提出一个难题:用什么去代替货币,特别是代替它们的衡量和核算的职能?因为在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核算尚且不能准确地反映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消耗以及劳动的成果,因此,解决这一难题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

自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开始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为止,在刊物上讨论了对经营的估价原则和非货币的核算单位问题。进行这项工作的有财政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专门委员会。直属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经济研究所和彼得罗夫斯克农业科学院所属的农业经济和政策研究所都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在讨论过程中形成三种主张:直接用实物核算费用及其效果,以劳动-能量单位进行核算和单纯的劳动核算。

尽管这三种办法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们都未付诸实践。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7页。

^② 《财政人民委员部通报》,1920年第1期,第1页。

这些办法之所以行不通，原因在于它们脱离经营实践，不符合经济过程的自然逻辑。随着苏维埃经济的日益摆脱战时条件，这种逻辑就更加不要求取消货币，而要求货币流通的正常化，要求实行根本的币制改革。

必须指出，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反映了党的经济政策的现实性。在党纲中，准备将来消灭货币的措施的实行，是同旨在保证现时货币制度的稳定性的财政措施的实现相结合的。因而，如果为经济条件所迫而不得利用货币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党也没有排斥另一种解决货币问题的可能性。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代表人物（Н·И·布哈林、Ю·拉林、Е·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采取了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否定态度。

“左派共产主义者”首领布哈林关于苏维埃经济理论问题的观点，在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得到了最彻底和充分的说明。这本书于一九二〇年由莫斯科国家书籍出版社出版。

布哈林在书中所持的基本概念，遭到列宁的强有力的批判。列宁批判作者沉湎于专门术语和拉丁词时指出，作者很少以事实材料论证自己的结论，对经济过程缺乏具体的研究，陷入烦琐哲学，“在‘深奥’的幌子下走上了哲学唯心主义或不可知论（常常是不作考虑，不加批判地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而绝不是唯物主义”。^①

列宁批评布哈林，因为在他的概念中，过渡经济中的商品范畴似乎失去了实际经济内容。例如，布哈林硬说，通过流通领域把小商品生产者纳入国民经济体系仅仅是形式上的。列宁针对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这一论点在布哈林的书的空白处写上：“不仅形式上”。^①

由于布哈林不理解利润在过渡经济中的实际作用，他简单地解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他断言，资本统治下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利润的生产，而在无产阶级统治下，是为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列宁反对对问题的上述提法，因为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实质上认为剩余产品作为利润的物质内容，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保持着自己的意义。列宁在布哈林的书的白边上写道，“没有成功。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②

列宁对布哈林一书的批评，今天不仅对于理解和研究过渡时期的商品生产问题，而且对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一位著名的苏联政论家 M·C·奥利明斯基证实，布哈林早在此书出版后一年，就企图使这本书同党纲一样，为人人所必读。估计到这本书昔日对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我们认为需要对书中与我们研究的问题有关的那些观点进行更详尽的批判。

布哈林认为，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旧的经济理论概念立刻失去自己的力量，不再为新的经济服务，而商品转变为产品并失去自己的商品性质。他也十分坚决地“清算”其他商品经济范畴，否认利润对过渡经济的意义，断言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工人取得的是社会劳动口粮，而不是工资”。也象他的别的主张一样，这里表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关系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41—42页。

实物化的影响。

在布哈林的观念中，过渡经济按其本质来说，已经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自然经济。因此，他认为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摆脱价值联系。他甚至主张，经济过程的理论面临着过渡到自然经济思维的必要性。

但对实际上存在商品流通、价格、货币和“苏哈列夫卡”^①以及其他商品经济范畴这一可厌而又顽强的事实怎么办呢？布哈林在他那引人注目的处境中，找到一条很奇特的出路。他写道，商品、价格、工资、利润等等范畴，就象古斯拉夫多神教上帝的概念或者虔诚的耶稣教中的幽灵那样，过着某种荒诞的、虚幻而又现实和现实而又虚幻的生活。

换言之，在布哈林看来，过渡经济中的商品关系不过是丧失了实际内容的、无实体的形式。实际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虽然商品的社会内容改变了，但生产仍保持着自己的商品性质。这时仍有作为商品生产存在基础的两个条件：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经济成分以及组成经济成分的经济环节的独立性。消费者并不是从社会仓库中取得劳动产品的，而是通过流通领域。换言之，劳动产品不仅形式上，而且实质上也是商品。

布哈林所谓苏维埃经济非商品性质的结论，是同他的方法论错误相联系的，因为他使商品形式脱离其商品内容。

布哈林使形式脱离内容，绝非偶然。特别是，他过分夸大演绎研究方法的意义，正象列宁指出的，很少用事实材料论证自己的结论。布哈林不是用分析现实的经济联系的方法，阐明在过

^① 指当时设于莫斯科的苏哈列夫卡广场（现在称集体农场广场）上的市场。

渡时期的商品形式背后实际包含着怎样一些社会关系，而是在表面上一掠而过，未深入问题的本质。在他发现这些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时，便宣告它们是虚幻的。

这种态度是同马克思主义相抵触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与布哈林同时代的人们也懂得这一点。M·C·奥利明斯基在布哈林的书出版后不久就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一步一步地分析‘时势’，并据此解决问题，说明商品概念究竟过时到什么程度。而布哈林对目前的时势不作任何分析，就断言，马克思主义‘失灵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很快就不能用了。”^①

布哈林偏执地和十分简单化地说明计划和市场的相互联系。老实说，他“消灭了”市场问题本身。布哈林断定，在有组织的经济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再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公有经济不再由市场和竞争的自发力量来调节，而是由自觉执行的计划来调节，这里将没有研究“市场自发规律”的科学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也将消灭了”。

布哈林这些议论的错误根源在于，他不从现实的苏维埃生活条件出发得出关于市场的概念。在他的观念中，市场是自发的社会关系的集中点，是私人资本主义利益的焦点。实际上，当时苏维埃经济中存在着的市场，包括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因素和私有制的、自发关系的因素。经济的有计划的管理排斥市场的自发性，并不是要求缩小市场，反而要发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关系。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任何理论体系正确性的标准。有关货币的命运问题，是战时共产主义年代理论和实践密切地交织

^① 《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49页。

在一起的问题。布哈林认为，货币的“自我否定”过程正是发生在过渡时期消灭商品制度的过程中。

“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无限制的滥发纸币的政策推进这一过程。“左派共产主义者”之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政策处领导人拉林坚决主张迅速消灭货币制度。列宁及时制止把这一计划带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去讨论。^①

让我们作出某些总结。关于商品货币关系与过渡时期经济不相容、并将在这个时期消灭的结论，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原则。这一结论也反映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纲领中。它反映现实的经济过程，即反映经济关系陷入非常深刻的实物化，特别是在国营经济中以及它同小农生产联系的“方针”上；反映市场和商品货币的流通对小商品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依恋”；反映苏维埃国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流通中的投机倒把行为。

在俄共(布)纲领中，在列宁的指示中，除了为将来消灭货币而准备条件的措施，还包括组织财政、巩固货币制度和确定当前价格方面的要求。

布哈林和其他“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理论体系受到党和列宁的深刻批判，而他们否定实践、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而要求立刻消灭货币制度的建议，则被否定了。

在那种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即用实物分配形式代替商品货币关系，有可能集中国家的物质资源以及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力量，以利于胜利地结束国内战争和粉碎武装干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视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功劳。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第95页。

同时，在新的、改变了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列宁在探讨战时共产主义的一切联系和中介时指出，战时共产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符合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①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即宣布新经济政策后半年，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一九二一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同下层脱节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点在我们党纲里却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基本任务。”^②

因而，列宁注意到新的环境和变化了的条件，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必须取消，因为它未保证生产力的高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按照一九二一年三月上半月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转而采用新经济政策，只有这一政策才能使国家摆脱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结束以后所处的“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③

新经济政策和“价值的重新评价”

托洛茨基-布哈林商品货币关系理论的批判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在于，国家的全部经济按照有计划调节的原则，在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进行改组，以求提高生产力和建成社会主义。价值联系用于三个主要方面：（1）刺激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的高涨；（2）根据经济核算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原则组织国营企业的活动；(3)在苏维埃国家严格监督下，通过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一定程度的活跃来增加农业和工业的商品生产。

经济理论对新经济政策究竟抱什么样的态度呢？应该承认，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经济理论仍受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许多概念的统治，同时可以说，经济理论勉强地跟随在新经济政策之后向前迈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论才积极探讨新的环境对它提出的迫切问题。

新经济政策年代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它所解决的问题大多带有具体性，以最直接的方式同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任务相联系。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不那么经常，也“并非出自对艺术的爱好”，而是为了论证经济政策的某些措施。这些讨论很难说是高水平的，因为当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还刚刚奠定，管理苏维埃经济的实践经验也还很不足。

虽然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水平不是很高，经济建设的实践也未为广泛的理论概括和结论提供一切必要的材料，但是在报刊和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有巨大实践和理论意义的问题。

在二十年代，苏维埃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商品关系中发生矛盾。当时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研究的最重要对象，是下列互相密切联系的问题：利用商业和货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苏维埃经济的性质（它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健全货币制度的途径；经济核算、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

关于利用商业

从一九二一年春天开始，国营经济的管理从实物形式过渡

到利用市场关系、利用商业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日益深入到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工作干部的意识中。

列宁在报刊上，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及各种会议上系统地发表意见，进行了大量工作，使共产党员和其他苏维埃工作者相信：商业和货币不仅能够而且也应当被利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这方面的活动表现了只有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始人及领袖才具备的那种党性、原则性、高瞻远瞩和英明的崇高榜样。

然而，许多人把这一过渡仅仅解释为退却（虽然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开始一年以后，退却已经结束了），甚至是从一九一八年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后退（更不必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了）。

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退却，而且仅仅是退却，与下列情况有关：某些经济学家习惯于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仅仅属于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而看不到其中由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所产生的新内容。由于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指望随着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苏维埃政权会蜕化，资本主义会在苏维埃俄国复辟，这就使对市场关系所作的否定评价更加显得有理。

苏维埃经济的性质

但是在二十年代，整个国民经济及其一切经济成分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广泛发展，以新的方式提出了研究这一经济的性质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年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苏维埃经济基本上带有自然经济的性质，因此对生活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逐步消除保存着的商品生产因素、价值关系及其范畴。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商品货币关系开始迅速发展，而国家日益掌握商业和市场，成功地把私有者从市场领域排挤出去，积

极地利用价值关系及其范畴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人民福利的增长时，关于苏维埃经济性质问题的上述答复已经不合适了，它不符合新的、实际形成的经济条件。如果苏维埃经济真的是自然经济，那么，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就同它的本性相矛盾，使国家离开社会主义。但那样的推理显然与下述事实相矛盾：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私人资本不断被排挤出生产和流通领域，一句话，国家在成功地建设着社会主义。

关于经济性质问题的回答，由于实际表现在商品生产范畴中的生产关系的复杂性而变得困难起来。昨天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概念的重负妨碍了对事情的理解。由于这些原因，不少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借口难以理解苏维埃经济中商品范畴的性质而干脆不答复问题。

但这种“答复”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应该说，当时大多数苏维埃经济学家已经正确地回答了所提出的问题，得出苏维埃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系是商品经济的结论。作这样的答复，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就不再与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胜利前进的不容置疑的事实相矛盾了。

这一结论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理论工作者去研究商品生产问题，使实际工作者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而把私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从国家的经济中排挤出去，并寻找最有效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结构。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科学的这一结论应当认为是它的一项巨大成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起过很大作用。

一九二六年，在共产主义学院召开的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会上，大多数著名的苏维埃经济学家坚持了这一结论。他们是，P·E·瓦依斯别尔格、A·C·门德尔逊、B·E·莫蒂廖夫

等。^①С·Г·斯特鲁米林也认为苏维埃经济是商品货币经济。^②Л·Н·尤罗夫斯基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所阐述的主张也很有意义。他认为,苏维埃经济形成商品货币经济的特殊形式,这一形式与全部资本主义形式有深刻的区别;他指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苏维埃社会完全是另一种阶级结构。尤罗夫斯基教授正确地写道:对苏维埃经济的调节,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刺激——利润的压力,而通过对国家企业、有时也对合作企业的直接建议,实现计划所规定并被国家认为是合理的经济作用。^③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重大特点。他指出,行政命令如果不注意客观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比例,就会造成经营不善。

尤罗夫斯基的思想远非全部可以为现今的读者所接受。但总的说来,他的著作对于理解二十年代的苏维埃经济有不小的科学意义。

货币问题

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根据列宁的指示,并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币制改革。改革的结果出现了以黄金为基础的纸币流通制度。

币制改革的实行,要求战胜私人资本及其走狗的激烈反

① В·Г·洛帕特金和 А·И·叶列明的主张未必有根据,似乎二十年代中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否认城市和乡村交换的商品性质。(见洛帕特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关系和价值规律》,思想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第14页;《经济科学》,1971年,第8期,第78页。)叶列明甚至宣称,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文献中,我们还未见提到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他是在《经济科学》第8期中发表上述观点的,但正是这一杂志的下一期,多次引用把苏维埃经济作为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Л·Н·尤罗夫斯基的著作。

② 《经济生活》,1924年11月7日,第3页。

③ Л·Н·尤罗夫斯基:《苏维埃政权的货币政策》,财政出版社,莫斯科1928年版,第382—383页。

抗。

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接受了否定货币和要求通货膨胀的思想体系，阻挠改革的进行。托洛茨基分子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制度应该利用商品市场，发行几十亿新的、无保证的纸币，以取消价值。

在一九二一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人O·IO·什米特力图论证，纸币发行制度能迅速而自动地把资金交给国家，并阻止私人资本的形成，它是社会革命可靠的同盟军。^①列宁在这一报告后面把什米特称作头脑混乱者并建议解除他对财政事务的领导。^②

尽管私人资本及其代言人进行了反抗，币制改革成功了。它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即在很有限的黄金储备以至存在着预算赤字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战线上的一项巨大胜利。

改革导致符合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经济要求的货币制度的建立。正象党中央委员会通告中所说的，它是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币制改革的取得成功，证明苏联国民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它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商品生产的命运和作用问题有关的原理的发展。

如上所述，新经济政策不仅意味着改造国营工业与农民经济的相互经济关系，而且也意味着在组织工业企业本身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

^① O·什米特：《新经济政策的财政反映》（在第二次全俄财政部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载《财政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第12期，第5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132页。

利润的本性和作用

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对利润的国民经济意义作了明确的、有根据的论述。代表大会强调,必须使国营企业和整个工业保证取得必要的利润。决议指出:“只有生产比消耗多的工业,才能成为胜利的工业。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度日的工业是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持久的、牢固的支柱的。关于国营工业创造剩余价值^①的问题,是苏维埃政权的命运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命运问题。”

“国营工业的扩大再生产,是使我国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而没有国家的剩余价值的积累,国营工业的扩大再生产是不可想象的。”^②

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在整个二十年代期间(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利润始终是实行经济核算的托拉斯和企业的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志。

利润在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反映在利润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种是国营企业的利润,另一种是耐普曼的利润;一种是富农的收入,另一种是劳动农民的收入),获得和使用利润的方法的多样性,这一切成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苏维埃经济中利润(及与此联系的经济核算制)的社会性质、利润取得的方法和利润的作用等问题上所表现的尖锐的思想和理论斗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润与资本主义的利润根本不同,它的

^① 自然,这一概念反映了新的内容,在我国文献中被用于二十年代结束前的苏维埃经济,以后它被“剩余产品”,接着又被“剩余产品价值”的概念所代替。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8页。

新的社会性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经济科学并非一下子就达到这一结论的。得出这一结论是二十年代讨论的结果。

在这些年代中，经济学家们特别注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润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的根本区别。利润是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关系的剩余价值的形式。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剥削，因而也就不存在剩余价值（虽然有剩余产品）。现代经济科学也承认这些原理的正确性（不过，现今的经济学家们补充说，不仅有剩余产品，而且还存在剩余产品价值）。

但是，二十年代的许多经济理论家，从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中没有剩余价值这一正确结论的基础上，却得出了似乎其中也没有利润的不正确结论。^①而对于在经济实践中叫做利润的东西，经济理论家们则认为是一种用来象征国营成分中现实地存在着的剩余产品的假定的范畴。

许多经济理论家之所以否认苏维埃经济的国营成分中利润的存在，这不能简单地、笼统地加以说明。由于这一论点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润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它在那些年代曾具有、而且目前仍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其中也有否定的一面。问题在于，某些坚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必须中止经济核算与利润的“非法”联

^① “因为在‘彻底社会主义类型’的国营企业中，没有剩余价值存在的余地，因此，同样也不可能存在利润”（И·拉皮杜斯和К·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维埃经济理论的关系》，1928年版，第170页）；“未必需要特别证明，利润本身，作为实现了的剩余价值，在苏维埃经济中（自然，在其社会主义成分中）不存在，因为剩余价值本身就不存在”（Т·萨哈罗夫：《经济核算及其演变》，载《工业化之路》，1930年第17—18期，第49页）；“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润”（В·Е·莫蒂廖夫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载《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26年第15期，第190页）。

系，以这种联系为目标似乎与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原则的发展相抵触。

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否认苏维埃经济中利润的存在呢？一方面，这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国营部门中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的社会内容的对立性；把计划任务和要求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特别是已规定了很不合理价格的那些产品的生产企业）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方针“结合”起来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某些理论家信奉传统的说法，不考虑新经济政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追求脱离社会主义成分经营实践的抽象体系的某种倾向。

但苏维埃经济学家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研究剩余价值和利润范畴，首先立足于研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苏维埃经济发展的现实趋势。这部分学者承认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中，利润的存在是一种现实的范畴，而非假设的范畴，并指出了它新的社会内容。

例如，Г·扎伊采夫写道，在社会主义成分中，利润按其社会性质来说与资本主义利润有原则性的区别，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并被利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不言而喻，这里说的利润并非象托洛茨基分子所要求的那样通过提高价格去获得，而是靠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获得）。

Г·杜科尔在回答那些反对以取得利润作为企业方针的论敌时，正确地指出：存在不同的利润。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对不考虑其来源而谋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口号曾加以批判，但代表会议并未屏弃获得利润的原则。利润仍然是工业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因素。

Р·戈利德别尔格坚决捍卫利润的“权利”。他断定，由于我

们价格政策的特殊性质以及价格不依赖于供求，那种认为不可能或不必要确定利润率理论特别受欢迎。他接着写道：“假如在以核算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中，这种令人吃惊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计划经济思想本身由此而受到的损害将大大超过利润原则。”^①戈利德别尔格尖锐地指出，企图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从有利的经营中，从利润中解脱出来，应该认为是毫无希望的。

有趣的是，一九二八年在《计划经济》杂志上，讨论过在苏联条件下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规律问题。A·斯维特洛夫在纯粹逻辑构思的基础上，作出苏维埃经济中利润率将比资本主义制度下下降更迅速的“结论”。他的反对者M·B·约费在一九二八年上述杂志第四期上，同样以缺乏任何象样的统计材料而试图说服读者相信与上述相反的结论。自然，类似的文章都未促进该问题的解决，而只能使它模糊起来。

在进行某种总结时，可以说，总的来看，苏联经济科学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问题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实际上，二十年代已承认利润范畴作为国营经济部门剩余产品的形式而存在，弄清了它的新的社会内容，即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润的剥削实质，指出了它对国民经济的意义，它在经济核算企业的活动中的作用和所受的限制。只要对利润加以限制，它可以成为经济核算企业工作的可靠指标。

计划与市场

由于二十年代经济的多种成分的性质，市场是当时计划因

^① P·戈利德别尔格：《论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的计算方法》，载《工业化之路》，1929年第11期，第24页。

素和自发因素对立斗争的舞台。因此，在当时的文献中，积极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十分自然的。

市场是销售商品的领域。资本主义市场是再生产的一个方面，为剩余价值生产及其以利润形式的实现创造条件。商品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销售是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它具有自发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上，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生产的商品的销售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是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有利于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福利的。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国的经济包括三种主要成分：社会主义成分、小商品成分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其中社会主义成分起主导作用。与此相适应，市场是在社会关系的不同成分的条件下生产的各种商品的流通领域。在市场上，国家的、私人资本的和农民的利益交叉在一起。很清楚，销售的性质也是形形色色的：市场包含着计划的因素和自发的因素，而在销售领域也象在生产中一样，主导作用属于计划原则。同时，随着社会主义的临近，社会主义成分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计划原则在市场中的作用也相应地加强了。

在C·P·斯特鲁米林、P·M·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其他苏维埃作者的著作中研究了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这种结合的方法。

斯特鲁米林在《计划的问题和成就》一文中写道：“因为我们在商品货币范围内实行计划，因此，应该承认，正是直接根据这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条件而制定的方法是最适宜的方法。”^①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指出运用双重方法的合理性：“一方面，通过摸索市场容量、市场价格以及对某种生产的利润率作出在

^① 《经济生活》，1924年11月7日，第3页。

商业上是正确的估计,另一方面,通过计算专门的技术经济分析资料,以查明这种生产在经济中的相对作用。”^①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指出运用“专门的技术经济分析”的必要性时,力图答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除自发的市场以外,别无任何方法调节国民经济发展的谰言。

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在全苏第十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全苏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都提出过。在全苏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指出,必须“使国家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它们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一致”。^②

因而,早在二十年代,苏联经济科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斗争中,已指出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制订了这一结合的重要方法。经济学家们这一工作的成果,反映在党的决议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

托洛茨基主义经济纲领的批判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在苏维埃经济中起作用的似乎有两个根本对立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正是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内容。

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说法,在国营部门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正在消亡,价格、利润、利息、租金和其他价值范畴徒具形式,取代它们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及其范畴和

① 《国家计划公报》,1923年第3—4期,第7—8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5页。须要指出,在上述引文中,市场被看作为非国营经济内在固有的范畴。而实际上,各国营企业本身之间以及它们与经济管理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商品货币形式,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实现的。

工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主要是从国营经济综合体外部得来的、为国家所掌握的物质资源的积累。事实上，它所指的就是把资金从农业经济抽到工业中去。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硬说，在我们国营经济的基础上，劳动消耗规律不可避免地应该采取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形式，并且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必然与价格规律发生冲突和不断的斗争。

讨论会的参加者B·莫蒂廖夫、A·门德尔逊、T·别林、A·斯捷茨基和其他人都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方法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过渡时期的经济想象为各种社会经济成分机械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两个彼此对立的调节者，即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格(价值)规律在过渡时期经济中发生作用的结论。

然而，过渡经济各个部分之间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的。价值规律是反映各种经济成分以及由这些成分所代表的各种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的统一的规律。过渡经济中两种对立的趋势——社会主义的和商品资本主义的趋势的存在，造成统一的价值规律表现的双重形式，即在社会主义部门中的有计划的形式和在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自发形式。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经济概念反映出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立场，托洛茨基分子不相信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相信有可能对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需要把国家的社会主义部门和农民经济人为地对立起来，以便从中作出结论，似乎国营经济只有在剥削农业居民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触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在内)经济而自身能够发展的想法，无疑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并不在于

要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手中拿得比资本主义所拿的少一些，而在于拿得多一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为了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经济中“汲取”剩余产品甚至必要产品的一部分，建议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和降低收购价格以及无限制地发行纸币。

一九二六年，在共产主义学院召开的讨论会上，参加者坚决地屏弃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过渡时期存在着所谓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的谰言。

从党性和科学性上对托洛茨基的理论进行尖锐的批判，是同揭露他的实际建议的毫无根据相联系的。在报刊上，在党组织内的多次讨论中，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的共产党员们的发言中，在党组织的决议中，都揭穿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实质。

例如，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指出，某些经济机关错误地执行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争取盈利的指示，过分地把价格提高到只有支付能力较高的市场才能接受的水平。高昂的物价碰上了支付能力很低的广大农民市场。结果，商品卖不出去，工业也得不到预期的利润。^①实质上，这一部分决议是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批判，因为他们坚持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提高价格并在经济机构中贯彻这条路线。

在联共（布）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央全会上，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所持的为了积累和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就必须实行工业品高价格政策这一论点的绝对荒谬性。^②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6—377页。

② 同上书，第3分册，第257页。

布哈林的“劳动消耗规律”批判

众所周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根本问题的政策。他们坚持降低工业化和基本建设的速度，反对加快农业集体化的速度，保护富农。

右倾头目布哈林以“劳动消耗规律”来论证自己的政策。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胜利过程正是劳动消耗规律扔掉自己罪恶的价值外衣的过程，即价值规律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也是消除对主要社会调节者盲目崇拜的过程。在《关于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一书中，布哈林更为明确地说明了他对自己所简单地表述的那个规律的作用的理解：“计划原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预见那些势均力敌的自发因素的基础上。”原来，在布哈林的主观想象中，实际上把劳动消耗规律的作用，看成与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自发的价值规律的作用非常相似。他作出如下的结论，“劳动消耗规律”的作用要求恢复原来的价格，延缓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制止对国民经济比例的改变。结果是，布哈林的劳动消耗规律绝没有完全扔掉自己身上罪恶的外衣！

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一九二八年)的决议中，揭穿了右倾的阶级实质，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苏维埃机构和党的某些环节的压力，指出了右倾的政策与党的总路线的矛盾。全会确认，右倾机会主义成了联共(布)党内的主要危险。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一九二九年)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中指出，农民购入的工业品的价格还较高，而卖出的农产品的价格却较低，但这种超额税(“贡税”)目前还不能取消。同时，决议批驳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诽谤，似乎党在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一九二九年四月)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提出的五年计划的最低方案,认为它是一种完全抛弃党的政策的表现。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三〇年)斥责右倾是反映富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反抗。

苏维埃经济学家论价值规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当时仅处于形成阶段。一种流行的意见是,只有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九二五年一月,И·斯杰潘诺夫在共产主义学院做了题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报告^①。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而且也研究一般经济规律。参加讨论的十四人中,支持这一观点的只有两人。

直到二十年代末,在苏联经济科学中,政治经济学只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意见一直占统治地位。到了一九二九年十月,载有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所作的评论的《列宁文集》第十一卷出版以后,情况才开始变化。在上述评论中,列宁认为作者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告终的论断是不正确的。^②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关于价值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已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在共产主义学院中,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苏维埃经济中的价值规律》^③的报告进行了讨论。讨论不局限于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在讨论过程

① 《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25年第2卷。

②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③ 《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26年第14卷。

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经济观点的全部体系都受到了批判，因为在他的著作中，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得到最充分的反映。

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主义成分中，商品生产的范畴（价格、货币、利润等等）充满了新的内容，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集中点，因此，它们能够也必须被利用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共产主义学院一九二六年的讨论会以后，下述结论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即价值规律不仅在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中起作用，而且也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中起作用。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歪曲苏维埃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实际作用的概念，遭到有科学论据的强有力的批判。

三、战前五年计划和卫国 战争年代的商品理论

本章内容提要：重点介绍了三十年代苏联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初期，由于面包配给制、义务交售等引起“经济关系实物化倾向”，以及价格远远偏离价值的情况，经济学界流行的看法是，价值规律不发生作用，价格不过是国家自觉地实行计划领导的工具。到了三十年代下半期，开始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被改造过的价值规律”的观点仍十分流行。

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五年期间经济发展和 有计划利用价值联系的若干特点

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产党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终于在相当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了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所表述的国家工业化问题。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以热情奋发的英勇劳动在工业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战前十二年内，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五倍半。到四十年代初，我国已建立了多部门的社会主义工业，这是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我国国防能力的可靠基础。苏联在

工业总产值、技术装备方面已达到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保证了城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随后的胜利。苏联进入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

价值联系发展的特点

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决定了我国在制订商品货币关系计划及其利用方法中的许多独有的特点。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农业总产量，尤其是畜产量有所缩减，而城市居民对食品、工业对农业原料的需求却显著增长。所有这一切要求从自由贸易过渡到国民消费品定额化并实行配给制。实行配给制当时在经济上完全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在当时条件下，配给制不只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它还具有社会、政治的意义，因为保证了当时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

粮食匮乏的情况使执行按市场价格采购农产品的计划遭到了困难。需要以预购合同制来取代按市场自由价格采购的办法。这是必要的措施。初期，预购合同制增加了计划期间的采购量。然而，由于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价格的上涨，稳定的预购合同价格不再为农民所满意。在采购方面产生了各种新的困难。预购合同制必须以按固定价格的义务交售来代替。没有找到别的途径来克服粮食采购方面的困难。

这一经济政策的措施在当时条件下是完全正确和唯一可行的。但是它也有缺陷：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和义务交售固定价格低下的情况下，破坏了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即工农业、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除实行义务交售外，还以实物支付机器拖

拖拉机站工作的方式把产品交给国家支配。统一制订农业计划的方法同对农业的物质刺激结合了起来，但物质刺激实行得不够。城乡之间的联系逐渐丧失了商品性。

实行配给制和农产品的义务交售，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物物交换之广泛使用于各个工业企业之间，经济核算作用的削弱，价格与产品价值脱节等等，在经济文献中称之为经济关系局部实物化的倾向。但是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年）的这些现象根本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年代普遍的实物化过程。

其实，同实物化现象并行的还有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完善财政制度的过程。实际上，在三十年代初实行了接近市场价格的敞开的国营贸易，鼓励发展集体农庄贸易（从一九三二年起），指责了物物交换的现象，采取了巩固经济核算等等措施。党中央十二月（一九三〇年）全会指出，必须加强财政纪律，巩固切尔夫文，并同低估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中财政制度作用和意义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正如上面所说，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定额供应和配给制是必要的，但除了优点以外也存在着缺点。因为配给制和由此带来的多种价格给投机倒把、价值规律的自发实现，尤其是来自合作社组织的不正当地利用价格的行为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大大损害了苏联消费者的利益。多种价格限制了劳动的货币报酬的作用，限制了在生产中物质鼓励原则的贯彻。进一步保留配给制和多种价格，难免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障碍。

同时，集体农庄在组织上、经济上的巩固并由此引起的农业生产的高涨，工业生产效果的提高，消费品产量的增加，使供苏维埃国家支配的商品基金有了巨大的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根据联共（布）中央十一月（一九三四年）全会

的决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起废除面包配给制，以后又废除其它食品配给制的原因。

废除配给制是一个转折，随后，又贯彻了一系列措施，以便进一步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提高它们在刺激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地减少了纸币发行量，一九三六年在重工业中、一九三九年在轻工业中实行了价格改革。商品货币关系大约在六年时间内继续得到了急剧的发展。

卫国战争年代

但是，爆发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它要求全体苏联人民集中全部资源来粉碎万恶的敌人。很自然地，在管理国民经济和动员有限的资源中，统一原则和行政方法的作用大为增长。

定额供应和配给制重又取代了国民消费品的公开贸易。在劳动繁重的工业部门，由于工人的不断更换以及技能的急剧下降，在增加名义工资的情况下急剧增加了产品的成本。一九三六年价格改革后，经济核算得以巩固的大部分重工业企业重又亏本。大大扩大了补贴制的范围。

粮食和畜产品的采购价格，由于这些价格稳定不变，同时由于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中国民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持续上涨，而越来越具有象征的性质。在这些年代里，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把价格制度主要用于它的再分配职能。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为对发展社会生产实行物质刺激工具的作用就不存在了。

上面就是经济发展和在有计划领导经济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是正确地了解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五年期间经济思想发展所必须知道的。

论价值规律

二十年代的经济理论成功地研究了商品货币关系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在价格及其对比关系的动态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国民消费品价格的动态同居民工资和其它货币收入的增长形成了对比。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取消价值规律的作用完全不是眼前的事，因为整个苏维埃经济，作为一个体系，是一种商品经济。个别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不仅过渡时期的经济，而且已经获得胜利的、成熟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体系。

由于经济联系的实物化趋势，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似乎苏联经济已进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不断消亡的阶段，而价值规律已不再在苏联经济中发生作用，这种看法后来在经济文献中开始占优势。例如，一九三四年 И·拉皮杜斯和 К·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写道，我国的价格不是价值规律的表现，而是自觉的、计划领导的工具。^① 在高等学校苏维埃贸易经济教材中说，价值范畴同苏联经济完全不相容。^② 甚至在一九四〇年，当时已出现了重新承认价值规律作用的迹象，但在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书中仍然写道，货币形式并不反映苏维埃商品的价值。^③

如果我们说，权威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只是一种错误，那末就是回避了对重要的复杂问题的回答，并不能使读者满意。有

① И·拉皮杜斯和 К·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政治经济学》第1卷，莫斯科1934年版，第316页。

② 《苏维埃贸易经济》，1934年版，第384页。

③ 《苏维埃经济的发展》，莫斯科1940年版，第530页。

各种不同的错误。否认价值规律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有着一定的根据。因为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已经指出，象价值计算、劳动的货币报酬、信贷和银行等这样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杠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以苏维埃国家的正确政策为前提——在它的发展中包含着消亡的萌芽。”^①大多数人确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货币的自然经济的变种。所以在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了胜利。根据许多经济学家当时的看法，苏联经济应该从商品经济转变为自然经济，而在自然经济中没有也不能有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生产规律的地位。

但是看来，主要并不在于这种模糊的逻辑，主要在于经济关系的实物化趋势在三十年代上半期以各种形式相当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个趋势被认为是与建成社会主义基础有关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而实际上这是由单独一个国家在敌对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困难所造成的一种现象。

当时商品价格偏离价值很大。实际上，大多数重工业部门的出厂价格比价值和成本低得多。谷物和畜产品的采购价格至多只能补偿这些主要农产品生产费用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会得出有必要提高采购价格的结论。但这已经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最尖锐的政策问题了。这样，三十年代经济学家的立场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对价值规律决不可能局限于一种否定的说法。因为在苏联经济中，价格继续存在着。而价格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价格不再

^① 《共产国际纲领和章程》，党书籍出版社，莫斯科 1936 年版，第 104 页。

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对这个十分自然的问题通常会作出这样的回答：价格是有意识、有计划领导的工具。这一简单的提法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包含很多内容。它反映价格在苏联经济中的现实作用：苏维埃国家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价格主要是为了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运用经济核算，巩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体系，并提高人民福利，也是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尽管经济学家们在形式上不承认价值规律，但是这一规律在三十年代以及在苏维埃经济整个历史时期内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其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产品的价格充分保证了它们的生产费用获得补偿，并为在这些部门中实行经济核算创造了条件。在国民消费品的计划价格和规定的劳务价目以及名义工资计划水平的基础上，以国家为一方，工人和职员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等价交换（当然扣除那部分用于建立社会消费基金的份额）。主要农产品采购价格的低水平和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价格的高水平破坏了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这是不容争辩的。

虽然形式上存在着价值规律这一点也遭到了否认，但是价格形成问题还在探讨，也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时期，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实际上仍在继续。这说明理论落后于实践。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赶不上经济实践的变化，不是始终都能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前景。

此外，低估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以及在理论上否定价值规律，不能认为这只是经济关系实物化倾向（以及其它许多原因）的无害的消极结果。理论上的错误同样也会导致经济政策中的主观主义因素，成为在制订价格、实行经济核算和在国民经济中

贯彻列宁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中犯错误的原因。

关于改造价值规律的公式

三十年代下半期，特别在废除配给制以后，商品货币关系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阶段。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克服商品关系和取消货币的思想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强调指出有必要巩固苏维埃卢布和开展城乡经济联系。这些情况推动了对商品货币关系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而在研究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要回避价值规律作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开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书中第一次试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提出系统的论述。初稿作者一方面分析了苏联商品关系的特点，反映了各种观点，同时又否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经济学家和党的领导人会议上讨论了这份初稿。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受到了批判，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同价格、成本、货币等等这样一些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容的。会议接着对商品货币关系作了一系列讨论。在探讨商品货币关系，尤其是弄清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国家对其利用的途径方面，这次会议给予了经济科学极大的帮助。

Е·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写道，“但是众所周知，新事物没有立即为人们所接受。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作用这一论点并没有立即为经济学家所认识。为了把经济学家过去的观点同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表述的论点调和起来，它的第一批评论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文章《政治经济学讲授中的若干问题》^①一文的作者，提出了关于‘被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43年第7—8期，第75页。

改造过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论点。按照这种说法，就有可能认为多年来对价值规律的否定是正确的；因为这种说法仿佛在暗示：过去经济学家否定的只是老的价值形式，而承认它的新的、改造过的社会主义形式。”^①

关于改造价值规律的提法流行甚广，并且一直存在到一九五一年。尽管这种提法模棱两可，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所谓改造，不仅仅是指这一规律的社会内容的变化，而且指任何一种“限制”），但总的说来，起了进步的作用，为重新研究价值规律奠定了基础，导致最终承认价值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客观存在的必然性。

^① 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莫斯科1971年版，第32—33页。

四、战后时期(六十年代中期以前) 的商品生产理论

本章内容提要：着重介绍了有关商品生产存在原因的几种观点(核算和按劳分配需要论、两种公有制形式论、劳动分工和社会劳动的独特性质论、劳动分工和企业的相对独立性论,等等),以及对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作者认为,沃兹涅先斯基在四十年代关于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和分配的论述,有先见之明,已经“预见到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提法”。

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

在战后时期,社会主义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总产值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了五点九倍,国民收入增加了六点二倍。扩大了商品流通范围。在这一时期,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商品零售额,包括公共饮食业,增加了五点六倍。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二点二倍。

在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不仅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额有了增长,而且总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在向纵深发展。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七年期间,由于消费品奇缺,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它甚至成了居民供应的唯一可行的形式,但同时却损害了工人和职员在货币工资中的物质利益,因而无助于他们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配给制中的多种价格是投机倒把的培养基。

鉴于这个原因，一九四七年底在加速提高大多数最重要的消费品产量的基础上，在实行币制改革的同时，废除了粮食和工业品的配给制度，并过渡到按照统一价格开展广泛的苏维埃自由贸易。

废除配给制和实行币制改革，是为了全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以取代战时所特有的实物经济联系。随着向广泛的苏维埃自由贸易过渡，货币作为有计划地调节消费品生产并使之适应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居民的实际需要的工具的作用显著增长。消费品市场又反作用于消费品的生产领域。货币重新成了国民消费品按劳分配的主要形式。

发展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贸易和提高货币的作用，巩固苏维埃卢布，即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不仅不会招致经济中自发因素的增长，而且相反地会削弱经济中的自发性因素。实际上，通过币制改革，通过以国家和合作社出售的商品充分供应市场，无组织的集体农庄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便在短短的时期内降低了三分之二。无计划的、在一定意义上是自发的集体农庄市场立即受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强烈的经济影响，后者是通过国家和合作社所属的商店实行商品周转的。

币制改革巩固了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巩固了工业和运输业中的经济核算。

四十年代末，在工业中广泛地开展了拒收国家补助金并在降低成本和加速流动资金周转的基础上使企业取得赢利的运动。这些努力是以修改批发价格制度为后盾的。

一九四八年，对重工业部门产品批发价格和铁路运费的改革准备就绪，并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付诸实施。这一改革

为取消国家补助金制提供了基础。批发价格的改革对巩固工业和运输业的经济核算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科学依据。

至于工农业在生产上的相互联系，在实质上保留了它们在三十年代所采取的自然经济性质。实际上，农产品绝大多数是通过按照偏离价值的低廉价格义务交售的办法和集体农庄用实物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劳务的方式采购的。在城乡经济流通领域中，等价交换这一最重要的原则遭到了破坏。这种状况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不利于主要的农业生产部门的发展。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九五三年九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彻底改变当时采用的收购、采购和交售价格水平的决议。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八年期间，农产品的国家平均收购和采购价格增加了两倍，其中谷物为五点二倍，畜牧业产品为四点五倍，活性畜为十点八倍。^①

采购价格的提高并配合以物质刺激和物质供应方面的其他措施，很快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农业的总产量开始迅速增长：一九五八年为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其中种植业产量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四，畜牧业产量为百分之一百四十四。

改进价格体系是工农业之间按其本质多半还是自然经济的相互关系过渡到商品关系的必要条件。一九五八年，机器拖拉机站实行了改组。同年，颁布了六月三十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废除义务交售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支付实物报酬的办法以及关于新的农产品采购办法、价格和条件”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自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起，废除了集体农庄义务交售农产品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支付实物报酬的办法，并根据按全国不同

^① 《苏联农业。统计汇编》，莫斯科1960年版，第117页。

地区区别规定的统一价格采购的办法，过渡到国家采购农产品的统一形式。

从表面看来，已为农业生产今后的迅速增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实际则不然。一九五八年以后，农业的成就并没有巩固。这由许多原因所造成，其中之一是缺乏根据地、过高地提高了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备用部件的价格。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起，这些价格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同时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期间，几次降低了谷物、甜菜和向日葵的采购价格。甚至象向集体农庄出售技术装备这样一种原则上完全正确的措施，也对其中许多集体农庄的经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为集体农庄不得不预先付清向机器拖拉机站购买机器和其它劳动工具的款项。这是许多集体农庄一项沉重的负担。结果，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变差了。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尽管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支付给集体农庄庄员的货币和产品反而减少了。

在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尽管采用了地区的原则，工业和运输业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总的说来还是有所提高。在经济发展的计划领导中，开始更有效地利用价值关系。例如，在确定国民经济各种比例时，在更大程度上开始考虑到最重要的价值规律要求，如减少单位产品中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

把商品货币关系广泛地作为战后时期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工具，对提高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物质福利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诚然，这个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价值关系的运用并不始终是十分得心应手和坚定不移的。有计划的经济管理方法开始同生活中的各种要求发生矛盾。于是产生了实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商品生产的增长，各种商品货币关系的向纵深发展，它们积极地作为有计划地管理经济发展的工具——所有这些过程应

反映在战后时期的经济理论中。实践迫切要求理论上弄清楚自觉利用价值关系最有效的途径，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生产效果。下面我们将探讨理论是怎样完成实践的这一“定货”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及其特点

前一个时期，在理论上探讨了一系列重要的商品生产问题。承认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商品生产及其各个范畴：商业、货币、价格、工资、利润等等，因而也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

但是，生活在前进，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只确认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可以并存是不够的。还必须论证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并说明其特点。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对这个问题只作肯定的回答是不够的，还必须弄清它的内容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它加以利用的途径。正是这些问题成了这一时期经济学家在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研究对象。

战后几年的条件对此是有利的。在商品生产问题上，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所存在的否定价值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的作用这一难以克服的障碍被消除了。经济理论发展的一般条件向着有利的方面变化。普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客观的经济规律，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这本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第一次单独列出一章来论述价值范畴的客观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

我们认为，论证这些或那些经济关系（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继续形成着）的必要性，这是经济科学理所当然的任务。对商

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必要性的研究也是合理的，何况以往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即使在现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那种肯定的回答。

在对商品生产必要性的头几次解释中，有一个解释称为核算分配概念。^①它的实质如下：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是根据每个工作人员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物质和精神财富。为此，必须对劳动进行核算，然而，一个工作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并不相等于另一个工作人员的劳动。要直接用钟点来核算工作时间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借助于价值即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来间接地核算劳动的成果。但是既然有价值，即劳动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那末象贸易、货币等等这样一些工具也就用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工具。

类似的论据也见之于H·A·沃兹涅先斯基的著作。他以按劳分配的必要性来说明价值规律的存在。他写道：“只要存在着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要产品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时，也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指标，即由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的价值。”^②价值规律的存在，就是意味着必须按货币计算，而不仅是按实物计划和计算生产消耗。

核算分配概念广泛流传了八年左右。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它注意到了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因素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把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产品都列为商品。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48年第7—8期（编辑部文章）。

② H·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译文参阅莫斯科1948年中文版，第137页，以下同。——译者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召开了由党中央组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这本教科书第一次以大量篇幅论述社会主义。它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批判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观主义的观点，表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对其他的经济规律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证。

讨论会也对有关商品生产问题的各种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次讨论会以及一九五二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以后，一种对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的新的解释开始流行。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按其本性来说，不是商品生产，而商品货币关系乃是资本主义的一般遗毒。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商品关系的原因，是由于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这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在国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这两种社会主义生产基本形式存在的条件下，国家只能支配国营企业的产品，而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工业品，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我国象三十年前即新经济政策初期一样，是必要的。斯大林写道：我国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他对生产资料的非商品性质作了如下的论述：在生产资料交换时并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如何对待价值、成本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回答道：这仅仅是事物的形式。可见，在作者的观点中，有自相矛盾之处。

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以生产资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为理由来解释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始终在我国科学和教学书籍

中占主导地位。^①

这种解释优于核算分配概念，因为生产的存在已不再同分配关系，而同生产关系本身发生联系。但是另一方面，却后退了一步，因为它把生产资料排斥于商品关系范围之外。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重视经济科学的状况及其发展的任务。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行了关于价值规律以及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如何利用这一规律的问题的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对紧密联系实践、发展商品生产理论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会议进程中，广泛讨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问题。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作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及其特点》的报告。他坚持这样的论点，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同时，他批判了这样的理论：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似乎不是商品，而只具有商品的纯粹的外壳。^②

在会议发言者中间，只有少数人（H·C·斯皮里多诺娃、B·Ю·阿洪多夫、И·А·维亚齐明）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所有制形式这一解释。其他接触到这个问题的人则注意到 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在逻辑上的混乱，因为他认为下面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即在国营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商品；但同时，他又认为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

^① 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莫斯科1954年版；Л·马伊津贝格：《苏联国民经济中价格的形成》，莫斯科1953年版；B·П·季亚钦科：《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莫斯科1953年版；И·维亚齐明：《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莫斯科1953年版；Г·М·波多罗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列宁格勒1953年版，等等。

^② 《价值规律及其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运用》，莫斯科1959年版，第12页。

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

按照B·П·季亚钦科的看法，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性质作如下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社会劳动的独特性质，而社会劳动又决定着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性。

在一九五七年经济研究所科学讨论会后，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问题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①、在一九五九年十月顿河罗斯托夫市高等院校的会议上^②、在杂志、小册子和书籍中继续进行讨论。

除了上述观点以外，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观点，其内容已由Г·Б·普拉沃托罗夫汇编成册^③。普拉沃托罗夫得出结论：其中每一种观点都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综合，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每种观点的维护者们在其他的理论体系中都能找到不论是立足点、论据体系或最后结论方面的缺点。作者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表明有必要继续开展研究工作，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

我们觉得，从Г·普拉沃托罗夫介绍的各种解释商品生产必要性的见解中，可以得出比作者本人所作的更为具体的结论。对商品生产必要性的各种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商品生

① 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及其作用》，莫斯科1959年版。К·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Н·赫辛、И·科佐多叶夫、И·维亚齐明、Н·查戈洛夫的发言。

② 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顿河罗斯托夫市召开的高等院校科学会议材料，莫斯科1960年版。З·阿特拉斯、К·波格列茨斯卡娅、А·卡辛科和本文作者的发言。

③ Г·普拉沃托罗夫：《价值范畴和生产方式》（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第155—182页。

产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个别方面联系起来,可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主要原因,必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中,即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去寻找。但是这样的回答仍旧很一般,因为商品货币关系本身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因素。在我们看来,商品生产的直接原因在于,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多种多样的。以国营企业为一方,集体农庄为另一方,由于它们对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关系,彼此是独立的。各个集体农庄,作为不同的所有者,是彼此独立的。各个国营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占有者,也是彼此独立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在副业经济中生产的,集体农庄庄员就是它们的个人所有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他们所获得的收入的所有者。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各个不同环节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并决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存在。

绝不能以为通过纯粹逻辑的论证来解释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一九五七年的讨论会上,B·T·温热尔在论证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援引了“来自实践”的理由。他说道:“苏联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没有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不可思议的。”^① A·帕什科夫号召正视事实。他说,现在也许是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严肃地对待在苏维埃经济中存在已不止一个十年的商品生产,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早已为实践本身所证明的时候了。他援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把商品生产作为历史地形成的事实加以分析那段话。

^① 《价值规律及其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运用》,第265页。

A·帕什科夫说道：“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实践令人信服地、不容置辩地证明，没有商品生产，没有使城乡、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相联系的市场形式，无论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活动都不可能顺利地展开。早在一九二一年，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必要性，已在列宁的著作、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得到了证实。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同所谓‘左派空谈家’的斗争中也同样得到了证实，由于新经济政策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左派空谈家’们便硬说贸易、货币、银行体系以及商品生产的其他因素和杠杆似乎在当时已面临末日。

“以后的全部实践也证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集体农庄农民，而且对工人阶级来说，贸易、市场仍然是经济联系的必要形式，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党也不可能向劳动人民提出更好的形式来代替这个经过人类几千年实践的考验和检查的联系形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应该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特点。”^①

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经济的观点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必要的。除了这种意见以外，在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上半期，还有不少同志在会议和报刊上发表看法，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形式并不反映商品的内容，而价值规律则似乎不起作用。

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会议上，主要在H·赫辛

^① 《价值规律及其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运用》，第181—182页。

和 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之间就这个问题开展了一场论战。H·赫辛所提出的论据的实质如下：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所以在书籍中所碰到的诸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这样一类提法，应该说是确切不确切的。按照他的意见，我们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关系的形式，但是我们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这种关系的实质。商品之徒具形式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而价格政策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全部规律的要求为基础的。^①

在 H·赫辛的提法中也有合理的内核。譬如，关于社会主义不只是“商品生产制度”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的概念也是确切不确切的，价格政策同样应考虑到社会主义其他经济规律的要求，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赫辛却由此得出了毫无根据的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他的这一极端的观点在会上没有得到直接的支持。

在其他一些同志的发言中则低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例如 H·科佐多叶夫、H·维亚齐明企图使与会者相信国营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H·查戈洛夫宣称，在二十年代末到一九四一年开始之前这一段时期中，否定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的作用含有合理的内核，因为这个观点反映了“再生产过程服从新的历史规律即社会主义再生产规律这一历史事实”。^② M·科尔加诺夫重新用核算分配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

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令人信服地说明，H·赫辛的观点

① 《价值规律及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第 56、63 页。

② 同上书，第 172 页。

的错误根源，在于以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在于使形式脱离内容并学究式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实际上，H·赫辛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名符其实的商品生产。列宁写道，形式是非常重要的，而H·赫辛则硬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对判断隐藏在这一形式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实质并不提供任何依据。为了证明他所说的似乎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必要性的话，赫辛援引了列宁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的下述名言：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为商品”。^①但同时，赫辛却没有考虑到，在十月革命以前，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仅是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没有考虑到列宁在《指令》中所提出的为了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而允许仅限于在地区流通范围内开展贸易的问题。关于有必要控制贸易和发展贸易的结论是在以后才作出的。但是H·赫辛忘记了真理的具体性，忘记了如果不考虑某种论点是在哪种社会经济状况下提出的，就决不能正确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论点。

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这一思想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由З·阿特拉斯提出的。他说：“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商品货币形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决不能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看作为商品经济制度的变种，即使加上‘特种’两个字。社会主义生产，这是直接社会生产，它在实质上并不是商品生产。”^②阿特拉斯说的不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4页。

^② 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问题》，1950年（疑为1959年之误——译者）10月在顿河罗斯托夫市召开的高等院校科学会议材料，莫斯科1960年版，第90—91页。

是商品生产，而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继承下来的商品货币形式。这种观点在 K·波格列宾斯卡娅和本文作者的发言中受到了批判。阿特拉斯把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因而不止一次地自相矛盾。他不是把自给生产，而是错误地把直接社会生产同商品生产对立起来，企图以此来加强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生产非商品性质的结论。

然而，如果我们请教一下《反杜林论》，我们就不难确信，恩格斯是把“直接社会生产”这一概念作为自然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来使用的。恩格斯说：“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给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①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经济的体制是自然经济，这是不容争辩的。至于生产，那末它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因而，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不是直接的社会经济，而是商品经济才是自然经济的对称。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出版了 H·马雷舍夫和 B·索波里的两本专题学术著作。书中同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经济学家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许多作者简单化地解释价值规律的一种反应，后者把这个规律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348页。

作是资本主义的某种胎记，看作是某种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相容的东西。但主要的，正如 J·加托夫斯基和 M·萨科夫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在于马雷舍夫和 B·索波里毫无根据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量齐观。索波里提出的理由是：劳动产品在苏联并不是彼此没有联系的私人劳动的结果，价格不是在竞争的影响下制订的。马雷舍夫同样正确地写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产品反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是自发势力的承担者。从这些正确的前提中必须得出结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彼此有着本质的差别。可是索波里和马雷舍夫却不然，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存在，以节约时间的永恒规律来偷换价值规律，而节约时间规律的作用可摆脱现实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马雷舍夫和索波里的看法在 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的专门著作中受到了详尽、有力的批判。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在他的著作中指出，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任务不相容的。^①

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这一段时期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不相容这一观点如此流行呢？这个时期本来是经济关系继续摆脱实物化和国民经济中广泛发展商品货币联系的时期。我们觉得，这些观点一方面同党在有计划地领导经济管理中广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时碰到的困难有关，另一方面同进一步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内容，同加强社会主义的计划性有关，这种加强被这些经济学家理解为是对商品性质的否定（因为在他们的概念中，名

^① 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共产主义建设与商品货币关系》，莫斯科 1962 年版。

符其实的商品生产乃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在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经济学家们开展了大量工作，以克服这些错误的观点。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特点

在上述二十年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科学不仅仅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而且为阐明它的特点做了许多工作。

在这些年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这个提法得到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受限制的，因为劳动力不是商品；工厂、土地和地下矿藏是国家的财产，也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根据这些原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同于以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它并不产生人剥削人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不是牟取资本主义利润，而是最充分地满足社会及其成员不断增长着的需要。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企业和劳动者实现的，因此它们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同社会主义相敌对的形式。在三十年代的文献中，苏维埃贸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财富分配的形式，而在四十年代，则被看作交换的形式。H·沃兹涅先斯基写道：“苏维埃贸易基本上和绝大部分是由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交换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或货币——商品的交易，大多是各个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其中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商品交换，或者是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借以取得其在社会

产品中所应得份额的形式。”^①（顺便指出，沃兹涅先斯基不仅把个人消费品，而且把生产资料，其中包括在国营企业之间流通的生产资料也列入商品范畴。）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它不同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它不是自发地而是有计划地发展的。这就是说，社会有计划地确定社会的各种需求，并根据社会的需求和现存的资源来确定产量，制订商品流通计划等等。

商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经济范畴，还有完整的一系列特点，对此我国的科学家不是立即就认识到的。譬如在四十年代末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矛盾，但并不存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后来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但它与资本主义下的矛盾不同，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可以通过商品的计划销售加以解决。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直接社会劳动的两个方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依然存在，但对抗性消失了，结果个别劳动时间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利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竞赛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货币理论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揭示了货币的新的本性，表明它是为共产主义的建设服务，并反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职能的问题，表明了货币的特点。在一九五一年经济讨论会以前，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否定苏维埃货币同黄金的联系。在讨论会以后，绝大多数人开始承认：

^① H·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第115页。

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里，黄金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在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富有成效地研究了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它的性质和特点问题，也研究了它的各种不同范畴的作用。

论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在苏联 国民经济中的利用

价值规律的作用

对战后时期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的首批经济学家之一，就是苏联卓越的经济学家H·沃兹涅先斯基。

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而经济计划是这一发展的准则。但他并不到此为止，接着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究竟是否存在为社会主义计划必须考虑的经济规律呢？”回答是：“这种规律当然存在，并且对它们不能不加以考虑；只有掌握了经济规律以后，才能利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谋利益。生产费用和产品分配最起码的规律，就是苏维埃经济中经过改造的价值规律。”^①正如上面所指出，他认为这一规律之所以存在，是由按劳分配决定的。

按照沃兹涅先斯基的看法，价值规律的作用表现如下：第一，必须按实物和货币核算并计划生产费用；第二，国家计划利用价值规律来确定产品生产方面的必要比例；第三，国家计划根据社会主义利益，利用价值规律来正确分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间的社会劳动；第四，产品交换是借助于价格来实现的，而价格

^① H·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第137页。

就是产品价值的货币表现。^①因此，价值规律不仅仅在产品交换中，而且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同样起着作用。沃兹涅先斯基写道：“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业已改造而专为国家计划服务的一种决定生产费用、决定产品分配和产品交换的最起码的规律。”^②我们看到，他承认价值规律在发展生产方面以及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领域之间的劳动和生产资料分配方面所起的调节作用，从而预见到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提法。

И·沃兹涅先斯基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规律之间的原则差别提供了有科学意义的说明。他写道，在我国“没有什么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看来是对抗性矛盾——作者注）。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危机的胚胎。在苏联，各个工人创造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与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之间没有矛盾，因为具体形式的劳动是预先由计划按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在各个生产部门间加以分配的，所以它是社会所必需的，是社会总劳动中必需的一部分”。^③

即使从当前的观点来看，下列的提法也是正确的：各种具体形式的劳动是有计划地加以分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劳动是社会所必需的，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具体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但是，这并不排斥这样一种情况：计划决不能合乎理想地估计到各种社会需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销售问题；在我国，只有在某种劳动的产品出售，即找到消费者以后，这种具体劳动的消耗才最终地符合社会的需求。实际上，在社会主义

① И·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第137—139页。

② 同上书，第139—140页。

③ 同上书，第140页。

制度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它并不带有对抗的性质。在我们看来，否定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战后不久，许多国民消费品感到不足，这样的商品销售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

И·沃兹涅先斯基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发展引起了各种矛盾和对抗，这种矛盾和对抗是资本主义社会自发发展的动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动因是“制订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

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因此价值规律通过价格表现，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起码的常识之一。然而长期来，否认这一原理适用于苏维埃经济。看来，И·沃兹涅先斯基是在报刊上公开表示不同意这种否定的第一个苏联经济学家。我们在他的书中可以读到：“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价格是以商品的价值或生产费用为基础的。”^①然而，接着他又说：苏维埃国家总是自行规定每一种商品的具体价格及其偏离价值的程度。在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大偏离它们的价值、重工业品的价格水平低下的条件下，这些话，按其实质来说，并没有错，同时还是一种相当勇敢的声明。实际上，这些话会使读者的头脑里立刻产生修改采购价格必要性的问题，因为采购价格的水平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

И·沃兹涅先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货币流通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他写道：“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是不能没有止境的。流通中货币数量的过度增加，就会损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质刺激，特别会损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物质刺激。流通中多余的货币造成过高的需求，但却找

^① И·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第115页。

不到充分的商品供应，便会降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质刺激，并引起集体农庄市场上价格的过度上涨。”^①

在党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讨论会上，对改造价值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不正确的，并且强调了价值规律的客观性质。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是这样做的，这部著作对今后分析价值规律的作用起了肯定的作用。斯大林有根据地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存在的事实中推论出价值规律作用的必要性。他写道：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交换。

价值规律通过消费品的价格影响生产。这种影响表现如下：消费品的价格影响名义工资的水平；企业用于支付工人和职员工资的费用作为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在成本之中；利润额和赢利率取决于成本的水平。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赢利、成本、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意义。所以，社会主义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

至于经济核算是否适用于集体农庄的问题，那末，回答在实质上是是否定的。如果回想起斯大林认为有根据的各种主要农产品当时采购价格水平的低下程度，这就很清楚了。“价值规律对农业中所生产的原料价格是否有调节作用？”这个问题，他作了否定的回答，并不是偶然的。

斯大林认为下面这个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即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价值规律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他用下面的

^① H·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第131页。

话作为理由；在我国，赢利较少的重工业比最能赢利的轻工业发展快。然而，他又作了如下的保留：他并不排斥赢利的原则，但不从一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从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

这样的提法对三十年代和战争时期来说或多或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当时存在着两种价格水平，并且大多数重工业企业是不能赢利的。但是到五十年代初，情况就开始有了改变：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零售价格实行了有效的改革，废除了补贴金制，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提高了赢利水平。从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考察国民经济赢利的提法，尽管含有合理的内核，但已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实际状况了。

斯大林认为，公有制似乎限制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影响”生产的程度，起限制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实际上，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限制价值规律，而是改变它的社会内容和对计划性产生作用的自发性质。

斯大林从上述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地位和作用的概念出发，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认为商品流通是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认为必须向城乡之间的产品交换过渡。他认为“换货”制是产品交换的萌芽，虽然实际上这种制度是由于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不足而产生的。他写道，必须坚定不移、毫不犹豫地实行产品交换制，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斯大林之所以坚持不懈地论证实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是因为他把这一措施看成是使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手段。这意味着否定生产的主导作用，并认为交换领域中的变化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决定性手段。

总的说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阐

述的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看法，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各种观点前进了一步。实际上，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由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条件决定的。斯大林有根据地批判了有关改造价值规律的公式，认为这是为主观主义地解释价值规律提供借口。

但是，斯大林的看法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商品生产的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而价值规律被看作为仅仅影响生产和不参与调节生产发展的流通领域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的观点比H·沃兹涅先斯基的看法后退了一步。

理论的真正意义多半是由实践对理论的“反应”决定的，“来自实践”的论据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令人信服的。而在实践中获得什么结果呢？斯大林建议毫不犹豫地缩小商品流通。然而在他的书出版以后，商品货币关系大大地发展了。他断然反对提高谷物和畜产品的采购价格，但是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一九五三年）的历史性决议以及党和政府以后的各项决议，采购价格的水平向着急剧提高的方面变化，如此等等。

斯大林的观点对经济理论起了自相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促进了对一系列有关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发生作用的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它促使人们对价值规律作学究式的解释。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二十大的决议有助于健全经济科学中的状况。M·苏斯洛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经济科学的状况作了原则性的评价，并确定了经济科学长期发展的总方向。他说，经院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脱离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现象在一些经济学家中间十分普遍。

一九五七年五月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讨论会是探讨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总结性的

阶段。И·加托夫斯基作了《价值规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作用》的报告。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利用价值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以利用价值规律为基础的、有计划地经营企业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就是经济核算。他批判了会议以前广泛流行的否定经济核算这一范畴适用于集体农庄经济的观点。他谈到了赢利的作用，认为在评价企业工作和确定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经济效果时，应考虑到赢利问题。

在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价值规律首先是生产的规律，这种意见没有受到反驳。М·沃尔科夫不同意价值规律影响生产的提法，他说：“有人认为价值规律处于某一离开生产的地方，并从那里‘射击’生产。结果是，价值规律似乎并不是生产的规律。显然，我们要谈的不是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而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范围内的作用。”^①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有计划地扩大和完善整个社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而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这一原理看来得到了所有谈及这个问题的人的支持。

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提法的含糊不清和消极性质引起了许多与会者对它的批判。例如，Н·维诺格拉多夫抱怨说，在我国的书刊中，当论及规律时，价值规律有时特别受到歧视。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这一章几乎是一张限制价值规律的清单。И·康托罗维奇注意到了忽视价值规律的危险性。他说道，虽然“在这里谁都不反对这个规律”，但是“有些同志力图回避价值规律，既承认规律又认为它不合法”。^②

关于用有计划的发展规律来限制价值规律的提法，与对价

① 《价值规律及其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运用》，第277页。

② 同上书，第282页。

值规律的解释有关。这种解释认为：似乎价值规律“自古以来”就被赋予自发性的“基因”，它不依赖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不依赖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会上，甚至在会议以前，^① 这种意见已受到了批判。

^① 例如，A·诺特京写道，自发的因素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典型特征（《共产党人》1956年第11期，第54页）。A·巴丘林的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苏联财政问题》1956年莫斯科版，第4页）。对此，本书作者也曾有过论述（《列宁格勒基洛夫工艺学院丛刊》1957年第9期，第61页）。

五、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理论

本章内容提要：本章着重论述了“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新特点”：商品生产不能成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生产的计划性和商品性的无矛盾的结合，等等。文章还提出了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分配、消费的三大功用，以及利润的三大职能，并说对价值规律作用的任何限制都是错误的。文章透露，有的经济学家已经承认，在今日的苏联，劳动力已成了商品。

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特点

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点

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表示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是苏维埃经济在其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内所固有的。但是在现阶段，它获得了独有的特征。这种特征之一就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本身愈益迫切的需要，成了迅速提高生产的重要经济前提之一。”^①

^① 《苏共第二十四大材料》，俄文版第41页。

这不仅仅因为党奉行了进一步加强对劳动的物质和精神刺激作用的路线，而且还因为劳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对效果较好的劳动实行高报酬，这不仅仅是对工作人员进行鼓励所必需的，而且也是有效地发挥工作人员的劳动能力和干劲所必需的。

在管理中利用价值关系

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中心方针是把集中领导同广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价格、利润、信贷等等范畴正确地结合起来，把它们看作是制订统一计划和影响人们兴趣的工具。

除了各种实物指标以外，价值指标，如已售产品的销售额（以主要品种划分）、利润、赢利率、预算交款、预算拨款、统一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和工资基金，现在已成了企业和经济机构计划中极重要的质量指标。从一九七二年起，在统一计划的主要指标中，还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在质量方面达到世界标准的新产品的生产任务。

价值规律以及全部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内容。所以很清楚，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它们在我国经济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

价值范畴，作为有计划管理经济发展的工具，它的作用有了提高，这反映在苏共第二十四大的材料中。

柯西金在代表大会上说：“党中央和苏联政府认为，……商品货币关系能够而且应该用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领导和根据经济核算的原则发展企业和联合公司的主动精神。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内容。不言而喻，我们摒弃任何以市场调节偷换国家统一计划的主导作用的错误观

点。”^①

在一系列价值规律的工具中，柯西金特别强调价格这个工具，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经济管理的强大杠杆。

党的第二十四大规定的价格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行经济刺激。

为了促进具有高度生产率、可望投产的新机器的制造和利用，由生产这些机器所得的盈利应借助于价格在生产和消费单位之间进行分配。对结构较完善的产品规定价格补贴，以加强企业从物质上关心科学技术的进步。

零售价格对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取决于零售价格的水平。

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保证人民消费品国家零售价格的稳定，并根据商品资源的积累而降低某些商品的价格。

为什么要在计划中规定稳定零售价格的任務呢？问题在于：企业和经济机构，作为产品生产单位，在销售产品时往往希望自己的产品定价高些，因为这影响他们活动的经济效果。当然，在生产的新商品确实质量高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可以高于老的产品。但遗憾的是，企业往往为了提高价格，给某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一些只是象征性的变动。

政府、国家价格管理机构对那些抬高价格的人严惩不贷。И·И·勃列日涅夫说：“必须坚决取缔抬高价格的现象，加强对制订零售价格和日常生活劳务价目的监督，对那些企图逃避国家规定制度的企业和经济机构的领导人严惩不贷。”^②

^① 《苏共第二十四大材料》，俄文版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53页。

发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特点

共产党在科学地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必要性的结论。科学院院士 И·费多谢耶夫写道：“对党和政府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在苏共纲领、第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文件中，清楚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和特点。”^①

绝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客观上需要存在商品生产，而商品货币关系则在经济计划管理中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利用。

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和计划性

此外，所有的苏联经济学家一贯强调价值联系的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内容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计划性。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因而它不能成为经济中发展资本主义剥削、扩大自发因素的温床。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商品是在有计划地活动的社会主义企业里生产的，并且是在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上出售的。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是同志般协作和互助关系的承担者，是各个企业之间、国家和生产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承担者。所有这一切表明，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新的社会内容。因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发展的经常性结果，不只是增加社会总产品，而且是社会主义生产关

^① 《共产党人》，1972年第1期，第67页。

系的扩大再生产。

正因为如此，在苏共纲领中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这些发展经济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①

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提高经济计划性的程度，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但是这个过程是同扩大商品货币关系（即扩大商品流通规模，提高货币的作用及其职能，提高社会主义企业活动中的价值指标等等）同时发展的，而且两者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生产愈益成为直接的社会（有计划的）生产，同时商品货币联系的规模和范围也不断扩大，它们愈益广泛地用于经济管理的实践中。经济过程中的这一现实矛盾在不久以前曾难住了许多经济学家。但是现在，情况改变了。

现在经济学家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必然同它的直接的社会性质结合在一起。这已经不再是一种怪论了。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这一提法的现实含义是什么呢？它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地发展的。生产某种产品的国民经济计划在这种产品还未在市场上出售以前（不同于资本主义）就预先考虑到社会对它的要求。可以说，产品的销售只是最终证明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的社会性。

И·阿巴尔津成功地揭示了计划性和商品性的相互联系和结合。他写道：“计划性从经营方式上，即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说明生产关系的体系；而商品货币关系则说明经济关系的形式。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是不善于区别下述两个方面的结果：建立和维持经济联系和关系的方式以及它们的形式。计划性的

^① 《苏联共产党纲领》，俄文版第89页。

对称是自发的经营方式，而商品货币关系的对称则是经济关系的自然形式”。^①

劳动力的非商品性质

经济改革迈出的头几步导致了理论上某些意外的结果：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尽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也是商品，因为存在着劳动力的雇佣。但是类似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支持。相反，它们遭到了一致的、论据充分的批判。^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存在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并与之相分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则并不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起，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要产品的量并不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工作者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结合，具有直接的性质。

那末，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雇佣”是指什么呢？对这个问题，A·鲁米扬采夫院士、T·哈恰图罗夫院士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A·帕什科夫在他们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作了明确的回答。他们写道：“与资本主义不同，‘雇佣’在社会主义

① И·阿巴尔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莫斯科1973年版，第64页。

② 见《真理报》1968年3月4日A·鲁米扬采夫院士、T·哈恰图罗夫院士和通讯院士A·帕什科夫的文章；《真理报》1970年10月30日И·索洛维耶夫的文章；A·巴丘林：《管理的计划经济方法》，莫斯科1973年版，第169—171页。1972年11月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社会经济问题”全国性讨论会上，许多发言者批判了劳动力的商品性的说法。有50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或作了书面发言，可是没有人支持这种说法（见《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书，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义制度下并不是两个对抗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而具有另一种社会含义：吸收社会成员参加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过程的某种方式。

“这种现象的上述社会含义并不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有所改变：生产工作人员按自己的劳动领取工资；工资……是社会产品份额的货币形式，而这种形式是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产品的劳动相适应的。”^①

不久以前，从数量上限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提法几乎成为公理，因为只有消费品被认为是商品，而在国营经济部门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则不是商品。但是在五十年代下半期，这种限制取消了，因为经济科学在经济实践的影响下摈弃了这一观点。在制定生产资料的价格时，开始考虑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国营企业有权出售它们所不需要的设备，机器拖拉机站实行了改组，集体农庄有权购买拖拉机、汽车、各种农业机器。经济学家观点的改变反映了在经济本身中有计划地利用价值关系时所发生的现实变化。

按照现代的看法，整个社会主义生产两大部类的产品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是具有商品性质的产品。劳动力的非商品性质丝毫不改变上述情况，因为现在，不仅是国营企业和机关的劳动报酬，而且集体农庄劳动报酬的基本部分，都不是按实物形式，而是按货币形式支付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在数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而在于它的社会本性，它的经济内容，它的性质和它的质量改变了。

再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

然而，有些经济学家仍然对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

^① 《真理报》，1968年3月4日。

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合理性提出异议；而且，由于在实行经济改革过程中碰到了一些困难，他们近来甚至活跃起来了。^① 这些同志认为，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商品、货币、价格仅仅是一种外壳，是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纯粹外表的形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没有价值规律的地位。

例如，H·赫辛认为，在我国经济中，没有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场所和条件，“价值规律……正在退出舞台，让位给按计划发展的规律。”^②

同时，正如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赫辛把计划领导的实质归结为“过度的集中，而不给企业及其集体的独立性和主动创造精神留下任何余地。但是，这种观点是同目前所实行的经济改革的原则相矛盾的。”^③

在我国的经济著作中，这种观点受到了批判，批判的方法多半是揭示它的支持者的逻辑结构上的弱点；但是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标准：即这种理论对经济实践究竟起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譬如，A·巴丘林针对这个问题写道，“实践经验证明，发挥企业和联合公司的经营主动精神、巩固经济核算制、运用有效的刺激，同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范畴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否定商品生产、低估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经济学家，其观点不能对完善经济制度起促进作用的原

① 见B·米涅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后记（莫斯科1965年版，第574页）；《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中的商品货币关系》，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4页；《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卷，社会主义部分，莫斯科1974年版，第263页。

② H·赫辛：《列宁论商品生产的本质和基本特征》，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83页。

③ K·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莫斯科1971年版，第54页。

因。”^①接着，作者具体地指出，否定商品生产丝毫无助于经济实践解决这样一些迫切的问题，如巩固经济核算关系、加强价格和利润的作用，改善批发和零售贸易的组织等等。

弄清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特点，在现阶段经济学家的学术著作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但是，同以前一样，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

价值规律的作用

过去，对价值规律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看法曾有过几次反复：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认为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在苏维埃经济中，价值规律虽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但仍然发生作用；在整个三十年代期间，虽然经济实践在领导经济中利用了价值杠杆，但它的作用却在理论上被否定了；在以后十年左右内，价值规律以“改造过”的形式发生作用的提法占统治地位；一九五一年召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后，关于改造规律的提法被否定了，而代之以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对它作了一系列的限制。以后时期总的特点是重心转为积极地弄清价值规律作用的特点。同时，从一九五七年起，对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研究同分析价格形成的过程紧密地联系起来。

这一论述价值规律问题的发展过程，不论看来多么肤浅，但可以从其中看出明确的倾向：价值规律及其新的社会主义内容正在日益巩固它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的“公民权利”。现在，

^① A·巴丘林：《管理的计划经济方法》，莫斯科1973年版，第161页。持这种看法的还有C·别尔乌欣（见《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莫斯科1974年版，第175页）。

承认具有新的社会内容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已经在苏联经济科学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价值规律作用的新内容和计划性

价值规律的一般定义是众所周知的,根据这一定义,价值是由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量所决定的,而商品交换是在等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一般的定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一般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而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特种商品生产,在这里,全民所有制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这个原因,反映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主要特点的定义获得了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内容,在于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在社会主义企业有计划地活动过程中消耗在商品生产上的抽象社会必要劳动量。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有计划的交换是在等价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的。等价交换有助于补偿生产费用,并使每个正常工作的企业取得一定的利润,有助于对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实行物质刺激。

就价值规律作用(即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消耗有计划地制订价格)所造成的经济结果而言,经济科学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这种制订价格的方法在对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效率、实行经济刺激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在采用新技术、根据现代科学组织劳动的企业中,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销售这一产品的社会价值。这样的企业显然收入比较高,利润比较大,效果比较好。由此,它们通常获得较多的资金,为扩大生产、对本企业工作人员进行物质鼓励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创造更多的条件。

另一方面,显然有这样的企业,它们跟不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它们产品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结果它们的收入就不高。但是它们应该完成计划规定的产品销售量、劳动生产率、利润和赢利、预算提成等等方面的任务。它们除了利用先进企业的经验,运用经济核算,以新技术装备本企业,更好地利用现有设备,总之,通过提高生产效果来改进自己的工作外,没有其他出路。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刺激作用已为我国科学和教学文献所公认。

例如,К·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写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被自觉地用来对生产进行物质刺激。“问题在于深刻地研究价值规律作用的过程,并把它广泛地用于核算社会必要劳动,刺激技术进步和完善对工作人员的物质鼓励,使他们从物质上关心社会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①И·瓦洛沃依教授指出,以社会必要劳动消耗为基础的价格“给某种商品的大多数生产者提供足够的利润,合理地鼓励优秀企业,使差的企业赶上去”。^②对此,А·巴丘林也说过同样的话。^③

第二,价值规律被用作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之间分配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劳动和生产资料的重要计划标准之一。计划机构在解决怎样分配基本建设投资问题时,遵循以下原则:在生产费用最小的情况下保证满足这些需要。

价值规律的作用影响国民经济比例的形成,这已经得到日益普遍的承认。例如,А·鲁米扬采夫院士、Т·恰恰图罗夫院士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А·帕什科夫在上面提到过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对达到必要

① К·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第40页。

②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参考书),莫斯科1971年版,第174页。

③ А·巴丘林:《管理的计划经济方法》,第176页。

的国民经济比例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它象其他经济规律一样,被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活动的工具之一。”①Л·瓦洛沃依教授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制订部门和地区比例的计划时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②

众所周知,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象其它经济规律一样,作为统治人们的力量而自发地起着作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规律不是自发地而是有计划地起着作用。在这方面,价值规律也不例外。正如Л·阿巴尔津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计划地起着作用。同时,计划性本身,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方式,表现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形式。不可能有别的形式,因为任何产品都是作为商品生产的”。③

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价格反映出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通常是统一制定的,或者在国家价格管理机构的监督下制订的。同时,国家不是随心所欲地制订价格,而是考虑到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这有助于从物质上刺激企业和联合公司以及单个生产工作人员,使他们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计划机构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效果进行经济核算,并为此利用计划价格和其他价值指标。价值规律作用的计划性在完善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制度的进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新的、更合理的计划和经济刺激方法的使命是,提高统一计划工作的作用,加强计划的科学论据。但是,这项任务

① 《真理报》,1968年3月4日。

②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第176页。又见Л·瓦洛沃依、Г·拉普希娜:《社会主义和商品关系》,莫斯科1972年版,第116页。

③ Л·阿巴尔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莫斯科1971年版,第109页。

的解决是与更充分地利用经济管理的价值杠杆，如价格、利润、货币、信贷等等分不开的。有时，有人会说，价值规律的作用本身会导致劳动和生产资料在计划以外的再分配。但是，这样的再分配仅仅在价格同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所要解决的任务不相适应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在计划外的再分配乃是没有很好地利用价值规律，即破坏价值规律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这一规律包含着某种不以它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自发因素的结果。

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极其复杂。价值规律是价格的规律，而价格以独特的形式反映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涉及社会主义生产者、企业和经济组织集体的经济利益，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各友好阶级和阶层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在我国的经济文献中，大概未必能找到比这个问题更能引起如此不同的解释和争论了。

论对价值规律的限制

有些苏联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但同时又认为它应加以限制。这种提法不能认为是恰当的。如果这是指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凡是有商品生产的地方，就有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而商品生产包括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把劳动力排除在价值规律作用范围之外，这主要不是证明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是证明它的本性随着生产关系本质的根本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如果指的是限制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强度，那末也“不值一提”。什么叫限制具有社会主义内容、不是自发地而是有计划地发生作用的价值规律作用的强度呢？这就意味着在编制计划时放弃价值核算，在有计划地领导社会主义经济时放弃有效地利用价格制度，

而倾向于用行政方法影响它的发展,对运用完全的经济核算、争取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限制。差不多二十年以前, C·斯特鲁米林就以上述观点批判了限制价值规律的提法。^①

有时,限制价值规律指的是,这一规律被国家自觉地用作对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福利制订刺激计划的工具。但是,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计划管理中自觉地利用其他经济规律(基本经济规律、按计划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规律等等),并不称之为对它们的限制呢?

在评论限制价值规律这一提法时,还必须看一看它的“家谱”,它脱胎于陈旧的改造价值规律的提法。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它的作用的性质是有计划的,可利用它来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福利服务。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问题不在于“限制”它,而在于研究它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所起的作用的特点,并在有计划地领导发展社会生产的实践中利用这一研究的成果。

纯收入的研究

各种不同形式的纯收入也是同价值规律和价格有关的经济杠杆。由于管理、计划和物质刺激的完善,经济学家们对纯收入的范畴及其形式(利润、周转税),对信贷关系问题的关注显著增长。例如,单就利润和赢利问题就出版了一系列专题学术著作,写了若干学位论文,在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召开了一系列科学会议和讨论会。

^① 见 C·斯特鲁米林发表在 1956 年 12 月 23 日《工业经济报》上的文章。

纯收入的实质，利润和赢利的作用

不久前，纯收入被认为是剩余产品的价值形式，而现在则被正确地看作为社会的产品的价值形式。这是很清楚的，因为：纯收入组成中的社会消费基金的大大提高，剩余产品和用于社会的产品不能认为是同一范畴。纯收入在实质上是为社会的产品的价值，但它表现为企业全部资金发挥职能的结果。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某个环节所实现的纯收入固定地偏离这一环节所创造的纯收入。^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格在生产的基金占用率存在差别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固定地偏离价值。

一九六八年，在莫斯科财经学院召开代表会议，讨论了在经济改革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工业中利润和赢利问题的研究结果。^② M·阿特拉斯教授在会上作了报告。在我们看来，一些发言者支持报告中基本上正确的观点：揭示利润这一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实质必须由抽象到具体，即剩余产品——纯收入——利润。

报告人和发言者坚持在我们看来在原则上是正确的意见，认为利润和周转税的社会经济性质是一样的。而许多经济学家则认为某些商品的周转税（如伏特加和烟草制品）含有间接税的因素。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报告人论证了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润执行三个职能：评价企业活动的综合指标、剩余产品分配的工具、对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物质刺激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会形成平均利润率（或平均赢利

^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供教师用的科学方法论参考书。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78—179页。

^② 《经济科学》，1968年第6期，第117—122页。

率),价值是否会相应地转化为生产价格呢?对这个问题,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报告人和部分发言者(К·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А·梁多等)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理由是,在部门之间没有竞争。但是,他们并不否认部门和企业的赢利仍然有必要作一些有计划的调整。

持对立观点的有И·亚斯特雷姆斯基和Г·托奇耳尼柯夫教授。他们认为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两个范畴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但是它们的形成是有计划的。某些经济学家所作的统计资料证明,在改革以后这段时期内,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一种平衡国民经济和工业各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倾向。这一倾向的客观基础在于:必须补偿生产费用(成本)和靠本企业收入来扩大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生产规模。

会上谈了国民经济赢利的作用,但同时正确地强调指出,决不能象过去那样,把国民经济赢利同企业和部门的赢利对立起来。

在现代经济文献中,作为企业基本建设投资效果标准的利润率(赢利)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映,因为存在着基金付费,而预算拨款日益同企业内部筹款和贷款结合起来了。同样,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也日益广泛地、更大规模地取决于某个部门的赢利。

这种看法的直接结果是增加高赢利部门,如电能、化学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生产国民消费品的某些部门的生产。

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的主要职能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积累、社会消费基金形成、巩固国防能力、提高人民福利的一个主要源泉。在新的经营条件下,经济刺激基金是由利润形成的,而这项基金是扩大生产、对企业及其单个工作人员进行物质刺激的源泉。因此,利润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物质刺激。

柯西金在苏共第二十四大的报告中对我国经济中利润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扼要的但同时又是深刻的说明，并且指出了提高它在经济发展的有计划领导中的利用效果的主要途径。

在上述报告中这样的话：“以巩固和发展经济核算为基础的经济刺激新体制使利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我们认为利润和赢利是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同时，利润不仅仅是企业和联合公司经济核算基金的主要源泉，而且也是国家预算收入的最重要的源泉。”^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理论所经历的道路虽不很长，但却经受了时代的严峻考验。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证明，所有的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商品生产范畴，如价值、市场、货币、价格、利润、赢利、信贷等等，不只是过去的遗产，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内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同于资本主义，它不是自发地而是有计划地发生作用的；直接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以商品形式实现的。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的建成，社会主义生产效果的不断提高，需要最彻底、最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的全部经营方式和方法，包括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和范畴有关的一切。

商品货币关系理论还将不断发展，其使命是反映经济实践，制订各种方案，以便最充分地利用价值工具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

（马文奇 伍柏麟译）

^① 《苏共第二十四大材料》，俄文版第169—170页。

苏联农业中的垄断魔爪

编者按：农工综合体，这个被勃列日涅夫吹嘘为列宁合作化计划发展新阶段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摩尔达维亚农业生产管理新形式的效率》一文可以回答一二。此文是苏修出版的《农工协作的经验和问题》一书中的一章。该书非同一般，打开扉页，出现在眼前的是一长串的名单以及吓人的头衔。什么摩尔达维亚修党第一书记、乌克兰修党书记、白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哈萨克农业部长、全苏食品工业部总局局长、州委书记等大官，都赫然列于作者名单之中。至于那一批舞文弄墨的教授、博士，当然更少不了。一本书的作者居然如此众多，身分如此显赫，在苏联是少见的。

摩尔达维亚是勃列日涅夫发迹的老窝，也是他在苏联推行农工综合体的试点。这篇文章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个试点竭尽吹捧、美化之能事，但是剥去它的外衣，仔细一看，仍然可以看到：

大农业垄断企业显露头角，小农庄被纷纷并吞，处处是一片大鱼吃小鱼的景象。单是一个“摩尔达维亚葡萄栽培和加工工业联合公司”，就吞并了一百二十六个农场和工厂，占据了二十七万多公顷农田。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进一步垄断了农业大权。一个农业垄断组织的经理，就拥有相当于共和国部长的权力。

利润挂帅，卢布第一，为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率而欢呼，穷凶极恶地拚命争夺百分之一百的利润，成了农业垄断组织经营的唯一目的。

“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苏联社会的现实正是这样。苏修的文章透露，垄断不仅不能解脱苏修的农业危机，而且还导致垄断企业同农庄之间分赃不均、权力争夺等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至于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压迫和反压迫、剥削和反对剥削的尖锐斗争，那末，从文章所泄露的血腥的滚滚利润中，已经可以闻到它的气息。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的垄断总是同腐朽和垂死相连。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不例外。它的垄断日趋强化之日，也必是它加速灭顶之时。

摩尔达维亚农业生产管理 新形式的效率

〔苏〕И·鲍久尔^①等

近几年来，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经济方面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旨在彻底改变农业状况，巩固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计划工作，把种植业和畜牧业转上工业基础，加强农业劳动者的责任感和物质利益。跨单位的农工协作已经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本途径之一。近几年的实践业已肯定了一些组织农业生产及其管理的新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农业和工业生产友好协作的有效形式，诸如：庄际联合公司和组织，农工企业（国营农场-工厂）和联合公司，工农联合企业，农工联合公司等。

首先，必须对生产和管理组织新形式出现的必要性及推动它迅速建立和发展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加以分析。农工协作的前提是历史地形成的。第一，技术进步使劳动分工发生了革命，从而使劳动合作与联合成为必不可免；第二，农业生产集中化和专业化过程的加速，从而产生了它同加工工业部门、采购和商业组织实行一体化的客观必要性；第三，自然条件：必须消除生产期和工作期之间的差别。当然，上述几点并没有包括农工协作的一切前提。但是，它们对于这个过程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要求认真地去寻求和采用这些有助于大大地提高农

^① 此人是苏修摩尔达维亚党的第一书记。——译者

业和工业效率的农工协作形式。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注意到这些变化并及时地采取解决措施。苏共二十四大强调指出，在庄际和国营-集体农庄生产联合公司及农工综合体里，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技术、基建投资和劳动资源，更广泛地采用工业方法。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创建农工企业和联合公司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合作制、关于把农业和工业生产结合在统一的经济综合体中这一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共产党的农业政策是弗·伊·列宁关于把农业“从盲目经营的旧式农业变成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成就上的农业”（《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4页）这一思想的直接继续。正是由于采取农业技术改装、加强经济管理杠杆的办法，才使这一极其重要部门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实现了从粗放制和技术落后状态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革命飞跃。农村的生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文化和生活方式改进了。

例如，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农用固定生产基金（按每一百公顷农业用地平均计算），到一九七四年初分别达到八万二千五百卢布和十三万三千九百卢布。这个部门的总动力从一九六五年的三百万马力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约六百五十万马力。特别是电力的需要量大大地提高了。单是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三年期间，电力的消耗量就增加了二点七倍。

农业技术进步最重要的特点是，农业各生产单位的基本生产能力不断上升，原因在于采用新技术，从而保证了多种生产过程实现有效的全盘机械化和电气化。摩尔达维亚由于采用这种技术，就可以做到谷类作物的种植和收割不用手工劳动而达到高标准；把玉米、向日葵、甜菜生产中的手工劳动降到最低限度；

提高了专业化畜牧综合体的机械化水平。

新生产设备的广泛采用对于完善农业生产工艺，使它转上工业基础产生了直接影响。种植各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崭新工艺技术日益广泛地开始采用。例如，畜牧业正在向工业条件过渡——用营养价值高的含有各种激素的混合饲料饲养和有效地肥育牲畜。这就需要打破育种工作中已有的各种陈旧观念。在果树栽培业中开始采用篱形整枝法，可以做到在一公顷土地面积上种植果树一千五百到两千五百株，而不是过去的两百五十到三百株了，并使果园的操作差不多全部机械化。葡萄栽培新工艺的要点是，把长起来的主蔓丛剪修成两簇和四簇篱形栅栏，这就可以做到在剪修和捆扎藤蔓、整理行距和采摘葡萄时采用机器了。蔬菜栽培业正在过渡到跨单位轮作和实行大面积连作的大型集中化，并保证用机器耕种和收获。

农业技术改装和采用新工艺有助于巩固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经济基础，不断提高产量。农业技术进步的巨大潜力能否实现，直接取决于生产组织及其管理对于运用现代化机器和先进工艺效率的保证程度。在科学技术革命时代，都在努力寻找最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和符合共产党对农业提出任务的那些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新形式。只有在各个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间进行劳动分工，建立大型高度专业化生产部门的基础上，才能最有效地利用最新生产设备、科技进步的成果和劳动资源。这就为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彻底集约化提供了保证。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认为，按自然经济区和行政区有科学根据地规划农业，使它更细和更稳定地专业化，优先发展具备良好条件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是最重要的纲领性的任务。这些任务完全符合苏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并具体地体现在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构成的政策中，体现在对农业的物质技术保证和基

建投资中。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根据地理条件、生产达到的水平和所拟定的远景规划组成了四个农业生产专业化地区，其中各个地区都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在地区内部，也实现区的专业化和生产单位内部的专业化。

发展同种植业和畜牧业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也应看作是对完善农业生产、提高其效率起积极影响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一九七三年，共和国生产的全部农产品的百分之七十都直接交给了工业加工。

由于按事先拟定的计划有科学根据地配置生产力，工业企业、运输组织以及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其他组织都分布在原料产地和服务对象的附近。它们同集体农庄、庄际联合公司、国营农场-工厂等一起，按专业化的地区组成了统一经济综合体。这些综合体在发展生产力水平、组织生产以及在安排劳动者日常生活、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方面大大加速了农村接近城市的过程。

共和国有二百四十三个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其中百分之七十的工厂紧挨着原料基地，汽车运输组织所属的汽车场几乎有一半设在农村。这种布局就为各生产单位销售产品、保护产品质量提供了必要的方便。而各工业企业也获得了高度的经济利益。

农业和加工工业的生产协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部门的利益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摩尔达维亚的农工协作是按三个主要方向进行的：一，国营农场和国营加工企业联合；二，在大规模专业化原料产区范围内，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工业企业之间生产上的密切合作；三，庄际合作。在共和国农工一体化迅速发展过程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部门：农工企业——国营农场-工厂；

大型庄际联合公司和企业；区域性农工生产联合公司。

国营农场-工厂在实践中显示出是一个高效率的新型企业。共和国共有国营农场-工厂一百七十个，其中从事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一百二十六个；从事香精油的十六个和从事果品蔬菜的二十八个。它们都是在国营经济成分中形成的。其中无论是农业企业，或者是工业加工企业都属于同一全民所有制。为使生产同一产品的相互联系的这两个部门实行农工协作，就需要：第一，国营农场高度专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工业加工用的产品生产的大规模集中化；第二，在国营农场区域内或其附近建立相应的工业加工企业。

国营农场-工厂组织结构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是，在用本单位生产的原料制造产品方面实行农业和工业生产协作。同那些原料生产及其工业加工分别进行的单位和企业相比较，国营农场-工厂的优越性是什么呢？国营农场-工厂具有统一的经济技术领导，这就可以保证土地、技术设备和其他生产设备、劳动力和干部得到更为充分和合理的使用。它们有条件组织生产的流水作业法，更精确地遵守生产的工艺要求，从而生产出高质量的原料和成品。

国营农场-工厂可以极为有效地利用全部经济核算杠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赢利率，降低管理机构的行政费用。它们广泛地采用新技术和现代化工艺，为建设大型企业和其他生产设施积累大量资金。比如，葡萄栽培、酿造国营农场-工厂利用以前不用的坡地开辟大面积工业葡萄园，而果品蔬菜栽培国营农场则建立了大型的温床和温室联合工厂、冷藏库和包装材料企业。

由于把工艺上相近的农业和工业部门有机地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企业里，就可以消除分散性以及与此有关的在组织产品生

生产和销售所造成的许多困难，并为更好地调配物资和财政资源创造了条件。国营农场-工厂的物质刺激和社会发展基金是从总利润中提取的，这就使企业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对于为提高统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农业生产过程和工业生产过程——的数量和质量指标而展开的竞赛产生了兴趣。

从国营农场-工厂活动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农工企业形式是最有效的，它反映了农产品生产部门和工业加工部门中垂直一体化的合乎规律的过程。

摩尔达维亚在完善农业和罐头厂以及和采购组织间的联系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为此目的，一九七二年七月，在共和国联合公司“摩尔达维亚果品蔬菜加工联合公司”和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食品工业部罐头工业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崭新的组织——加盟共和国农工联合公司“摩尔达维亚果品蔬菜加工工业联合公司”。联合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专业化国营农场-工厂里蔬菜、食用葡萄和水果（特别是早熟和不便于运输的品种）生产的高水平；保证在其他系统所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对这种产品进行采购和加工，以及制造高质量的罐头；保证把新鲜产品运往我国各工业中心。

农工联合公司“摩尔达维亚果品蔬菜加工工业联合公司”是一个大型组织，拥有固定基金三亿两千万卢布。它包括二十七个罐头厂，总生产能力是年产罐头十五亿标准罐；铅、石印刷厂和加固包装材料厂；二十八个专业化国营农场-工厂；容纳总数为两千五百辆冷藏车和其他汽车的几个汽车基地；五十二座总容量为五万吨的冷藏库和水果仓库；一所食品工业技术专科学校及一些其他企业和组织。

为了进行更有效的领导，所有这些生产部门在许多巨大的原料产区范围内组成了三十五个区域性经济核算联合公司。其

中：在国营农场、罐头厂和采购、销售组织基础上组成的农工联合公司十一个；在国营农场和采购、销售组织基础上组成的农业-销售联合公司两个；在罐头厂和采购、销售组织基础上组成的工业-销售联合公司九个；采购、销售联合公司十三个。

农工联合公司的管理工作由以联合公司主席（享有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部长的权力）为首的七人委员会进行。“摩尔达维亚果品蔬菜加工工业联合公司”委员会审理各生产部门的活动和发展的主要问题；讨论对企业和组织进行实际领导的问题；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选择和安排干部；听取各总管理局、分局和各处，以及联合公司各企业和组织的工作报告。

“摩尔达维亚果品蔬菜加工工业联合公司”所属各总管理局、分局和各处按各自的管理范围，对区域性联合公司实行对口领导。

区域性联合公司的领导由总经理通过经理理事会加以实现。经理理事会审理同联合公司发展远景及其实际活动有关的各种问题。参加经理理事会工作的有区域性联合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和组织的各种专家。

随着农工联合公司“摩尔达维亚果品蔬菜加工工业联合公司”的建立，农业同罐头生产部门的生产和经济联系大大地改善了。例如，为了合理地利用工厂的动力，增加保护地上的蔬菜和秧苗的产量，罐头厂建立了拥有几十公顷土地面积的温室联合工厂。在各区域性农工联合公司中都办起培养罐头工业和农业干部的职业技术学校。

农工联合公司“摩尔达维亚果品蔬菜加工工业联合公司”计划在一九七五年销售工农业产品六亿八千万卢布；生产罐头一百四十万标准罐；运往全国各工业中心的果品蔬菜产品六十一万吨以上。

在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工业中，农工协作的发展过程大致相同。在这方面，这一过程是以建立加盟共和国的科学生产农工联合公司“摩尔达维亚葡萄栽培和加工工业联合公司”来完成的。参加这个联合公司的有一百二十六个葡萄栽培和酿酒国营农场-工厂，它们拥有相应数量的粗酿工厂和二十七万一千公顷农业用地。此外，联合公司还包括三十五个独立的葡萄酒酿造厂；一个设计和工艺研究所；一所培养中技人员的葡萄栽培和酿酒学校；以及其他的企业和组织。

农工联合公司的工作准则是全苏和共和国工业联合公司的共同条例。它通过十四个以主导国营农场-工厂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区域性农工联合公司实现对国营农场-工厂的管理。

可以看一看科托夫区域性农工联合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个联合公司的成员包括十一个国营农场-工厂。它拥有固定基金五千六百万卢布，其中两千六百万卢布是多年生栽培植物。联合公司有三万公顷以上土地和一个季度能加工葡萄五万六千吨的葡萄酒酿造企业。下列数字可以说明科托夫区域性农工联合公司的经济发展速度：一九七〇年联合公司生产的农工业总产值是三千八百七十万卢布，而一九七三年则为四千八百七十万卢布。计划在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使总产值达到七千万卢布。

科托夫区域性农工联合公司的领导工作由“胜利女神”国营农场-工厂经理处进行。物质技术供应和成品销售工作集中进行，建立起全公司的统一的计算中心，它把核算、表报及其他会计职能等都联合在一起。这不是减少加入联合公司的各国营农场-工厂领导者的权力，而是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生产职能上，改进劳动组织，试制新产品并提高其质量。

联合公司的国营农场-工厂，除生产主要产品葡萄以及对它

进行工业加工外，还利用不适于栽培葡萄的土地种植饲料作物。在同区的集体农庄的合作方面，联合公司利用大型跨单位国营合作社企业生产肉。在工业基础上组织奶品生产，农工联合公司创办了一个饲养三千二百头奶牛、供应十一个国营农场-工厂的奶品企业。在同区的集体农庄合作方面，联合公司正在建设一个利用人工培养基培植一千六百万株葡萄苗的大型联合工厂。

已有的经验表明，以主企业为基础展开工作的区域性农工联合公司，是生产发展现阶段上农工生产一体化的最有效形式。它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集中化和专业化，改进国营农场-工厂物质技术基础的利用情况，减少行政管理人員；可以使参加联合公司的各下属单位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在科学基础上更快地获得解决。

为了使所有的区域性农工联合公司都实现全面彻底的集中化，拟定了在联合公司中建立各种共同的生产部门和企业的措施，这些措施正在实行中，如建立维修基地、专业化运输部门、土壤改良和筑路队、果蔬仓库、奶品生产、牲畜饲养和肥育综合体等，以及利用计算技术控制工艺过程的部门。为此，正在成立机器计算站、科学劳动组织科、实验室、设计处及其他分支机构。

在生产人民消费品各部门中发展生产力的农工方向，及与此有关的农村中生产经济关系的完善化，为更充分地利用科学和技术成就，提高计划工作和生产管理水平和为分配和利用物质和劳动资源，创造了异常良好的条件。

科学技术革命使集体农庄经济成分中产生了崭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庄际合作制。庄际合作制反映着列宁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广泛地普及这种合作已是可能的了。它是共产党关于集体农庄走向共产主义的途径这一纲领性原理的实际体现。其主

主要内容是：在各部门和各生产单位之间加强劳动分工；物质技术设备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化；生产大规模集中化和专业化。

社会化的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使自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已超出一个集体的范围，并变成为区范围内的庄际所有制，而许多部门甚至成为共和国规模的庄际所有制了。它同全民所有制形式的生产经济单位的相互作用正在扩大和加强。例如，一九七四年初，在共和国的三百零五个跨单位企业中，半数以上是混合型的，即国营-合作社营企业。

由于庄际合作制的顺利发展，就可以实现部门规模的大型集中化，并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这就为农业的全盘机械化、化学化和电气化及采用工业生产方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技术装备程度和劳动组织的规模来看，跨单位企业并不亚于国营经济成分中最现代化的企业。

庄际合作制在摩尔达维亚已普及到许多部门，并在基建、公共畜牧、果树栽培、菸草种植部门中，以及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灌溉工程中得到特别顺利的发展。比如，基建跨单位合作制是在一九五五年从成立区建筑管理局开始的，最初只在各集体农庄中进行建筑工作。现在，共和国的联合公司“集体农庄建筑联合公司”共有建筑工业经济核算企业和承包组织八十六个。它们是：钢筋混凝土构件和木材加工厂、碎石场、森林工业局、运输组织、区域性和区建筑安装管理局，以及设计院。联合公司的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高达一亿三千二百万卢布。“集体农庄建筑联合公司”各个组织自成立以来完成的工程额将近十亿卢布。

以集体农庄生产合作为基础的畜牧业产品生产集中化，是在一九六五年开始的，并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初是建立三十七个混合饲料厂，保证为集体农庄畜牧场提供混合饲料。从一九六〇年起，开始创办肥育牛的庄际企业，集中饲养四到六个月的

牛犊，而集体农庄的养殖场变成了幼畜繁殖场。到一九七〇年初，共和国的各个区都有了肥育牲畜的跨单位企业。各生产单位间实行劳动分工的这种集中化大大地提高了牛肉和猪肉的生产效率。这些部门都从亏损部门变成了赢利部门。

一九七三年，从跨单位生产基地中得到的商品猪肉占集体农庄-合作社经济成分生产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牛肉——百分之六十，蛋——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猪肉生产的赢利率（按跨单位企业和集体农庄畜牧场的综合指标计算）从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十二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九，而在“集体农庄畜牧工业联合公司”则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七。跨单位企业的牛肉生产赢利率为百分之四十九。

产肉畜牧业经济巩固后，集体农庄进入了这些部门生产集中化的第二阶段。办法是：建立养猪业畜群全周期再生产的更大型畜牧综合体；把出生后八到十天的幼畜饲养集中化。某些区里这种综合体业已发挥作用。目前，正在建立七个年产猪肉各为六千吨的综合体。计划到一九八〇年共和国将拥有此类综合体二十八个。

摩尔达维亚将逐渐改建和扩建跨单位牛肉生产企业，并把属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厂、国营农场和教学实验农场的全部牛犊都集中到这里来。根据区的范围大小，正在建立从三千五百到七千吨年产量不等的牛肉生产畜牧综合体。

产奶畜牧业转上工业基础是在一九七〇年从母牛犊饲养集中化开始的。每个区都有一个母犊专业化饲养单位。一九七三年，这些生产单位着手建设饲养四千到六千头母犊的综合体。这就保证奶牛畜群每年更新百分之二十。在共和国的许多区里，在建立跨单位奶厂（拥有乳牛一千六百到六千头）的基础上开展乳品生产集中化工作。这个部门的生产集中化和专业化完成后

(一九八〇年)，七百六十个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小型产奶畜牧场将为大约一百四十八个跨单位乳品厂所代替。到现行五年计划结束时，将有二十五个跨单位乳品厂投入生产。

蛋类生产集中化和专业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年产蛋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个区规模的庄际家禽饲养厂。共和国的许多区都有庄际肉用雏鸡饲养厂。

摩尔达维亚公有经济成分中的畜牧业集中化和工业化全部完成后，将由两百五十个大型专业化畜牧企业取代目前存在的三千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畜牧场。肉和奶的产量将增加百分之五十，蛋增加一倍。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到三倍以上，赢利率将达到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

为使畜牧业达到更高的集中化和专业化水平，就要使饲料生产部门进一步工业化，使土地和混合饲料厂从畜牧综合体中分离出来，组成专业化饲料生产农工联合公司。这些联合公司的成员包括：专门种植饲料作物的集体农庄；生产混合饲料、颗粒单一饲料、生物制剂、饲料酵母和矿质补料的工厂，以及饲料质量化验室。一九七三年，各联合公司的上述饲料产量超过了四十万吨。

果树和葡萄栽培业中的跨单位合作使生产取得了罕见的高效率。一九六八年，在合作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各生产单位联合创办了一个研究机构，即“集体农庄葡萄和果树栽培设计院”，从事土壤研究和果园及葡萄园布局的选择工作，制定开发山坡地和种植多年生果树的方案。一九七〇年，出现了跨单位的果树栽培业合作，结果，这个部门的经营实践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前是各个生产单位建立果园，现在是根据研究机构制订的综合方案在共和国最好的小型区域内，在崭新的扇形坡地基础上着手创建跨单位高度集约化的大型工业果园。共和国的五个区里已

经为这种果园奠定了基础。每个果园的面积从三千五百公顷到六千公顷不等。分散在共和国各地的大小四千五百个果园将为二十二个农工联合公司所代替。此外，果园占用的土地面积将从十三万公顷减至八万公顷，而水果的总收获量将从八十万七千吨增加到一九九〇年的两百七十万吨。

由于摩尔达维亚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葡萄种株生产集中化和工业化，就使原有的各母株种植园所培植的种株数量从七千五百万株增至一亿六千万株。同时，母株种植园占用的灌溉面积减少一万二千公顷，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减少一万人。

跨单位合作制也普及到了蔬菜种植业和烟草种植业。各生产单位正在共同努力创办培育蔬菜和烟草秧苗的温床、温室联合工厂、大型工业烤烟室、分级和包装车间。蔬菜栽培业中正在贯彻跨单位轮作制，这就可以把分散的小块菜田连成大片，广泛地使用高效率的机器和机组，降低单位产品的物质、现金支出。

跨单位机械化、电气化和水利化联合公司为彻底改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和电气化设备的利用率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前途。

跨单位机械化和电气化联合公司的工作结果令人信服地证明，机器运用和技术服务的新组织形式是高效率的。例如，恰迪尔-卢日区在一九七三年建立的联合公司，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就使每班拖拉机的工作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一公顷标准耕地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七三年，雷勃尼茨跨单位联合公司由于灌溉种植业的技术设备集中化，就把灌溉的倍数从一点二倍提高到二点三倍，使一个机组的工作量增加零点七倍，改进了水利工程的服务工作。

在综合解决农业生产化学化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在跨单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业化学中心。它拥有研究土壤和绘制农业化学统计地图的实验室，机械化土壤施肥、作物除莠和病虫

害防治剂的作业队。这些联合公司中各种专家-组织者的职能是，有科学根据地使用有机肥料和矿质肥料，以及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化学药剂。

这样一来，庄际合作制正在从一个部门普及到另一个部门，将来，它一定会在集体农庄经济的整个农业生产部门中居于统治地位。它有助于大大地提高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水平，从而大大地加强集体农庄制度的力量和实力；它加速了这个经济成分的生产力的发展；能把各集体农庄的物质、财政和劳动资源集中在一起，建立全部劳动和管理过程完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大型专业化生产部门；保证为技术设备集中化及其高效率使用提供客观条件。

庄际合作制为广泛地采用科学和技术成果、大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开辟了广阔前景；为逐渐拉平各生产单位的经济状况创造了条件；可以积累起集中的劳动报酬基金，使农村的一切社会生产部门过渡到同工同酬；为集中社会消费基金提供了可能性；为有成效地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使合作社所有制接近国家所有制；加速更强大的农工企业和联合公司的建立过程；导致农村社会阶级的重大变动；在组织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方面，以及在劳动者的物质和社会文化保障方面加速农村接近城市的过程。

跨单位合作制广泛发展的直接结果是，生产单位内部建立起自给产品的共同加工企业。这首先是在庄际混合饲料厂中加工饲料，制造地方的建筑材料，烤制烟叶及其他各种生产活动。比如，庄际建筑材料工业，生产的产值达到五千六百多万卢布；加工烟叶的庄际联合工厂利用自己的自动作业线和干燥室将来可以加工青烟叶一百万吨以上。

摩尔达维亚积累起不少有关根据集体农庄和国营生产单位

合作制原则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的经验。半数以上庄际企业，由于国营农场和国营农场-工厂以股东身分加入的结果，变成了国营-集体农庄企业。整个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畜产品生产合作部门共包括一百二十三个国营农场；基建合作部门包括七十八个国营农场和国营农场-工厂、许多区消费合作社联社和一些其他组织。这种合作，除畜牧和基建部门外，也在烟叶、果树、蔬菜和饲料生产部门中发展起来。

国营农场及其他国营生产单位和企业对混合型跨单位联合公司的基建投资数额暂时还不太大。加速发展农业各部门的利益，要求国家更多地担负起生产集中化及其工业化的职责，通过代表两种所有制形式生产单位的人力和物力的合作，建立强大的企业和联合公司。

集体农庄-合作社成分中发展生产力的崭新方向和农业生产大规模的集中化和工业化，要求提供大量的原始基建投资和其他物质资源。集体农庄制度拥有足以按当前任务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条件。然而，为此必须保证积累和消费之间建立正确的有科学根据的比例。

共和国党组织认为这个基本问题具有头等重大意义，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成功地利用了庄际合作的条件，这种合作制是集体农庄经济成分中从经济上进行最合理调整的极为灵活和强有力的手段。因此，摩尔达维亚各集体农庄在总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连续多年一直是保持在百分之二十六到三十的幅度内，大大地超过了加盟共和国的平均指标。在共和国的条件下，按这种比例分配集体农庄的总收入在经济上是有根据的，它符合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劳动报酬增长速度之间现有的比例关系。比如，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底的一段时间内，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四十四，而劳动报酬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同

时，集体农庄还把庄员的有保证的劳动报酬保持在接近国营农场工人的平均劳动报酬水平。一九七三年，集体农庄庄员的一个工作日报酬超过国营农场工人一个工作日报酬的百分之三。虽然生产有季节性，但是庄员的月平均劳动报酬同食品工业和轻工业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和职员月平均工资相比仅低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由于始终不渝地遵循扩大再生产规律的要求，集体农庄拨出大量基建投资，购置机器和机械，更新牲畜品种，建立新的果园和葡萄园；建立强大的畜牧综合体，即发展那些基建投资效率高和回收率快的生产部门，其中也包括庄际的一些生产部门。

庄际企业和联合公司的顺利发展证明，这种生产合作制正在向新的、更高质量的合作过渡，其主要内容是：农业生产的大规模集中化及其工艺过程的工业化，以及各独立生产单位的高度专业化。它将保证集体农庄-合作社生产资料进一步公有化，并使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显著地接近。

当然，跨单位合作制会提出有关组织生产、经济工作、部门间的相互关系、权力问题等一系列迫切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另一些问题正在解决。在已获得解决的问题中可以拿国家采购组织、肉类-乳品工业加工企业同集体农庄之间的关系作为例子。在庄际畜牧综合体成立之前，这些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并使农业和工业部门都付出大量的生产费用。从小型集体农庄畜牧场送来的为数不多的牲畜，要求有一个设有集中牲畜基地的专门组织“牲畜采购肥育站”。牲畜要在这里养上三到五天，大都是露天饲养、密集地圈在一起，而且饲料还不足。牲畜还要在肉类联合工厂的场地上呆上好久。这样一来，牲畜的肥度下降了。企业开工能力不均匀，这就破坏了工作的节奏性，导致了对商业部门的产品供应不平衡。

畜牧综合体建立后，工农业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在明确的经济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按合作原则建立起来的。于是，大大地改进了牲畜的接收工作和彼此的结算工作。共和国所有的肉类联合工厂加工牲畜没有发生过耽搁的现象，严格地遵照进度表进行工作，并按实际成品率同庄际企业进行结算。两个部门间的直接联系和协同一致的生产友好合作，有助于改进固定基金和物质资源的利用。现在肉类联合加工厂使用同样的设备能力，却能生产出几乎多一倍的产品。从庄际畜牧综合体和肉类联合工厂建立直接的生产和经济联系中，每年得到的经济收益计五百万卢布。

属于未获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科学地解决庄际企业同集体农庄——股东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它涉及到产品买卖、利润分配、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的形成。庄际产品的计划、供应和价格形成问题也需要加以深入研究。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农庄制度发展的规律性；科学地预见生产、经济和管理的组织工作中的基本趋势，确定各种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新形式的权限等。

庄际合作制反映着农村新型的生产关系，正如其他的农工协作形式一样，是符合科学技术进步要求的，符合各生产单位和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利益的。

苏共中央二十四大的总结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质的变化对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允许满足于已有的形式和方法，尽管它们从前都很好地使用过。摩尔达维亚党组织正是遵循这个客观必要性，在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深刻变化的影响下，实现向集体农庄-合作社经济成分崭新的领导形式过渡的。

苏共推行的积极的农业政策，除使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得到

迅速发展外,还保证了农村生产-经济关系全面完善化。这一政策制定了生产组织的有效形式及其管理方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摩尔达维亚第九个五年计划前三年农业的年平均总产值,同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其中谷物为百分之三十三,甜菜为百分之五十九,蔬菜为百分之二十三。第九个五年计划前三年的谷物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每公顷三十二点五公担,而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期间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是每公顷二十公担。在上述期间,向日葵每公顷分别为十八点二和十五点三公担;甜菜为二百九十和二百零一公担;蔬菜为一百二十二和八十九公担;果实和浆果为七十一.八和四十五.一公担;葡萄为五十七.三和四十六.八公担。一九七三年同一九六四年相比,共和国公有经济成分中肉、奶和蛋类的产量分别增加一点二倍、零点八倍和五倍。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完善,工农业生产经济联系的扩大,农村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比如,自摩尔达维亚集体化完成时起,农业部门中就业人口在共和国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同一时期,农村中的工人和职员人数(农业部门除外)却增加了三点三倍,其中:工业为四点一倍,建筑和运输业为五倍,教育和保健为三点四倍。现在,共和国将近半数工人阶级居住在农业地区,他们对改变庄员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大大地增加了。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如果说一九五〇年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大约百分之三十七在从事家务和个体副业,那么现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者都积极地参加集体农庄的公共生产,积极地参加庄际组织、农工组织、工业组织、运输业及其他组织的生产活动。

随着庄际合作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从集体农庄庄员中分化

出并形成了社会生产的新型工作者，这些工作者就其劳动性质、生产组织、物质保证、以及本身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程度来说，与工人阶级处在同一水平上。例如，捷列涅什特养猪厂的全体职工是由有高度熟练的工作者——作业员、钳工兼电工、混合饲料厂工人等组成的。这个厂直接从事养猪生产活动的一共是七个人。一九七三年，他们育成肥猪二万二千六百头；平均每个作业员生产的产值是四十八万七千卢布；一个工作者的月平均工资超过了一百五十卢布。

在其他许多同样的企业里，类似的例子还很多。现在，庄际合作的工作者占集体农庄工作者总数的百分之九，生产的产值却占集体农庄-合作社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采用农业生产及其工业化的新组织形式，对于提高集体农民思想觉悟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新过程，使整个集体农庄-合作社经济的管理民主化过渡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在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劳动农民的心理状态迅速发生变化，农村劳动者共产主义觉悟水平在日益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眼界扩大了，他们的财产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规范是：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关心各生产单位的正确发展，增加集体财产；完成国家定货；不仅要深刻地理解对本集体承担的职责，而且还要深刻地理解对其他集体农庄、地区和整个共和国事业应负的义务。农村中造成了一种极为高尚的道德政治气氛：人们充满了创造性的热情，坚信集体农庄制度的巨大潜力，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幸福不倦地努力工作。

（摘自一九七五年苏联莫斯科出版的《农工协作的经验和问题》一书 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经济资料组译）

协作的各种形式

〔苏〕B·普列什科夫

B·杜勃诺夫

H·斯麦塔宁^①

由于部门内和跨部门协作形式的多样化,迫切需要使“跨单位农业或非农业企业(组织)”、“农工企业”、“农工生产联合公司”这样一些定义有更明确和具体化的概念。苏联中央统计局拟定了定义,并经苏联国家计委、苏联农业部、苏联食品工业部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同意后予以肯定。

跨单位农业企业 是靠生产单位——股东(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及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为生产农产品或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协作企业,如肥育牲畜、繁殖母犊的企业,生产蛋、家禽肉、家兔肉的企业,庄际果园,温室——温床企业,果树苗圃,庄际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组织等。

一九七五年初,跨单位的农业企业在全苏共有一千五百十五个,一万六千九百六十八个集体农庄和一千七百九十七个国营农场是它们的股东。在跨单位农业企业的总数中,有四百五十四企业只从事牲畜的繁殖和肥育工作,有五百六十五个企

^① B·普列什科夫是苏联中央统计局农业统计司副司长, B·杜勃诺夫是苏联中央统计局集体农庄统计处处长, H·斯麦塔宁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营农场科科长。——译者

业从事家禽产品生产和人工孵化工作。自一九六五年以来，繁殖和肥育牲畜企业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以上，牛的销售量（按毛重计算）从八万一千吨增加到二十七万一千吨，猪的销售量从四万二千吨增加到二十五万五千吨。

跨单位非农业企业（组织） 是靠生产单位——股东（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及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从事与农产品生产无直接联系的某种专业化活动的协作企业（组织）。按这些企业（组织）活动的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种：

庄际建筑组织和联合公司，其中包括生产各种建筑材料的企业，设计、供应及与建筑有关的其他组织；

跨单位农产品加工工业企业（混合饲料工厂，罐头制造和葡萄酒酿造企业等）；

跨单位从事与农业原料加工无关的产品生产的工业企业（玻璃厂、瓷器厂、林场等）；

跨单位非生产领域内的组织和机构（疗养所、休养所、养老院、少先队夏令营）。

农工企业 这是一种把农产品生产和农产品工业加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企业。这种企业是由一个农业部门，以及一个或几个从事加工或废物利用、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的保管和包装（在许多情况下还从事采购）的部门组成的。

判断此类联合生产部门是否属于农工企业的标准是，非农业性的加工、包装等等部门中是否有固定的人员编制，以及生产集中程度的高低。虽拥有各种工业部门，但所从事的业务活动与农业生产无关（比如制作家具、生产日用品）的生产单位不属于农工企业。

目前存在的最典型的农工企业是，从事葡萄等果品蔬菜产品、香精油料作物、土豆、亚麻、大麻和棉花等生产与加工的国营农场-工厂(集体农庄-工厂)；在畜牧业中则是，奶品和肉类的生产与加工部门，以及具有屠宰家禽、对蛋类进行分级和包装车间(作业线)的家禽加工厂。农工企业中还有一种混合业务的企业：葡萄酒酿造和罐头制造，葡萄酒酿造和畜产品加工。

农工企业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平衡表并且是法人。

根据统计机关进行的一次统计资料，一九七四年初，全国计有农工企业四百五十六个(家禽厂未计算在内)。

农工生产联合公司 是由几个农业企业，以及在生产上与农业有关，从事加工、废物利用、农产品保管和包装(在许多情况下从事农产品的采购和销售)的企业和生产单位组成的。联合公司中可以包括一个或几个农工企业。

参加现有的联合公司的企业(下属单位)可以保持其法律上的独立性或作为联合公司内部的一个生产单位而加入。

联合公司或由主企业的机构领导，或由独立的机构领导。多数现有的联合公司在农业原料生产及其加工(葡萄酒酿造和罐头制造)方面都实行了专业化。有的联合公司从事混合业务活动。

在畜牧业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叫作畜牧综合体的高度机械化的大型畜牧场。但有时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不一样。这就必须有一个(苏联中央统计局、苏联国家计委、苏联农业部)一致同意的定义。

畜牧综合体 是一种拥有生产所必需的主要和辅助用途的总体设施(房屋、建筑物、设备、工程交通线)、由统一生产过程联

合起来并且通常坐落在一个区域内的高度专业化的农业企业或它的一个下属单位。

在个别情况下，畜牧综合体也可能分布在二到三个地方，但它在生产上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部门。综合体中的产品生产是在工业基础上有节奏地进行的。

畜牧综合体的组成可以是独立的国营企业，可以是各个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个下属生产单位，也可以是在跨单位基础上采取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入股的办法组成。

畜牧综合体的最小规模是：

饲养和肥育猪的畜牧综合体：全年饲养猪一万二千头；饲养和肥育牛犊的畜牧综合体：全年饲养牛犊五千头；生产牛奶的畜牧综合体：全年饲养奶牛四百头；饲养牝牛的畜牧综合体：全年饲养牝牛五千头。

（译自一九七五年第三十五期苏联《经济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经济资料组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法国投降与一九四〇年 法德停战的历史

〔苏〕B·斯米尔诺夫

编者按：这里摘译的仅是贝当政府向希特勒投降的一部分史料。

现在已经很清楚，德国军队在数量上并不比英法联盟的军队占优势。根据军事伤亡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德法士兵并未经过激烈的战斗，然而，法国在几个星期之内却被击溃了。

这一事实，不能单用法国军队的军事技术准备不充分来解释。如果不考虑失败的最主要的阶级和政治的因素，那么对法国的惨败和法国统治集团不愿继续作战便不可理解。

众所周知，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在法国大资产阶级当中，存在着两大主要集团，他们在内、外政策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

站在亲法西斯和亲德立场上的，主要是与煤炭和钢铁工业巨头有联系的一个集团。该集团的代表人物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主要的危险，妄图和德国结盟，把德国作为摧毁共产主义的实力。他们极力鼓吹向德国退让和向德国投降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与其让人民力量在法国获胜，毋宁让希特勒主义获胜。他们的口号是：“希特勒比人民阵线优越”。贝当、赖伐尔、法兰亭、旭丹等是这个集团的头子，早在战前他们就以亲希特勒的观点

而著称，后来他们领导了维希法西斯卖国政府。拥护他们的人大多数是企图消灭民主自由和在法国建立法西斯制度的法西斯分子。

同殖民地剥削、对外贸易、造船业以及海上运输业有着利害关系的另一个法国大资产阶级集团，担心德国势力加强，而寄希望于同英、美结盟。这个集团的大多数代表人物的灵魂深处也是充满了反苏、反共的祸心，但他们认为有限的和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比法西斯主义保障法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更优越。象雷诺、孟戴尔、勒布伦等等这类政治头面人物体现了这一集团的观点。

这两个互相角逐的资产阶级集团都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所以在它们之间尽管有着严重的分歧，但仍存在着密切的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国民议会、总参谋部和政府中都有这两个大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

宣战以后，这两个集团间的合作从未中断。当时亲法西斯的投降主义集团既然不能阻挠法国参加反德战争，于是便和德国法西斯保持联系，并企图建立由贝当或赖伐尔领导的亲希特勒政府，与德国缔结和约。

一九四五年查明，出任驻西班牙大使后的贝当和赖伐尔之间，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就进行了有关建立投降政府的秘密谈判。而且，贝当已拟定了未来内阁成员的名单，赖伐尔也被列入名单之内。赖伐尔认为，问题只在于弄清，把政权交给贝当是否要通过合法途径，“或者为此需要制造一些重大事端”。既然投降派不能通过一般的议会道路实现建立亲希特勒政府的希望，他们便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德军进攻和法国失败这些“重大事端”上。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德国发动的西线战役成了法国统治集团中投降派的推动力。从此，他们的势力明显加强。法国资产

阶级吸取了战争失败往往导致革命的历史教训。它对战争失败出现巴黎公社的后果记忆犹新。公社的情景不断展现在法国统治者的眼前，因而，在前线刚遇挫折时，法国统治集团便充满了丧魂落魄的恐惧心理。在他们看来，革命可能就在眼前。

五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深夜，法军前线崩溃。五月十六日，荷兰军队投降，于是法军司令部向政府报告，德军可能在数小时内就要逼近首都。

恐慌情绪笼罩着资产阶级的巴黎。国家上层集团中充满了“一片慌乱”，总指挥部发出了有关必须停战的声明。据法国总理雷诺说，“整个国家有被失败主义浪潮淹没的危险。”

……类似这种消息的反复涌现，非常突出地说明了法国统治集团的情绪。对革命怀有恐惧心理、迷信法西斯德国实力的绝大多数法国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寻求与希特勒和解的途径，以便在他的协助下保存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单纯军事上的失利，说明了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以后，为什么在法国统治集团中是如此广泛地散布“失败主义”和停战意图的原因。

在大多数法国大资产阶级开始转向失败主义和亲法西斯立场以后，政治上和精神上准备停止军事行动以及与德国法西斯“合作”的投降派集团在政府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月十六日，贝当被雷诺召回巴黎，并从五月十八日起以副总理的身份参加了政府。据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供述，雷诺之所以把贝当纳入自己的政府，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让象元帅一类的人占据首要地位，那么实现投降就比较容易了”。在同一天，雷诺又把另一个投降派——魏刚将军召回首都。魏刚一向是以反苏与反共和制精神而著称的。五月十九日，魏刚充任总司令要职。

报界巨头勃鲁姆、金融资本家布季里耶、叛徒弗罗萨尔、法西斯“战斗十字团”首领伊巴涅加赞、以及印度支那银行经理博杜恩等著名的失败主义者也都参加了雷诺政府。他们和政府中原有的投降派一起，组成了积极拥护停战的集团，并达到了停战的目的。

投降派在政府中的势力加强，受到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热烈赞扬。雷诺在战后证实说：“当贝当元帅参加我的政府时，报界欣喜若狂。”

五月十六日，贝当在马德里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副总理后，曾向佛朗哥将军表示：“我的祖国战败了，所以召我去缔结和约与签订停战协定。”尽人皆知，佛朗哥同德国和意大利是有勾结的。毫无疑问，这与其说是向马德里表明态度，不如说是向柏林暗送秋波。

根据西班牙政府向柏林提交的情报，五月二十五日，贝当在巴黎曾对西班牙大使说，虽然“一个月以前还有同德国和解的可能”，但现在法国的形势是很严重的。当大使在回答中表示，贝当“如果是法国的首脑，那也许还能找到出路”时，这位元帅指出，他“不认为元首会听从他的意见”。可见，贝当并不反对大使建议他执政和寻求与德国和解的计划；他只担心希特勒不听他的。

“共和制信念的宿仇”魏刚和海军司令达尔朗同贝当持相同立场。早在五月五日，当关于贝当尽快参加政府的问题被确定之后，贝当曾建议达尔朗“相互支持”。贝当与赖伐尔及其追随者重新恢复联系，他们在国民议会中进行了一番活动以后，便要求“贝当出任政府首脑”，并要求停止军事行动。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步形成的贝当和赖伐尔之间的这种勾结，逐渐发展为失败主义者的阴谋。贝当和魏刚领导的失败主

义者集团认为战争失败可能导致革命，所以便坚决要求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当时政府手中尚有“可靠”部队，可以用来反对人民。所以在一九四〇年五到六月召开的一系列国务会议上，与其说是讨论组织防务问题，倒不如说是讨论保存国内的资本主义“秩序”问题。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军事委员会，即雷诺政府领导的小组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关于停战的问题。

魏刚在会上发言，把前线情况描述得凄凄惨惨，明显暗示希望停止对德军事行动。他宣称，“法国参战是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雷诺虚伪地讲了几句关于必须继续战斗的话之后说，对“我们的敌人会马上让我们停战”表示怀疑。

法国总统勒布伦提议不必考虑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所缔结的禁止片面和约的英法协定，“如果德国向我们提出相对的有利条件，可以对它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冷静的讨论”。贝当非常激烈地指责英国没有对法国给以足够的援助，露骨地暗示英法同盟只能妨碍法国的手脚。海军部长康平基说，雷诺政府既然和英国有盟约关系，并且不能和德国签订和约，他“就只好辞职”。

最后，魏刚再次发言，建议向英国提出有关单独媾和的问题。魏刚要求政府不要放弃巴黎，甚至在可能落进德国手里的危急情况下，也不要放弃巴黎。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巴黎革命运动的发展”。在雷诺的完全赞许下，魏刚声明说：“我们应当保存维持国内秩序的手段，假如最后的组织力量，即军队被击溃，只要不产生什么乱子就行了。”

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六日，雷诺访问英国。正如雷诺的军事办公厅主任所指出，“五月二十六日雷诺是停战的拥护者。他特地到伦敦去和丘吉尔商谈这件事。”同丘吉尔会见后，雷诺通知他说，“法国可能退出战争”。

一九四〇年六月初，在敦刻尔克地区的英法军团被围歼以后，德国法西斯军队重整旗鼓进攻巴黎。

英国政府认为法军败北不可避免，拒绝向法国派出自己的陆、空军后备部队。英国的态度引起法国政府严重不安，深信不仅法国军队，而且英国军队将很快被击溃，还怀疑英国准备牺牲法国利益与德国达成协议。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贝当曾和一位西班牙驻巴黎的外交代表议论过可能发动国家改变的问题。

贝当和他的同谋者认为，只有在德国进攻不断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地实行国家政变，所以他们就向德国通风报信。但是，由于德军迅速向前推进，已经超过他们预定政变的具体日程。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西班牙外交部收到从巴黎来的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德国大使立刻转到了德国：“如果新的德国攻势获得成功，德军兵临城下，勒布伦总统将辞职并拥立贝当元帅。”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法西斯意大利向法国宣战。同一天，法国政府弃巴黎南逃，先到图尔，而后迁至波尔多。六月十一日，魏刚甚至未征询政府意见，便宣布巴黎为“开放”城市，即不设防城市，而且命令警察坚守自己的岗位，直至希特勒匪徒进城，以便弹压人民风潮和将巴黎拱手交给德国法西斯。当时在法国的英国资产阶级记者沃特菲尔德证实说：“政府不希望雷诺工厂的工人和巴黎的其他居民进行战斗。它甚至命令警察在工人首次试图组织保卫巴黎的时候就开枪射击。”

六月十一日，从巴黎撤出的法国部长们和丘吉尔进行了会谈。早就料到法国很快要投降的丘吉尔，在法国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了关于法国舰队命运的“严峻问题”，这是一个使他头痛的问题。丘吉尔再次拒绝了法国对空援的要求，并建议在法国占

领区组织游击战。这一建议立即遭到贝当和雷诺的坚决拒绝。

此后，既然法国统治集团拒绝号召人民，拒绝变战争为真正的反法西斯战争，他们便只有投降，或是只好移居国外，首先是在北非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继续斗争。

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到十六日，在图尔和波尔多的法国政府的会议上，失败主义者继续力争与德国达成签订停战协定的决议。六月十二日，魏刚在贝当支持下，要求法国政府向德国请求停战，但政府把这问题延期到雷诺和丘吉尔的下一次会晤后再解决。

六月十三日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雷诺与丘吉尔的会谈及法国内阁会议。

雷诺向前来法国访问的丘吉尔询问：假如法国政府请求停战，英国将持何态度？丘吉尔的回答闪烁其辞，声称应先和罗斯福商量，然后说，英国不同意停战。但同时暗示，如果不让法国的海军落进德国的手里，英国政府对单独媾和将不表示反对。

与丘吉尔会谈后，雷诺急忙去参加内阁会议，并说明英国政府不同意法德之间单独媾和。魏刚又一次要求立即签订停战协定。他以责备的口吻把部长们痛斥了一顿，声明，虽然要冒落进德国人手掌的风险，政府仍应留在巴黎。他还威胁说，如果部长们移居国外，则将在法国成立与德国签订协议的新政府。魏刚对那些打算渡海去阿尔及利亚的人大声疾呼道，离开法国以后，“难道他们以为还有什么权力”。魏刚企图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部长们直接挑衅，吓唬说，在巴黎似乎爆发了“共产党起义”，而且共产党人已占领了总统府。据目击者供述，这种受贝当支持的卑鄙挑衅行为“使部长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最后魏刚声明，即使政府采取迁移非洲的决定，他也不服从这项决定，随即便匆匆离开会场，扬长而去。至于贝当，他早就事先与

魏刚、布季里耶以及其他失败主义者商妥，然后发表声明说：“停战不可避免”，谁要是坚持主张把政府迁往国外，谁就是逃兵。并表明，“即使坚决要他离开政府”，他也不服从迁移的决定。

贝当和魏刚受到博杜恩、布季里耶、伊巴涅加赉和勃鲁姆等人的支持。因此，相当一部分部长和司令拒绝服从实际上已经瘫痪的与无所作为的政府。

六月十三日，政府未作出任何决议。根据雷诺的建议，会议延期到求援得到答复时为止。第二天，雷诺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求援。既然雷诺早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就请求罗斯福向德国宣战而遭到拒绝，他便能以充分的信心等待罗斯福对他六月十四日致电的否定答复。电文中说，“唯有美国政府改变情况，法国才能继续战斗下去。”雷诺的军事办公厅主任公开论及致罗斯福的电文说：“当我拟就这份电文时，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正式记录下拒绝的回电。”

雷诺既认为继续战斗是无益的，但又不愿承担投降的责任，因而耍弄了向罗斯福求援的花招，这既保全自己反对停战派的名声，又能促进投降。果然，罗斯福的答复只向法国保证给以物质上的支援，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予以军事援助。这就使失败主义者抓住雷诺说过的没有美国支援便不能继续战争这句话，态度更加强硬起来。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德国法西斯军队进入巴黎。同一天，法国政府和议会两院的部分议员逃往波尔多。在混乱一团与惊慌失措的形势下，失败主义者急如星火地准备夺取政权。为了参加六月十五日行将召开的决定性的内阁会议，贝当未经总理同意便召来魏刚。赖伐尔和他的助手劝说其他议员，使他们相信继续抵抗德国可能引起各地的起义和使法国引起“某种类似的全面苏维埃化”。于是议员们纠缠着勒布伦和雷诺，要求立

即投降。

雷诺和他的同僚们同意投降，但又想逃避这可耻行为的责任，因此便认为必须效法荷兰，由军事统帅签署投降条款。六月十五日，雷诺建议魏刚着手投降谈判，并答应授予他有关的书面命令。但魏刚声明，他“不愿承担这项责任”。魏刚清楚地懂得，要求自己士兵投降的总司令，有被法国军法判处绞刑的危险，所以他认为宁取比利时的方式，由政府本身进行投降谈判为好。

在后来所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雷诺在部长们的一致同意下，再次提议进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并把这一使命指派给军事统帅部。政府一致决定投降。但魏刚再次拒绝进行投降谈判。于是，根据受到共和国总统勒布伦支持的旭丹和弗罗萨尔的建议，决定先以政府的名义探询一下德国关于停战的条件。六月十五日，会议采纳旭丹的意见，投降问题业已确定。

在六月十六日内阁会议中，贝当正式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如果到晚上还不通过缔结停战协定的决议，他便辞职。当时雷诺已辞职，甚至未把此事预先告诉他政府的所有成员。当着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赫里欧和让奈内的面，雷诺亲自建议勒布伦总统委任贝当组织政府。得到勒布伦总统的同意后，贝当立即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部长名单读给法国总统听。许多失败主义的积极分子，魏刚、博杜恩、旭丹、弗罗萨尔等等，都参加了贝当政府。而且还得到勃鲁姆、社会党人法夫里耶和里维尔的支持。

六月十六日深夜十二点半，贝当政府召集了第一次会议。在十分钟的会议中，贝当政府决定立即向德国请求停战。通过西班牙政府发出的停战请求书还没有如期到达德国的时候，贝当便在六月十七日凌晨发表了广播讲话：“应当停止战斗”。第二天，还未收到德国的明确答复，魏刚便宣布所有两万以上人口的

城市为“不设防”城市，以便彻底打乱继续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切意图。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希特勒收到了贝当政府的停战请求书，便下令继续进攻，同时建议墨索里尼于第二天在慕尼黑会晤，共商时局。

当时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正象英、美政府所关注的一样，是法国的舰队问题。法国殖民地的命运和海上军事行动的进程都取决于舰队的态度。

希特勒认为，如果法国舰队投向英国方面，英国海军的实力“实际上要增加两倍或三倍，特别是在驱逐舰方面”。根据他的意见，必须“和法国政府达成有关舰队中立的协议”，并解除在法国或在中立国（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港口的法国舰队的武装。只有在法国政府不让舰队拒绝接受德国的建议和不使它驶往英国、并在那里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希特勒才同意采取一些次要的让步（包括放弃占领奥尔良市）。

德军继续进攻的结果，使贝当政府的地位很不稳定。政界头面人物又重新提出迁都阿尔及利亚的方案。当时，贝当在西班牙大使的帮助下，向德国请求停止进攻和不要占领波尔多。在六月十九日经西班牙之手转交给柏林的一份报告中说：“法国政府现在很难把握住形势。虽然贝当花了很大的精力，但仍然存在着危险性”，“如果德军威胁波尔多，政府将维持不下去”。

过了一小时，西班牙外交部长再次召见德国大使，转给他一份西班牙大使从波尔多新发来的急电报告。报告中说：“形势在不断恶化。如要和法国缔结协定，行动必须尽可能快点。”大使在报道了一部分法国政界人物打算去阿尔及利亚以后，特别指出：“如果德国和意大利认为与法国领土上的法国政府缔结条约有利的話”，则必须放弃德军对波尔多的进攻。这份报告立即见

效。六月二十日凌晨五时，柏林收到这份报告。上午九时三十五分，向驻西班牙大使发出紧急答复，甚至破例未用密码。答复中表示德国政府同意派出代表团和法国进行谈判，并于当天正式下达通知。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巴黎附近的贡比涅森林里，有一节从博物馆拖来的车厢，一九一八年福煦元帅在这节车厢里曾迫使德国接受停战条款，现在就在这节车厢里举行了对法国极其屈辱的德法谈判。凯特尔率领着德国代表团，洪齐格将军率领着法国代表团。

宣布举行谈判后，凯特尔声明对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停战方案是最后的方案，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推翻。他拒绝商讨停战的条件，并声明只同意解释个别条文的内容。接着洪齐格向德国代表团提出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关于为了镇压国内可能发生的革命运动，能否允许贝当政府拥有军队的问题。洪齐格说：“经验表明，在法国目前所经受的可怕危机过后，国家有陷入共产主义的危险。法国政府打算不惜任何代价及时预防。因此它需要军队，法国决不用这支军队来反对德国，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国内秩序”。希特勒分子同意建立这种军队，人数为十二万到十三万人。法国代表团的其他要求都遭到拒绝。当法国代表团企图继续商谈时，凯特尔便向它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于一小时内表态：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停战条款。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签订了法德停战协定。

按照停战条件，法国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法国海军，必须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监督下裁减和复员，容许贝当为维持“秩序”的那部分军队除外。三分之二的法国领土——它的工业区和巴黎——由德国占领。法国应当遣返德国战俘和向德国引渡政治侨民。同时，一百八十万法国战俘应留在德国，“直到缔结和约

为止”。法国要保证供给占领军生活费用，占领军的人数和费用暂不明确规定。委托遵循德国最高统帅部指令而行动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履行停战条件。在这个委员会下面，法国政府应有自己的代表团，以便“呈报法国的要求和执行德国停战委员会的命令”。停战协定不受任何时间约束，它的有效期一直保持到签订和约时为止，和约的日期暂不规定，而且德国有权在任何时候废除停战协定。

法德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国代表团立即奔赴罗马，在那里和意大利举行了谈判。

签订法意停战协定后，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与德国签订的停战协定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生效。

（摘译自一九六一年第三期《莫斯科大学学报》
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

敦刻尔克的九天

〔英〕戴维·迪万

编者按：一九四〇年的敦刻尔克大溃退，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必然恶果。至此，西欧大陆全部陷入了希特勒的魔掌。本文描述了九天的溃退过程。尽管作者处处给英国资产阶级政府脸上贴金，但也无法掩饰英军把友军丢在一边、只顾自己逃命的丑恶行径。

这不是敦刻尔克的全部情节。由于战役的性质，撤退的特征，许多情节势必失传而没有载入史册。卷入这次战役的军队，如果把我们的盟军和敌军都计算在内，有一百万人。参加这次战役的英国、比利时、法国以及德国的船舰有一千艘。

一九一八年之后的厌战情绪、金融危机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运动，导致英国陆军裁减到了严重不足的地步。一九三九年，英国匆匆作出决定，派遣远征军到法国去作战，但已为时过晚。这一决定使英国调去了几乎它的全部训练有素的、配有装备的部队。结果装备丢弃在佛兰德^①，只把人员撤了回来。

要了解敦刻尔克“九天的奇迹”，至少必须笼统地了解一下敦刻尔克之前十六天内打的仗。通过这一仗，德军征服了荷兰，打垮了比利时，象狂风那样，扫荡了法国的田野。

^① 包括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内的地区。——译者

德国对西方国家发动的进攻在其第一阶段是一个军事杰作。过去，战争是靠使用新武器和新战术来打赢的。在这次冷酷无情地采用一种新技巧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地宣告陷落，这确是以前罕见的。

这场闪电战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发动的。五月十四日，荷兰被征服。五月二十七日，英军左翼的比利时部队被打得焦头烂额之后也投降了。陷入包围圈的是英国远征军、法国第一集团军和法国第七集团军的残余部队。法国的运气坏到了极点。

运动对静止，胜利归于运动的一方。一支由坦克、飞机、机械化部队组成的进行运动的军队对根据防守原则而产生的马奇诺防线，胜利归于进行运动的军队。

十六日晚，戈特勋爵统率的英国远征军开始向斯凯尔特河撤退。这天晚上明月当空，撤军进行得颇为顺利，同时德国隆美尔元帅也冲破了法军的防线。在明月高照下，隆美尔写道：“向西方的道路可打通啦。”这次月出后，敦刻尔克的撤退已势在必行，这已如希腊式悲剧到了高潮那样，昭然若揭了。

五月十四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九点钟的新闻报道中发出了下述通知：

“海军部已发布命令，要求所有三十呎至六十呎长的机动游艇的拥有者自即日起十四天内向海军部登记。”

一些评论者认为这一通知就是海军方面为撤退作准备的开始。特别是，法国人指出这就是英国早就决定要撤退，并且是在不同法国人商量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明证”之一。

二十二日，北方兵团总的形势已大为恶化。阿腊斯已三面被围。二十三日，在敦刻尔克西面，布伦已危在旦夕，加来也即将被包围。

二十四日晨，法国魏刚将军大发雷霆，指责英国在向港口退却，在德国人没有迫使他们非如此不行的情况下放弃了阿腊斯。同时，东面的战事又发生了新的危急状态。德国包克将军对比利时军队防守的战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戈特面临着在东面的战事中他的左翼比利时人瓦解的可能性。官方的历史是这样描绘的：

“六时，戈特勋爵采取了整个战役中他的最关键性的行动。他没有等待法国司令的批准，就命令英国第五师和第五十师放弃原定二十六日向南进攻的准备，立即开赴英比军队间正在出现的缺口。他这样做拯救了英国远征军。”^①

星期日，五月二十六日

晨十时三十分，戈特接到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发来的电报，内容如下：

“我所得到的各种情报都表明，法军从索姆河发动攻势将完全不足以对北方盟国军队发生作用。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你面临的形势就是英国远征军的安全将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头向西打，用格拉夫林以东的海滩和港口作为上船地点。海军将提供船队，皇家空军将提供充分的空中掩护。由于撤退可能即将开始，务必立即订出初步计划……”

作出决定的时刻来到了。戈特作了如下的答复：

“……我决不能向你隐瞒这一点；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势必要丧失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人员及其装备。”

^① 见埃利斯少校著《法国和佛兰德之战》一书。

当戈特在司令部里力图估价这些新的事态发展时，他从陆军大臣那里接到了第二份电报。该电报的结束语说：

“……你除了向海岸撤退外已别无出路……雷诺（法国总理）正在同魏刚将军联系，后者无疑将立即发出这方面的命令。现授权你配合法比军队立即向海岸行动。”

英国政府就这样作出了决定。

五月二十六日晚十八时五十七分，即下午七时缺三分，海军部发出信号：“‘发电机作战计划’现在开始实行了。”

这个作战计划实际上早已开始。根据法国海岸那里来的情报，海军上将拉姆齐在下午三时就自行决定开始派运兵船到敦刻尔克去。当信号传到彼岸时，头批人员早已在上船。他的先见是有理由的。这一晚上的十时三十分，第一批军队就在英国多佛尔港下船了。

星期日深夜，拉姆齐又接到海军部信号，通知他说：

“……‘发电机作战计划’必须以最大努力加以贯彻，应准备在两天内撤走四万五千名英国远征军，两天过去撤退工作可能就将为敌军的行动所打断。”

随着夜晚缓慢地过去，拉姆齐又得考虑第二个因素。发来的信号表明加来地区发出的炮击有增无已，显然那条主要航道，距离较短的Z路线，在白天通过已危险万分。船只已开始折回。

从船上的人看来，这个星期天晚上的情况又如何呢？马恩岛邮船“莫纳皇后”号船长达根描绘的图景是生动的：

“我们的船上立即是一片鬼哭神嚎之声。岸上有的大炮向我们打出单发的炮弹，有的炮群则对着我们齐发。我们周围真是炮弹满天飞。第一次齐发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第二次打在我们船后。我想再来一次就要打中我们了。幸好这一次又偏了一些，打在我们船尾附近。船上到处是弹片，但基本上是碰在

备用艇上和散步甲板上。然后我们又遭到来自空中的袭击。一架容克式轰炸机对准我们俯冲，丢下五枚炸弹，但是都偏离了目标，看来大概是偏离了一百五十呎。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遭到炮击，虽然我们已离开了大炮的射程。轰炸我们的容克式飞机被击中，一头栽下来，就掉在我们前面的海里。然后另一架容克式飞机又飞来准备对我们发动袭击，但它没有来得及到我们头顶上就被打了下来。于是形势才缓和了些。

“由于猛烈的炮击和轰炸，我可以看出我们一些人直打哆嗦。我自己也不好过，但是我还是把水手们集合在一起，告诉他们，敦刻尔克已遭到炮击，火光冲天。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去，他们一致表示愿意。我可以高兴地说我们让‘莫纳皇后’号装足了人，把他们运了回来。从敦刻尔克回来时，我自己决定了一条路线，总算顺顺当当在星期一凌晨安全到达多佛尔港……”

这些船只所写出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从一开始，拉姆齐就面临着骇人听闻的困难，加来方面大炮在密集袭击，敌方空袭在迅速升级，敦刻尔克港的设施已毁，在空袭下进港已万分危险。

当这一星期日的黑夜降临敦刻尔克港时，该港已成了恐怖之地。为外防波堤所包围的大港湾之西，油池已成一片火海，火光照映着整个防波堤。通向主要港湾的悬开式吊桥下面已起火，高高的白圆柱灯塔也已起火。港湾一带占地一百十五英亩的货栈也在燃烧。在港湾的熊熊烈火中，隐约可见一座座损坏了的起重机。烟雾间或消散时就更突出了敦刻尔克镇上大火弥漫的情况。炸弹爆炸声整夜响个不停，爆炸发出的闪光表明破坏活动正在持续进行着。

在多佛尔港悬崖的顶上一片寂静，但可以听到远处炸弹的爆炸声。在“发电机计划”作战室中，参谋人员开始准备利用开阔海滩的计划。现在拉姆齐掌握的力量主要弱点在于小船不

够。这一夜他能调动的只有拉姆斯格特缉私基地的汽艇、多佛尔基地的拖网渔船和小船，以及四艘比利时客轮。除了舰艇上自备的小船外，这就是所有的小船了。他立即向海军部发出了要求增援的呼吁。

小船管理处立即派出所有能调动的工作人员前往各主要游艇中心联系。指挥伦敦港的海军将官、扑次茅斯的总指挥以及其他海军当局也都接到了进行这方面活动的信号。根据英国广播公司五月十四日发布的通知而进行登记的游艇拥有者也都接到了电话通知。

小船行动起来了。

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的参谋长、海军上将施尼温德这天致戈林的备忘录中却说：“还没有执行或准备这种运输的迹象。”

到这一星期日午夜为止，已有两万七千九百三十六人运回英国。德国情报部门未能向德国海军部提供这方面的情报是很奇怪的。施尼温德海军上将未能正确分析他必然收到的加来地区德国古德里安将军的装甲师、德国空军、他自己的快速鱼雷艇送来的情报，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星期一，五月二十七日

“敦刻尔克已经在望，我们却被命令停止前进！德国空军在进攻，我们却袖手旁观着。我们眼看着由各种大小船只组成的舰队在把英国军队撤走。”——古德里安将军

古德里安的伤心话表明了德国装甲师懊恼和失望的程度。是伦斯德元帅命令他们在敦刻尔克已经在望时停止前进的。从瓦当的山上，他们可以看到这个港口的住房。他们忍气吞声地在那里呆了三天。现在他们又蜂拥向前了。

率领钳形攻势南端第七装甲师的隆美尔欣喜若狂地写信给他的妻子说：

“我一切顺利。我们正在利尔忙于包围英法军队。我是在西南方面参加这次攻势……”

隆美尔的信写得早了二十四小时。包围圈的合拢迟了二十四小时。英国远征军第一、三、四和四十二师以及法国第一集团军的三分之一，通过一条不到十哩阔的夹缝，在五月二十七日黑夜中溜了出去。包围圈未能合拢是因为英国第二师在援助断绝、单独作战的情况下，整天坚持了战斗。这次进攻轰隆轰隆地进行了一整天，是整个战役中对英国远征军发动的大炮、轰炸机和坦克相结合的最猛烈的一次进攻。第二师拚死地守着阵地，寸土必争地战斗着，然后缓慢地向后退，被包围和压垮。当夜幕降临时，在中间的第四旅已不复存在，两边的第五、六两旅也溃散了。在天已全黑时，这一师人只存下一个旅的兵力了。但它牵制住了霍特将军的集团军群的兵力，在黑夜中它背后的大规模撤退已开始了。

然而还必须做一件事：在敦刻尔克周围建立起防御圈现在是生死攸关的事了。

星期日晚，戈特已指定罗纳德·亚当爵士组织敦刻尔克的防御。五月二十七日晨七时，在卡塞尔的索瓦热饭店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罗纳德·亚当爵士同法国的法加尔德将军讨论了敦刻尔克防御圈的各种可能性，最后达成正式协议。英国人将防守从尼乌波特沿运河经过弗内斯到伯格城一线，法国人将防守从伯格城外到格拉夫林一线。两个将军在草图上签了字。

接着正式会议开始了。亚当代表戈特勋爵率领一批高级军官参加，法方出席的有布朗夏尔将军、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普

利欧将军(指挥第一集团军)、洛朗西将军(指挥第三军),还有总司令魏刚将军的参谋长科尔茨将军。这次卡塞尔正式会议或许就是不讲现实的典型。在二十分钟不着边际、一事无成的讨论之后,科尔茨将军起来说话了。他说他领会“魏刚的精神”,形势要求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攻势,应该开始向西南进军,法国第十六军应立即出发去收复加来。这使在场的法国人都头脑发热起来了。

通过驻比利时军总部的罗杰·凯斯爵士传来了比利时国王的信息:

“……他担心这一时刻已迅速来临,他已不再指望他的军队能继续作战,继续对英国远征军起作用。他希望你认识到,他已面临彻底崩溃的形势,将不得不投降了。”

就在戈特读了这个信息之后,他又接到了来自魏刚的信息:

“魏刚将军将亲自向戈特将军作出这一呼吁。英军一定要积极参加必须进行的联合反攻。形势要求猛打猛攻。”

卡塞尔会议是如此不顾现实局面,因此戈特就出发想亲自找到布朗夏尔。在这次可怕的旅行中,他必须通过充塞着难民、马车和损坏了的车辆的道路。在一段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已经知道他北面的比利时盟军已停止作战,从他的左翼通向海岸的二十哩宽的地带已无人防守。在黑夜中,在处处是一派恐怖景象的情况下,部队之间失去了联系,指挥员之间失去了联系。但不可思议地,各个师终于从混乱中解脱出来,进驻戈特所指定的防线,建立了新的战线。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为什么投降了呢?

不可隐讳的事实是比利时军队在战场上打了败仗。比利时人缺少军火,缺少运输工具,没有重武器,没有空中掩护,他们是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明显的事实是,当英国政府决定撤退时,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要同利奥波德商量。直到这个星期一的早晨为止，没有人把英国政府的意图通知过利奥波德。

五月二十七日的黎明，海上一片混乱，情况不明。由于加来方面的炮击和德国空军的袭击有增无已，许多船只不得不折回。人员伤亡和船只被毁的数字开始上升。例如，武装的运兵船“莫纳岛”号在上一天晚上已停泊在敦刻尔克。它容纳了一千四百二十名士兵，星期一清晨离港返航，受到格拉夫林和莱赫姆斯之间德国大炮的袭击。不久之后，它又遭遇空袭。船上死二十三人，伤六十人。这是撤退开始以来第一次较大的伤亡。

信号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多佛尔，事实冷酷地表明，到敦刻尔克去的近路在白天已不得不放弃使用。

另外有两条可能的路线。Y线路程八十七哩（那条近路只有三十九哩）。X线路程五十五哩。但已知道X线被布了水雷，而Y线则可能有水雷，可能没有水雷。海军上将拉姆齐横了一下心，决定接受这一风险。

这条长的路线把航行时间拉长了一倍，逻辑上讲，也就增加了船只的需要量。时间的损失是无法避免的了，而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遭受德国空军袭击的可能也增加了。后一因素通过增派巡逻战斗机而部分地抵消了。这一天英国空军指挥部下令，十六个空军中队从清晨五时直到傍晚要尽可能不断地进行巡逻。每一次巡逻的飞机从九架到二十架不等，有的中队这天共出动了三次。虽然德国空军的主力仍旧在对付垂死挣扎的比利时军队，虽然英国飞机的巡逻次数已增加，敦刻尔克本身还是遭到十二次空袭的狂轰滥炸。

从海军的角度来看，岸上情况也不明。早一天，海军上校坦南特曾自愿报名要参加撤退工作。他接到命令前往敦刻尔克担任岸上的海军高级军官。这个星期一中午过后不久，他率领了

十二名军官和一百六十名水兵从多佛尔出发。路上每隔半小时就要遭到轰炸机的袭击。当坦南特在下午六时到达敦刻尔克时，该城是一片火海，港口设施已损毁殆尽，轰炸似乎连续不断，他在当地收到的情报也是令人惊慌的。下午八时，他拍出电报说：

“请立即派所有船只到敦刻尔克以东的海滩。明天晚上能否进行撤退工作已成问题。”

在海滩上，撤退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大船使用他们自己的小船，这是贸易部所批准定造的笨重救生船，适用于深海，对敦刻尔克的浅滩来说，再没有什么船比它更不合适的了。

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尽量使用一切现有的合适的小船，一是另找带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海军上校坦南特在燃烧着的货栈的火光中考虑着依旧利用海港本身的可能性，决定试验在东防波堤停大船的可能性。防波堤并不是为停船而建造的，但停船的可能性是有的。他大胆地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发出信号，让一只船靠拢来。这只船毫无困难地靠了堤，于是其他船也可照此办理了。

小船也已开始行动起来。令人沮丧的明摆着的事实是，除非有大量小船到海滩来，运输工作将是缓慢的。这是失败的一天，到达英国的人数仅七千六百六十九人。有一件事情挽回了败局。当时还无法估计这一事情的价值究竟多大，无法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事情之上，然而坦南特发出的关于船舶可以在东防波堤停泊的电报却是敦刻尔克撤退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星期二，五月二十八日

五月二十八日晨，陆上的关键因素是比利时军投降所带来的后果。

二十七日午夜，英国第五十师的左翼到沿海尼乌波特的二十哩地带已敞开着让包克的兵力进行势在必行的进攻。

左翼现在由布鲁克负责指挥。他的紧急任务是要堵住漏洞，保住东线，把到沿海尼乌波特的防线建立起来。

东线战事打响了。面对着八个德国师，五个英国师已坚守在阵地上。

上午晚些时候，古德里安视察了面对敦刻尔克西部防御圈的第十九军的前线。晚上，那个在卡塞尔大言不惭地谈论要进攻加来的法加尔德带着法军后退了六哩。德国第一装甲师打头阵的坦克离敦刻尔克港只有八哩，防波堤已在射程之内。但古德里安在视察了这一地区后写道：“进一步发动坦克攻势将不必要地牺牲我们最精锐的部队。”

在中央战线的南面，德国的钳形攻势逐渐合拢，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同包克的第七步兵师会师了。他们合拢得太迟了，英国远征军已脱逃。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什么胜利可言，但法国第一集团军的六个师被他们堵住了，关在利尔西南运河之间的四边形地区内。

这天夜里，布朗夏尔拍了电报给魏刚，说戈特擅自让他的军队向敦刻尔克方向撤退，其结果是使法国第一集团军的侧翼暴露。第二天上午，魏刚要军事委员会主席就“戈特过于自私的态度”提出抗议。

当口袋愈来愈缩小，各师兵力在后退，临时阵地在坚守时，海上的形势却改观了。这个星期二一早，坦南特就发出信号让船只到东防波堤来。夜间，他已把要上船的人组织起来待命上船，建立了管理制度，安排了照顾船舶停靠的人员，指定了海军中校克罗斯顿为码头指挥官。

立刻，驱逐舰一艘接着一艘过来了。它们载满了人，船尾向

外，开出港口，返航多佛尔。在“发电机计划”作战室里，拉姆齐又一次调整了计划，重点又从海滩转移到了打得不成样的海港，运兵船也接到命令到防波堤去加入驱逐舰的队伍。

然后，随着下午的逐渐过去，海滩上的形势也改善了。第一批小船已来。一艘接一艘的捕鲸船和救生船也来了。扫雷艇舰队也从北面很远的罗赛斯驶来了。从北海和英国东部沿海各港调来了驱逐舰到敦刻尔克加入那里备受炮轰的舰队。拖船、驳船、沿海航船和近海商船也开始驶来。

大船继续进行着工作。随着每个小时的过去，它们的任务更艰巨，危险更大了。

多佛尔港拥挤到了顶点。

在敦刻尔克沿海和海滩上，困难甚至更大。沿海水道狭窄。在空袭之下，船艇都开足马力行驶，但在大多数水域里，都几乎不可能采取急刹车避免相撞的行动。这些水域早已在布雷期间和撤退头几天中因舰艇的沉毁而充塞着失事船只的残骸，而随着撤退工作的继续进行，失事船只急剧增加。船只的失事带来了漂浮的残物：浸满水的小船、木块、系船用的粗绳、死尸。

在这恶梦般的阶段过去后，运输船只或到东防波堤，或到海滩去。沿海滩的船只在敌方阵阵空袭中一连几小时等着兵士慢慢过来。在港口，上船的行动是迅速的，周围是炸弹的尖叫声，德国大炮发射的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这些大炮在那一整天中从西面愈移愈近港口了。

随着白天时间的过去，驱逐舰愈来愈多。由于加快了速度，上船人数激增。“科德林顿”号在东防波堤停泊后载走了七百人。“手榴弹”号试验性地到西防波堤去停靠，发现也能在那里停船，也载走了七百人。由于浅水中它们不能高速航行，它们以每小时二十二里的速度驶往多佛尔，卸下人就再去运更多的人。这

一次“科德林顿”号载走了九百人。

这些数字关系极其重大，这是撤退工作的转折点。驱逐舰不是造来运兵的。根据现在的标准，这些是小舰。船上一半多地位为机器间、锅炉间和弹药库所占掉。甲板上挤满了大炮、鱼雷发射管和深水炸弹发射架。它们能搭九百个兵并把他们安全送往目的地，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五月二十八日的二十四小时内，一万七千八百零四人安全地回到英国。这个数字不够大，但这是一个开端。海军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星期三，五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东西两线的战事已合而为一。在黑夜将尽的最后几小时内建立了后卫部队的战线。根据戈特的撤退计划，这条战线由布鲁克的第二军的部分人员据守。

过了半个上午之后，遭受轰炸机袭击和重炮轰击的第四十二师开始后撤。到了傍晚，总撤退开始了。

在海上，这一天一开始就遇到了灾难。午夜时，“戒备”号驱逐舰满载士兵走Y路线返航。上午零点四十五分，当它正以每小时二十里的速度“之”字形地航行时，它发现了两枚鱼雷。一枚偏离了目标，另一枚却打个正中。驱逐舰在中间分裂为二，十五秒钟内它就沉没了。两部分都竖立了起来，船尾和船头露在水面上。士兵大部分下沉海底，与船同归于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船员漂流得救。凌晨，仅仅几个钟点之内就这样损失了三艘驱逐舰。

拂晓时，四艘驱逐舰组成的一支分队遭到一艘潜艇的攻击。一枚鱼雷在驱逐舰行列中穿过，波兰船“布莱斯卡维查”号立即

回敬以一发深水炸弹，一艘英国船也打出了一发。当它们准备进行第二次进攻时，轰炸机从低空对它们进行了轰炸。接着英国飞机来了。尽管结局是双方都没有战果，潜艇以后就不再来这一地区骚扰了。

然而，空袭还是继续进行着。空袭之外，现在又产生了新的复杂因素。拂晓时，敌人的大炮已对准Y线在轰击，使尼乌波特沿海已不能靠近。

这一消息传至多佛尔后，海军上将拉姆齐不得不再一次作出大胆的决定。尽管中间那条X线，扫雷工作还未完成，但晌午前，他就派了三艘驱逐舰去试验对岸大炮的情况，以估价是否可用此线来代替Y线。三艘船都遭到飞机的轰炸，但没有遭到炮击。于是对这条航线加紧了扫雷工作，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就发出信号让船只使用这条路线，要求它们“小心航行”。这句话在当时一片炮弹、炸弹、鱼雷的爆炸声中听起来可真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下午七时，海军上将拉姆齐接到消息说，“敦刻尔克港已被损坏船只堵死，因此撤退工作必须全部在海滩进行。”海军上将威克-沃克后来写道，这是由于海军驻岸上人员中一个低级军官被激烈的轰炸吓坏了，向总部作了这一大惊小怪的港口情况报告。当时要同敦刻尔克的高级海军军官联系颇有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把一切船只都调到海滩去了。

但敌方空袭力量的激增也在海滩上造成了大混乱。扫雷艇“韦弗利”号整天在海滩操作。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猛烈的空袭下它载着六百名士兵出发了。在四时左右，十二架亨克尔式轰炸机对它发动进攻。它一开始差一点就被击中，但它在弹雨中曲折前进着，一直躲过了半个小时，然后一枚炸弹把舵打坏了，最后一枚炸弹直接命中船身，打坏了军官起居室，穿过船底，开了一个直径六呎的大洞。在完全失去控制和船尾下沉的情况下，

“韦弗利”号继续战斗。可装十二磅炮弹的大炮同船上士兵的来复枪一起被用来对付俯冲飞机的机关枪和炸弹，直到船已完蛋为止。在下达弃船命令之后不到一分钟，船就沉入海底了。船长在四十五分钟后得救，但大部分船员以及三、四百名士兵已葬身海底。

这一连串船只沉没和损毁的背景牵涉到这样的事实：德国人现在把它的两支空军机群都放在西线上进行袭击了。

对防御圈和撤退中的军队却几乎已停止进攻。从中午起，不断对敦刻尔克港、海滩以及进港航道进行空袭。英国皇家空军在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遭到巨大损失后，决定增加每次巡逻的飞机数，这就意味着两次巡逻之间的间隔时间愈来愈长。船只的巨大损失也就是在这个间隔时间里造成的。二十七日曾派出二十三批巡逻机，这天只派出九批。当巡逻机在上空时，空袭大抵就宣告中断，但是，尽管每次巡逻的飞机增加了，有时它们得全力对付敌方的战斗机，因而敌轰炸机还是能无阻碍地进行袭击。

尽管遭受了灾难，尽管敦刻尔克港的关闭带来了运输力量削弱的影响，尽管没有利用防波堤，在这二十四小时内还是有四万七千三百十名士兵在英国登陆。

星期四，五月三十日

这一星期四，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残部已顺利撤到敦刻尔克的防御圈内。

这个防御圈能维持多久呢？

这一天刚开始，陆军部接到电话报告说：“防御圈快要守不住了。”

随着这一天时间的过去，德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向防

御圈方向移动了。但德军指挥部星期三那种瘫痪和犹豫不决状态依然不变。深夜，德方作出了决定，让B集团军群的第十八集团军负责这里的一切军事行动，A集团军群对敦刻尔克已不再负担任何责任。

尽管防御圈外集结了如此巨大的兵力，三十日只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进攻。经过一场大炮猛轰之后，德军企图强渡弗内斯北面的运河。这次进攻被击退了。

在多佛尔，海军上将拉姆齐的处境极端困难。一方面，一过午夜，他就接到了“防御圈快要守不住了”的报告。另一方面，由于不能使用大型驱逐舰，就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撤退速度。他只有十五艘小型老式驱逐舰可供使用。他估计这些舰艇大概能撤走一万七千人，运兵船能撤走九千五百人，所有其他船只包括小船在内能撤走一万五千人，这样这一天共能撤走四万多人。可是，根据待命撤退人数的估计，他却必须撤走五万五千人。

这一天早些时候，他不知道经过上一夜的灾难，防波堤是否还能使用。拂晓时，“征服”号驱逐舰被派前往了解情况，作出报告。上午六时刚过，它发回电报说，虽然在防波堤里面要遇到阻碍，防波堤仍可使用。

另有一些有利因素。上一天傍晚起轰炸停止了。天气转好，海滩上浪潮已退，低空盖有密云，燃烧着的油池散布的烟幕也盖没了大部分停泊处。

同这些事情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新来的小船从凌晨起已开始陆续到达海滩。到夜幕来临时，它们已大批到达——一排排船只，形状各异，大小不一，蔚为大观。此外，陆军终于看到小船在浅水载人时困难甚大，开始建筑码头了。他们利用大炮架、卡车、弹药车造了通向深水的码头。

首相召集了三军参谋长和三军大臣举行会议。丘吉尔先生

亲笔给戈特勋爵下了如下的最后命令：

“应尽最大努力继续防守目前阵地，以便使目前顺利进行的撤退工作能撤走最多的人……如果我们仍能保持通讯，当我们认为你指挥的部队已缩减到可以移交给一个军长时，我们将给你下达命令，让你偕同你觉得应当撤退的军官返回英国。你现在即应指定这位军长。如果通讯断绝，当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不超过三师的人数时，你就应移交指挥，并按照规定的方法回国……应当命令你所选择的司令官继续与法军共同防御，并继续从敦刻尔克或海滩撤退，但是当他认为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并且不能再给敌人以相当的杀伤时，他有权与法军高级司令官协商正式投降，以免无谓的牺牲。”

同时，在丘吉尔先生的极力主张下，会议决定给法国军队以同样的撤退机会，他们不仅可用他们自己的船只，也可用英国的船只进行撤退。

这一天，耽误、混乱、精疲力竭以及敌人的恶作剧都有其一份，但到午夜统计在英国下船登陆的人数时，安全到达英国的人数共达五万三千八百二十三人。其中约三万人是在开阔的、无遮无掩的海滩那里上船的。这是小船的胜利。

星期五，五月三十一日

日出后不久，敦刻尔克海面上风向转了。起初是有点微风，接着是沁人心脾的阵阵小风吹向岸上，使狭长的浅水滩上波涛滚滚。这绝不是大风大浪，但已不是小船上精疲力竭的水手和疲劳不堪的士兵所能对付得了的。一只小船接着一只小船失去控制，横转在浅水滩上搁浅不动了。开始时，人们把船头掉过来面对大海，把船推下了海，但随着潮落，搁浅的愈来愈多，直到沿

海沙滩上小船一望无际，要上船的人只能干等在沙丘堆里。

在多佛尔，海军上将拉姆齐面前，早上的情况极为不妙：海滩边的船已无法工作，防波堤旁的船上工作已变得愈来愈危险，夜间派出的运兵船遭遇如何还没有消息。这天早上他还从海军部正式接到命令，指出英国政府的政策是“英国大小船只应对英法军队给予同等的撤退机会”。在他的算计中，这一政策的影响必然是极大的。从逻辑上来说，要运走余下的英国军队，他就得派出加倍的船只。

到了下午，风势已减退，海水已平静如镜。皇家工兵的临时码头大起作用，尽管不时地要遭到猛烈的空袭。小船又到处活跃了。

在敦刻尔克大小船中充斥着悲剧的故事。这些没有被文字记载下来、没有加以大事渲染的故事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这是一些渔船。早一天，渔船上的人还忙碌于他们的安静工作。他们对战争一无所知，他们不是去打仗的，而是去救人。他们救了人，突然在返航途中牺牲了。在这些大难临头的日子里，这不过是些小小的悲剧，然而这里有着一种很深的、虽然是默默无闻的辛酸。

伴随着炮火的愈来愈猛烈，空中活动也增加了。到了下午五、六点钟时，对船只和海滩接连发生了三次大空袭。皇家空军这一天在八次巡逻中损失了二十八架飞机。它声称共击毁敌机三十八架，但这个数字在以后同德国记录进行核对时是必须加以大大缩小的。

这一天，皇家空军在黄昏前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因为经过人员的撤退，防御圈从正面到尼乌波特战线上的抵抗力削弱了。德国B集团军群增加兵力，准备乘虚而入。在撤退工作完成之前，防线被突破的可能性激增，于是，英机轰炸了在尼乌波特和在河对面集结的敌军。轰炸机指挥部还派出飞机对从东面和南

面行军而来的敌军队伍进行袭击。

结果，一直到六月三日为止，还是守住了这条线。

在此期间，尽管情况多变，一切都没有把握，撤退工作继续在进行，法军和英军都在撤走。为了在德国人到来前全力从海滩上运走一切人，在午夜前单是从拉帕纳就撤走了五千人。这件事成功了。当第二天凌晨戈特勋爵上船回英国时，敦刻尔克撤退工作的胜利已得到保证。这一天到午夜为止，共有六万八千零十四人在英国登陆，其中有二万三千人来自海滩，其余来自港口（其中有法国人一万五千多名）。到六月一日拂晓时，“发电机作战计划”已使二十万英、法、比军队安全抵达英国了。

星期六，六月一日

敦刻尔克这一出戏迅速地在六月一日演到了高潮。在早晨的几个小时里，皇家海军遭受的损失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并不小于历史上一些大型海战。在描绘这一灾难如何开始的叙述中，下述一句话与历史有连续性，是无可挽回地同过去相关连的。^①

“我们正准备开船完成这次撤退活动，一大批德国飞机来到了我们头顶上，立即开始对准我们扔炸弹和扫机枪。”

这次战事行动中最厉害的空袭就此开始。

上午七时二十分，数量极其庞大的敌轰炸机群——主要是容克-87型俯冲轰炸机，但也有双引擎容克-88型飞机，加上有大量战斗机的掩护——出现了。在这灾难临头的狭窄的航道里，船只完全没有盟军飞机的空中掩护。驱逐舰在过去几天里几乎每个钟点都要对付空袭，已严重缺少弹药，许多舰艇在多佛尔的短暂停留时间里根本没有时间补充弹药。它们在那里的时间完

^① 指德国扩军备战中空军力量超过了英国这一事实。——译者

全用在让士兵下船，加油，然后再出海。

在一个多小时里，皇家海军已损失了三艘驱逐舰、一艘扫雷艇和一艘炮艇，另外有四艘驱逐舰损坏。

这决不是最后的灾难。下午一时，法国第二驱逐舰舰队剩下的最后一只驱逐舰正沿X线进港。离西防波堤不过四涅之遥，却被“乌云似一片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所淹没了”。那里的航道狭窄，根本不可能操纵船只躲开炸弹。不出一分钟，它被许多炸弹击中，即时倾覆下沉。

小船的损失同样也是巨大的。现在到了非改变计划不可的时刻了。海军上将拉姆齐考虑此问题时写道：

“根据情况，如果白天继续行动，必然会使船只和人员的损失同能撤走的人数之间的比例达到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如果继续蛮干，撤退工作必将迅速失去势头。”

上午八时，当德国空军对舰艇的袭击正达到高峰时，英国亚历山大将军再次会见法国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和法加尔德将军。星期日拂晓前不能胜利完成撤退工作这一点已明白无误。亚历山大将军同意修改原计划。到午夜为止将依旧守住这一条线。在此之后，根据建议，他应当撤退到被称为“敦刻尔克外围的桥头阵地，由配备所有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还没有上船的军队坚守之”。战斗结束的时刻已非常逼近了。

午夜，当六月一日上岸军队登记表填写完毕时，这一天安全抵达英国海岸的人数共达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九人。

星期日，六月二日

六月二日，旭日东升后不久，英国远征军的随军牧师在敦刻尔克的沙丘堆里举行圣餐仪式。约翰·梅斯菲尔德讲到这件事

时说，集合参加这次仪式的疲劳不堪的后卫部队士兵不得不五次散开，躲避低飞的敌机。

这一天还有三、四千英国远征军留在岸上。这些英军配备着七门高射炮和十二门反坦克炮，整天同法军一起坚守着“中间线”。法军待撤人数仍然不明。在多佛尔，海军上将拉姆齐在记录上写道，“关于还剩下多少法军的人数，估计从上一夜的二万五千名已增加到了五万到六万名。”人数的不明确使计划工作困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一个因素严峻地把事情简单化了——剩下的上船地位的容量。现在只剩下了港口（几乎不断受到炮轰）和仅仅一哩半长的海滩（也已在德国大炮的射程之内）。

如果能够维持部队川流不息地到达上船地点，估计在天黑的时间里能撤走二万五千人。因此，这一夜的活动是根据要撤走二万五千人而作出计划的。

然而，撤退工作的一个方面此时已无法解决。这天早晨，伤员的撤退工作停止了。救护船所面临的困难和六月一日晨不断发生的灾难，已使撤走重伤员的活动陷于停顿。伤员救护站的工作人员已放弃了回英国去的一切希望。

近晌午时，第一军总部发出命令，规定每一百名伤员留一名医官和十个医务人员，其余医务人员即行到防波堤去等待撤退。这一命令导致当时举行了陆军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抽签活动。下午二时，所有那里的医务人员的名字写在一张张纸上放在帽子里。现在还有二百三十个重伤员，必须决定哪三个医官和三十个医务人员留下来。晚上十时，其余的人员向防波堤出发，历尽辛苦，分别上了停靠在防波堤的三艘驱逐舰。

但是，还没有打算就此对伤员放手不管。在撤退的救护站人员抵达多佛尔后不久，英国当局决定直接向德国人作出呼吁。上午十时三十分，英国通过无线电向德国指挥部播发信号，明白

地说：

“伤员情况严重，应派救护船在白天进港。我们将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我们认为敌方将不予袭击。”

南方铁路公司的轮船“沃辛”号在战争一开始已被征用为救护船，此时正停在海中停泊处。在广播后两小时，它接到了出发命令，十二时五十五分它以每小时二十哩的速度向敦刻尔克出发了。下午二时三十二分，它遭到十二架敌机的袭击。这次袭击是在视线良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该船根据日内瓦公约，带有救护船的一切标志和记号。在整个撤退过程中，日内瓦公约一再被践踏，一如它无数次地在以前被践踏过一样。然而这一天的袭击，其卑鄙程度较过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公然地、明目张胆地蔑视对方所发出的呼吁。

下午三时三十分，回多佛尔作短暂休息的海军中校克罗斯顿，带了一些得到了补充的码头工作人员分乘第二百四十三号、第二百七十号汽艇到防波堤去作必要的准备工作，为晚上第一批船只的到来作好准备。在格拉夫林附近海面上，两艘汽艇遭到了八架容克-87型飞机的袭击。在扔小型炸弹和扫射机枪中，第二百四十三号汽艇的水手和海军中校克罗斯顿跳下了海。他牺牲了。

下午十一时，最后一批英国远征军已在上船。“圣赫利厄”号光荣地担任了运载最后一船远征军的任务，这是对它整个光荣纪录的一个合适的结局。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它满载着人，最后一次收起缆绳，慢慢驶出港口，它的船头向下，船首尖舱已严重渗水。

就这样结束了英国陆军史上的一章，这章的故事是仅仅三星期前开始的，那时英国远征军帽插了香花，跨过比利时边境的栅栏，跑步进入了比利时。就这样结束了一次大撤退的故事，这

可是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撤退啊。

下午十一时三十分，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校坦南特发出了简单的信号：“英国远征军撤完了。”

到此时为止，这一天的上船工作是整个撤退中最顺利最迅速的一次。在撤走英国远征军的最后一批人员时，也在大批地运走法国军队，但是现在人员的流动又停顿下来了。明摆着的可悲的事实是，临近午夜时，上船工作完全停止了。零时三十分，海军上将威克-沃克发电报给多佛尔说，有四艘船停靠在防波堤，但没有法国军队来。一时十五分，他再次发电报说：“船很多，没有军队来。”没有军队来这件事似乎不能归咎于任何别的原因，只能说是因为法国指挥部组织工作完全垮了。

这一天到午夜为止的二十四小时内，在英国登陆的人数共达二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

星期一，六月三日

六月三日那天，烈日当空，光芒万丈。继续熊熊燃烧着的油池所喷出的浓烟随着阵阵东北风沿着海岸从格拉夫林飘向加来方向。敦刻尔克航道静悄悄地毫无动静。

在陆地上，德国人开始发动他们最后的攻击。随着黄昏的慢慢过去，敦刻尔克郊外最后一条防线建立了起来。这里已非常逼近港口，但总算守住了。在有法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加法尔德将军和洛朗西将军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这一夜里应进行最后一次的撤退。敦刻尔克那漫长的痛苦恶梦几乎是过去了。舞台上即将上演的是最后一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即涉及后卫部队的悲剧。

在多佛尔，海军上将拉姆齐为这一夜作出了计划。舰艇上

水手的状况现在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连续作战引起的疲劳不堪现在无论是在驱逐舰还是在运兵船上都表现出来。先后交给他指挥的驱逐舰共有四十艘，有的沉没，有的撞毁，有的被炸弹和大炮击伤，有的搁浅着，因此能使用的现在仅有九艘。运兵船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已减少——原来的三十艘中只有十艘仍可使用，而且这些船上的水手们已疲劳到了极点。

拉姆齐在他发出的电报中说：“英国海军驻法国海军司令部联络官马索已向海军中将作了报告，估计剩下的法军还有三万名；法国海军部同意，如果可能，今夜应结束撤退工作。”

海军上将泰勒的助手、海军中校特鲁普在下午十时三十分到西防波堤。他发现那里情况一片混乱，就自封为码头指挥官，把事情管起来。他发现要劝说法军登上小船或根据船只的情况打乱他们的编制又是困难重重。

最后，海军中校特鲁普在法国联络官的帮助下，总算成功地说服了法军，答应他们将在英国重新集合在一起，终于使人员的流动加快了。那一夜，在这一备受炮击的码头上就撤走了几千法军。

午夜二时，法国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自己也上船了，伴随他的有海军上将普拉东、海军上将勒克莱尔和法加尔德将军。

法国巴泰勒米将军的最后计划规定后卫部队在天黑后撤离阵地，在晚上十一时和午夜之间向防波堤和港口移动。在前沿大部分地方，撤离进行得很顺利。只是在弗内斯运河畔守卫几座桥梁的几个营撤离时有困难。下午十时三十分，最后的撤退开始了。后卫部队被告知说，会向他们提供船只的。船只的确派出了，但是现在，在天全黑后，从马洛和敦刻尔克的地窖里、倾塌的房屋里以及掩蔽体里，钻出了一支大军。

“从地窖和地洞里，一批批没有武装的人潮涌般地到处出

现，向防波堤聚集，直到他们汇合成一条由人组成的巨大河流，把到防波堤去的进路完全堵住。这些躲起来的英雄，这些多天来没有离开掩蔽体的战士，现在不想把脱逃的机会让给那些为他们而打了仗的人。巴泰勒米的部队停了下来，等着，看着，让这些开陆军火车的人、卡车司机、辅助部队的人成千上万地在他们鼻子底下过去。

“在一年的这个时候，黎明是来得较早的。当东方微露鱼白时，后卫部队眼睁睁地看着最后的船只开走了……”

“在敦刻尔克的史诗中，再没有比这一插曲更令人伤心不已的了。”^①

数字是清楚的，太清楚了。在黄昏时，指挥部估计那里还剩下三万人。这一夜共撤走了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五人。根据德国人的记录，被俘虏的有四万人。

随着天色大亮，英勇的后卫部队等着，他们被挤在那些意志消沉的人、逃兵、掉队的人、被自己军队抛弃的人和敌军先头部队的中间。六月四日上午九时，敦刻尔克投降了。

胜利地撤到英国海岸去的人数总共达三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六人。

这就是敦刻尔克。

（摘译自一九五九年伦敦出版的《敦刻尔克的九天》一书 张仲礼译）

① 见法国史学家雅克·莫尔达尔著：《敦刻尔克之战》一书。

波里比阿

(约公元前一九八至前一二五年)

波里比阿是亚加亚族^①的希腊人，约于公元前一九八年出生在一个显贵家庭里。他出生的时代，正是“希腊化”地区被并入那新建立的罗马帝国体制的大变动时期。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就在亚加亚联盟（主要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那些城邦所组成）中肩负重任，其父是这个联盟中居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作为一名骑兵司令官，他参加过第三次马其顿战争^②，与罗马作战。公元前一六八年，罗马军在彼得那^③之战中获胜以后，有一千名亚加亚人被作为人质解往罗马，他是其中之一。在罗马，他在阿米利厄斯·鲍罗斯^④的府邸中供职，很快成为那年轻的西庇阿·阿米利亚纳斯^⑤的亲信。在这以后的二十年中，他一直受到罗马政界最上层人士的青睐，并且有机会游历意大利、

① 雅加安族是希腊人中的一支，居住在希腊半岛中部一带。——译者

② 公元前171至前168年，马其顿王伯尔修所掀起的反抗罗马的战争。——译者

③ 马其顿境内的一个市镇。——译者

④ 阿米利厄斯·鲍罗斯（约公元前229至前160年），罗马奴隶主贵族政治家、军事家，曾先后两次任执政官，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的罗马统帅。——译者

⑤ 西庇阿·阿米利亚纳斯（公元前185至前129年），罗马奴隶主贵族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是鲍罗斯的幼子，后来因为过继到西庇阿家族中去，所以改了姓。为了区别于其所承袭的祖父、那个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汉尼拔的罗马名将西庇阿·阿非加纳斯，亦称“小西庇阿”。——译者

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当小西庇阿在公元前一四六年率兵灭迦太基时，他是随同前往的。

他在旅居罗马的岁月里，就立志要写一部历史，来记述罗马的武功。他自己说道：“罗马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几乎征服了整个有人烟的世界（指地中海地区——译者），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这种征服事业，是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罗马何以能够如此？是用一种什么方法达成的？是在一种什么政体之下完成的？”他才华横溢，经验丰富，也适合做这项艰巨的工作。他熟识希腊方面和罗马方面的政治、军事领导人物。他曾经遍游各地，访问过他这部《通史》中所记述的那些历史事实的发生地点。他广泛阅读过与他这个研究题目有关的文献，而且他能够查阅官方的档案材料。

波里比阿的这部著作是记述罗马的征服事业，始于第二次布匿战争^①，止于马其顿之被征服。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他心目中始终有一个主题，即罗马人是用一种什么方式来统治他们那些地广人多的领地的？他自己问道：在执行这样一种艰巨任务时，需要有“多么完备的法制”？波里比阿是按照修昔底德的传统来写历史的，他集中精力写政治活动和当权的政治家，而且他认为：“研究历史，多识前言往行，……对政治生活说来是一种必要的训练。”确实，在那些把修昔底德的史学传统发扬光大的古代史学家中，他是首屈一指的。波里比阿专心致志地写当代史，而且他在搜集、评价、采用史料方面，都是遵循修昔底德的那一套标准。再者，和修昔底德一样，波里比阿虽然依靠文献资料、档案和官方文件，但却把目击者的记载作为其史书

^① 布匿战争是罗马和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长期、残酷而激烈的战争。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二次布匿战争始于公元前218年，结束于公元前201年。——译者

的最可靠的资料。他善于运用一套史学方法，把各种史料反复加以核实，互相对照，互相印证，以求能得到最可靠的史料证据。

波里比阿是有其思想倾向的（这也正是修昔底德的影响）。这种思想倾向，在其《通史》的第六章中表现得最明显。在那一章里，他不描述历史事件，而停下来广泛评论各种政治制度的优劣，特别是对罗马的政治结构作了分析。他自己说道：“我这部书的特色，亦即本书的精华所在和对读者最有教益的地方，就在它要使读者知道并充分理解：罗马是凭一种什么方式、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获得成功，得以主宰世界的？”这一点，是和他的这一信念完全一致的：“考察一个国家的政事，我们必须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看做是决定其成败兴衰的最关键的因素。”然而，正是在第六章里，波里比阿却以论代史。他那关于政体演变的论述，是以一般人所说的政体循环论为基础的，即认为君主政体、暴君专制、贵族专政、寡头政治、民主政体、无政府状态这几种政治形式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但他的论点是凭主观臆测，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罗马之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它有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各种政体之优点的政治组织形式”，即把君主政体、贵族专政、民主政体的因素揉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当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建立丰功伟业时，它的政体基本上是贵族专政。

这样，波里比阿就既表现了古代历史编纂学的某些优点，也表现了古代历史编纂学的某些缺点。他一方面力求根据实际经验和实用目的来写历史，但另一方面又往往滑到先验论或主观臆测的迷雾中去。然而，即使他有时流于主观臆测，波里比阿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因为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确凿可信，他的史学方法是谨严缜密、一丝不苟的。我们应该承认麦

考莱①的论断：尽管可惜他有其局限性，但若和普卢塔克②那样的史学家比较起来，波里比阿理应受到我们高度的尊敬。

（摘译自彼得·盖伊等编：《史学家的业绩》，第一卷，1972年纽约版，108—109页 郭圣铭译）

① 托马斯·麦考莱（1800至1859年），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政治家，著有《英国史》五卷和传记、论文多种。——译者

② 普卢塔克（约公元46年至120年），希腊哲学家、史学家。他出生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曾在罗马讲授哲学并担任公职。其所著的希腊名人传、罗马名人传，是研究古代史的要籍。——译者

评《在漫长的劳动日中消磨一生》一书^①

〔美〕罗伯特·克莱本

几年之前，各种各样学者曾对我们保证说，我们已站在“后工业社会”的门槛上。在这个后工业社会里，多亏有了自动化，一切单调的、刻板的、象牛马那样劳动的工作就会完全消失。但是，正如巴巴拉·加森^②所指出的，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在美国，刻板的日常工作，今天同以往一样普遍，一样毫不考虑劳动者的死活；而且，正是由于自动化，在若干方面，甚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加森女士并不是在书斋中得出这些结论的。相反地，她是通过两年来在若干工厂和公司里，在上班时，特别是在下班以后，同工人交谈而得出这些结论的。有好几次，她亲自受雇做这种刻板的日常工作，但总是很快就被解雇。结果是她写出了一系列生动、流畅、文字简洁的描述，以工人们自己的语言以及作者的深刻印象描绘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麦克伯德》一出戏曾使加森女士一举成名，并被公认为尽管还比较粗糙，却是一个有才智的剧作家。现在的这本书，应能使她被确认为是一位有才华的、有洞察力的、能作透彻分析的新闻记者。她的关于在野

^① 《在漫长的劳动日中消磨一生：日复一日单调劳动的利弊得失》，巴巴拉·加森著，美国道布尔戴出版公司出版。

^② 巴巴拉·加森是美国戏剧家、讽刺作家。——译者

蜂金枪鱼公司、海伦娜·鲁宾斯坦公司、读者文摘社及其他单位的生活体验的报道，以及用诸如模范运动用品公司和合理计划保险公司等假名来描绘的一些公司的生活实况，或令人为之发指，或令人感到沮丧，或令人发笑不已，但总是引人入胜的。

加森女士是一位对细节几乎具有一贯正确无误的鉴别力的不寻常的作家，这些细节不仅生动活泼，而且揭露无遗。遗憾的是，正是因为她有这方面的才华，以致几乎不可能为她的著作写出一个梗概；去掉了这些有刺激性、有血肉的事情，就只剩下了一般性结论的骨骼。在这一点上，作者本人也许会承认，是这一本书的最大缺点。特别是，她始终没有抓住任何关心改善劳动条件的人所必须面对的两个中心问题：如何能改善劳动条件而又不提高生产成本，也就是不提高那些归根结蒂要由社会来负担的成本呢？如果成本必然要提高，究竟要提高多少，才可以合理地换来更人道的劳动场所，带来实际和无形的益处呢？

例如，她描写的联合医药化验公司的自动化设备，明显地导致它的职工过更加单调、更加刻板的生活。但是，若干医药化验项目的成本已从十五美元下降到了五十美分，这对看病的人，包括这些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及亲友，也明显地带来了好处。这里是社会之所失大于社会之所得吗？是谁这样说的呢？

撇开这个概念上的漏洞不说，加森女士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些有关美国刻板单调劳动的重要结论（这些结论也可引伸到所有其他工业国；她并不认为情况在苏联有什么不同）。首先，刻板工作的许多弊病是同生产效率或成本毫不相干的，不过是任何家长式单位里经常看到的那种不管实际情况的做法，是这一级或那一级管理人员出于权力欲望和追求个人成就的做法。（“他们同研究提高生产效率的专家一起到这里来……我觉得那完全是骗人的、自高自大的那一套罢了，”一个锯木厂工人的妻

子是这样说的)换句话说,若干工种之所以变得过于简单刻板,仅仅是为了便于“管、卡、压”,为了控制的缘故。作者写道:“这种对工人永远保持警惕的状况是以牺牲人们的自由为代价的。”这样一来,其结果常要导致恶性循环,简单化了的工作意味着工人能轻易地被调换,这是好的,但是工作越是简单,辞职或无故旷工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坏的。于是资方就进一步地要使工作简单化……

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资方积极地阻止工人去发挥他们的技能和想象力。加森女士深信资方平时总是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资方认为他们无所不知;另一个原因是工人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深知,如果发挥了他们在提高生产方面的创造力,这很可能意味着多做工作而报酬却依然如旧,或甚至更少些。三十五年之前,我曾在一家钢铁厂工作过,在那里工作的我所认识的大部分机工能操作得比资方的工序时间测定员所规定的时间快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但是,他们不愿作傻瓜,他们保持这一秘密,他们不去增加军火生产,而是为自己在工作时间内安排了更多的空闲休息时间。根据加森女士提供的证据,自那时以来,显然事情并无明显的变化。在美国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量,对此,私营企业的经理人员既不能也无法把这股力量挖掘出来。其结果是:工人的工作效率既不高,对工作又厌倦不堪。

但不幸的是,从资方的立场来看,厌倦还没有导致轻举妄动。尽管其他学术权威认为处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已变得完全满足于丰裕的生活和刻板的日常工作,加森女士和那些从事于刻板的日常工作的工人都完全知道,他们自己对工作是厌倦的,他们是被当作牛马看待的,并且对此感到愤慨。但不幸的是,这种愤慨还没有达到他们认为应该要有什么纠正办法的地步。

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工会极不得力。加森女士对工会这样的组织持有严重的怀疑态度。她认为，除非特别有献身精神、本人不在厂内的工会领导人以外，其余的都“已变成了如公司经理人员那样的、另一个致力于欺骗和镇压工人的专职集团”。她举的例子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亲自观察到的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和美国音乐家联合会等工会，也证实了这一点。进入工会的领导阶层，如同踏进了“经理阶层的底层”，和在基层选区搞政治活动那样，成为爬向上层社会的阶梯，而且经常就是踏在那些在下面的人的背上爬上去的。

但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工会也是过于简单化了。犹如对于国家那样，从长期来看，工会会员们一般都有了它们应该有的工会。对于刻板的日常工作在肉体 and 心灵上如此损害会员，为什么几乎所有工会都可以漠不关心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员们自己认为，这一类的事情，虽然极不称心，但都是正常的，当然是无法避免的。甚至于那位年轻、“激进”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俄亥俄州洛兹顿分会主席也说：“管理工厂是资方的特权。”他和其他任何工人都提“为什么是这样”，直到有大批工人开始提出这一问题之前，刻板的日常工作将一如既往地那样弊病很多。

加森女士认为，只有某种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不人道工作的问题。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团体、派别或分裂出来的小派，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同那些由于刻板的日常工作而充满了辛酸和厌倦感受的人保持任何有益的联系。原因之一也许是，这些团体大多数成员都忙于进行深奥抽象的理论争论，而不去写作，甚至也不阅读类似这本著作那样的书。他们同加森女士大不相同，他们只追求理论上的森林，而不敢去揭露那些病树。

重读了上面所写的评语之后,我感到我把《在漫长的劳动日中消磨一生》一书描绘成为介绍当前美国工人阶级中存在悲观主义问题的小册子了。这本书完全不是这样性质的小册子。中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确实需要读一下这本书,使他们对要谈论的问题能有更清晰和更具体的了解,但是任何对老百姓怀有兴趣的人,任何对他们设法保存自己的各种途径怀有兴趣的人,如果能读一下这本书,也必然会感到乐趣无穷和得益非浅的。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国《民族》周刊
高立育译)